

前 言

青年运动是时代的脉搏，认识它、掌握它能促使祖国腾飞。青年运动是复杂的网络系统，它由众多子系统组成，实行统一战线，团结最大多数的青年，才能使青年运动健康发展。

中国基督教男女青年会是中国青年运动的子系统之一，它自诞生以来，时而与中国青年运动并行不悖，时而相互冲撞，时而又相融合……它们之间的互动关系究竟有何规律？揭示它，有助于了解青年运动和推动青年运动的研究，但是，由于基督教男女青年会具有宗教的神秘性等种种原因，故至今它还是个未知数。

近年来随着宗教政策的落实，各种宗教崇拜活动重现于世，宗教组织迅速恢复，其速度之快，令人乍舌，许多高文化层次的年轻人也加入宗教组织，并且年轻化、知识化的趋势有增无减。这些事实说明，尽管当今社会，高度发展的科学技术已从根本上否定了超自然神灵的存在，但作为文化现象和社会力量的宗教仍在现实

社会中起作用。鉴于以上原因，即使在今天研究、揭示基督教男女青年会与青年运动的互动关系也有其必要性和价值所在，这正是笔者不自量力地撰写此书的目的。

笔者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搜集较翔实的资料，力求真实地再现中国基督教男女青年会与青年运动的关系：一条起伏跌宕的轨迹。

全书构架按轨迹起伏分为六章。第一章：中国基督教男女青年会透视，全面介绍了基督教男女青年会的情况。第二章：西方文化的传播者，叙述它们在中国传播科学文化知识和宣扬宗教文化的情况，及其对中国青年和青年运动的影响。第三章：冲撞，非基督教运动。阐述了基督教男女青年会在非基督教运动前期受冲击，后期，统一战线使它们汇合：一起反对帝国主义的经过。第四章：融合，抗日战争。用史料肯定了中国基督教男女青年会在抗日战争中与青年运动相融合，为抗战作出了一定的贡献。第五章：内战，各趋一方，反映了基督教男女青年会在内战时裂变：有的与时俱进，有的逃离现实，有的走向反面。第六章：斩断羁绊，自治、自养、自传。再现新中国成立后，它们在自焚中新生、窒息、复苏的历程。

该书是众人心血的结晶。杭州师范学院历史系林正秋副教授、上海市政协副主席罗冠宗先生、杭州市政协副主席组志芳同志对拙作进行了认真仔细的审阅，提出了不少宝贵意见；同济大学出版社洪建华总编为本书耗费了许多心血；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总干事黄祖贻、干事陈维新对该书提纲进行指导，并提供了许多资料；上海青年干部管理学院王敏副教授、浙江省团校

校长戎国栋和省青运史室主任王培夫给予多方面支持，此外，还得到国务院宗教局、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团中央青运史研究室及各省市政协文史资料室、基督教三自爱国委员会、基督教男女青年会、图书馆、档案馆等单位的领导和同志的大力支持和帮助，笔者在此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心有余而力不足，这是笔者撰写过程中的深切体会。一则因中国基督教男女青年会的资料搜集非易，虽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但还有许多资料未被挖掘；二则笔者系局外人，虽有旁观者清的优势，但因不熟悉内情，研究起来相当吃力；三则笔者资质笃纯，故疏误之处在所难免，恳望专家与读者多多指教，并希望有关人士提供资料，以便作进一步修改和深入研究。

作者

1989年8月于杭州

目 录

前言	(3)
第一章 中国基督教男女青年会选视	(1)
一、追本溯源	(1)
二、宗旨与会训	(9)
三、建制和经费	(10)
四、活动形式	(14)
第二章 西方文化的传播者	(23)
一、传播科学文化知识	(23)
二、宣扬宗教文化	(39)
三、西方文化的传播者？还是列强侵略 中国的工具？	(43)
第三章 冲撞，非基督教运动	(49)
一、弄巧成拙，非基督教运动兴起	(54)
二、目标消失，非基督教运动低落	(62)
三、波峰再起，收回教育权运动	(63)
四、催化剂，五卅运动	(71)
五、实行统战，运动向纵深发展	(76)
第四章 融合，抗日战争	(85)

一、大张旗鼓，宣传抗日·····	(86)
二、竭尽全力，募集资金·····	(95)
三、雪中送炭，救济难民·····	(101)
四、救死扶伤，战区服务·····	(108)
五、四出奔走，国际求助·····	(116)
第五章 内战，各趋一方·····	(122)
一、内战，三叉分流·····	(122)
二、与时俱进·····	(124)
反内战、争民主运动·····	(124)
反美抗暴运动·····	(125)
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	(128)
救饥救寒运动·····	(134)
三、又开的支流·····	(138)
第六章 斩断羁绊，自治、自祭、自传·····	(140)
一、自焚中新生：三自爱国运动·····	(140)
二、生机盎然的50年代·····	(148)
三、窒息的60—70年代·····	(160)
四、复苏于80年代·····	(162)
附录·····	(164)
一、为上海事件告全国基督教同学书·····	(164)
二、我们的意见·····	(169)
三、中国基督教界发表宣言·····	(173)
四、人民日报1950年9月23日讯·····	(176)
五、人民日报社论《基督教界人士的爱 国运动》·····	(177)
六、图表目录·····	(179)
七、主要参考资料目录·····	(180)

第一章

中国基督教男女青年会透视

中国基督教男女青年会，在当代人眼里犹如锁在雾中的庐山。有人认为它们是宗教团体，有人认为它们是娱乐团体，也有人认为它们是社会服务团体……它们究竟是什么样的组织呢？性质如何？目的是什么？与一般的青年组织有何区别？……若要了解它们与中国青年运动的关系，就要一一地寻觅中国基督教男女青年会在史海中运行的轨迹。

一、追本溯源

中国基督教男女青年会是海外漂来的种子，移植于中国土壤里而结的果实。

基督教青年会（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简称Y. M. C. A）诞生于英国。1844年，英国伦敦一位18岁的青年商人、基督徒乔治·威廉斯看到商界的青年人精神空虚，甚至有的还生活堕落，感到很痛心，觉得他们

的生活方式应改变，于是，他联络了12个青年店员，创办了第一个基督徒青年会，用宗教活动和正当的娱乐活动来充实他们的精神生活。这一活动很快受到英国资产阶级统治集团与基督教教会的赞同和大力支持。1894年，青年会举行50周年纪念日时，英国女王认为乔治·威廉斯创办青年会有功，授以勋爵。

在英国资产阶级统治集团和基督教教会的大力支持下，青年会发展很快。不到两年时间，基督教青年会就风靡英伦三岛。到1851年基督教青年会在伦敦已有8处会所，在英伦三岛共发展了16个支会，同时，基督教青年会也传到了美国、加拿大及西欧、北欧诸国。1854年，美国和加拿大联合组成了基督教青年会北美联合会。1855年，欧美各国到巴黎参加博览会的青年会会员在巴黎举行了第一次国际性会议，成立了基督教青年会世界协会“World Alliance of the Y. M. C. A. S”，简称世界协会^①。1878年在瑞士日内瓦设立办公总部。时青年会已分布在六十几个国家和地区，会员约有170多万人。世界协会的经济大部分来源于美国。故从1927年起总干事一直由美国人担任。

青年会的活动内容也不断丰富。第一阶段，他们的活动是青年基督徒对当时教会封建势力的抗争：他们脱离牧师的手掌，自动地敬拜上帝、结合团契。正如当时会员所说：我们青年必须要有青年的方式来表示我们的宗教。第二阶段，注意环境对道德的影响，即从第一阶段的光注重灵性到发现环境的重要而增加了创造良好的环境培养会员的优良的生活和高尚的道德的内容。第三阶段，他们注重开展德、智、体、群运动。第四阶段，他们注重个人对社会的责任，提倡社会改良运动。后又发展到积极参与政治，参与社会改造活

动^②。

青年会的传教与改良活动对维护资本主义制度是有利的。垄断资本家利用青年会实施改良主义，对其本国青年进行笼络，还大量投资，竭力支持青年会向海外扩展，密切配合基督教的传教活动。

基督教青年会最早传入中国是在1885年，中国学生青年会在福州英华书院成立^③。1886年通州的潞河书院也成立了一个学生青年会，接着杭州长老会育英书院的学生青年会也成立了。这三个学生青年会都是诞生在教会学校，由教会学校的学生组成，不过，它们是各自成立，彼此不通音信的。1895年，北美协会应基督教在华传教士全国大会提出的请求：要求派员到中国来组织基督教青年会，派来会理牧师到中国来开展青年会活动。

来会理牧师很能干，他选择了当时中国政府办的西洋教育中心、宣教师到华北的交通要道——天津为起点，并且将目光首先射向官办学校。第一个组织的青年会不是教会学校的学生，而是由几所官立大学的学生组成的，这对其他官立学校的学生影响很大，促使他们对青年会产生兴趣。他开展青年会活动的工作也就很快打开局面。1895年12月8日天津青年会成立。

1896年8月，北美青年会的学生干事兼当时新成立的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的总干事穆德先生来华作三个月的游览、视察。三个月内，他由来会理牧师陪同出席了中国各地为学生及基督教工作人员举行的六个会议，遍访了中国各高等学校，宣传青年会的宗旨，使中国学生真正知道加入世界基督徒学生团契的利益，于是各大学又相继成立了22处青年会，加上原有5处，总共有27处^④。并于该年1月3日至4日在

上海召开了第一次大学青年会的全国大会。在这次大会上，成立了一个全国性的组织——中华基督教学塾青年会，并选举了一个全国协会委员会，中外委员各半。来会理牧师担任首任总干事。中华基督教学塾青年会为了与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的原则相一致，随之就加入了该同盟。

1898年，北美协会又派格林、路义思、巴乐满到中国分别担任天津、上海、香港的青年会干事。义和团运动后，清王朝完全沦为各帝国列强的儿皇帝，青年会同基督教却得到了迅猛发展。1899年5月，学生青年会第二次全国大会在上海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102人，其中54人为中国人，代表了24所大学九行省。这些大学中的学生，40%已成为青年会的同宗会员或同志会员。

1901年11月，第三次全国大会在南京召开，中外代表共156人，其中中国代表131人。

1902年5月，在上海举行了第四次全国大会，成立了中、韩、港基督教青年会总委办。基督教青年会的活动对象不再限于学生，扩大到知识界；范围不再限于中国，扩大到朝鲜。

根据1906年冬的统计，学生青年会总数为44处，其中6处在神学院内，18处在教会大学内，1处在官立工艺大学内，19处在教会所办的预备学校内。它们代表八行省散布在中国本部及朝鲜等处。同宗会员总数为2042人，同志会员为725人，两项总计为2767人。

同年，大批中国学生赴日本留学，平均每月约有500人赴日，估计在东京的中国留学生不下15000人。青年会总委办考虑到中国留学生在日本解脱了国内的一切束缚，接受国外的各种影响，这不仅对中国留学生有影响，对中国的将来也

必有若干影响。于是，他们就于1906年4月派中西干事各1名到东京创办了中华基督教留日青年会，王正廷任干事。

1909年，随着留美学生的增加，又组织了中华基督教留美青年会，任命王正廷为干事。

1910年10月20日，美国总统塔夫脱为了讨论扩大基督教青年会在海外活动和募集108万美元捐款的方案，专门采取了一次美国政治史上不寻常的举动：在白宫召开了一次特别会议，美国政界、财界和宗教界的一些巨头及拉丁美洲和亚洲来的青年会的一些负责人共200余人出席了这次白宫的特别会议。会上总统塔夫脱发表演说，竭力赞扬基督教青年会的功能，并表示完全支持青年会北美协会提出的在海外扩大基督教青年会活动的计划，要求到会人士慷慨解囊。接着穆德起来报告了北美协会为在亚洲和拉丁美洲建造青年会会所的募款计划，要求大资本家认捐，并宣布煤油大王洛克菲勒已答应捐资54万美元，希望大家能向他看齐，踊跃认捐。

这次会议很成功。会后不出数月，穆德就募到200万美元，比最初拟定的计划超出了近百万美元。

穆德募到大批捐款后，于1912年12月到北京举行了中国基督教青年会第六次全国会议，决定在上海建立总部，定名为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得到北京政府的承认。大会推举美国人巴乐满为第一任全国协会的总干事。当时，全国青年会市会有25处，会员11300人，校会有105处，会员有3876人。

1915年为适应中国人民反帝爱国运动日益高涨的形势，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的总干事改由中国人担任。第一位中国籍总干事是王正廷，一年后因其转到外交界当官而改由余日章代理，1917年转正，一直连任到1935年。

辛亥革命后，《临时约法》规定了公民信教自由，1918

年的宪法也作了同样内容的规定，这为基督教和基督教青年会的发展提供了法律保证。当时不仅北洋政府重视利用和发展青年会，南方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势力也十分重视争取青年会所代表的一批青年。1923年10月，中国基督教青年会在广州举行第九届全国大会时，孙中山、汪精卫等都应邀在会上演讲。孙中山先生演讲了三、四小时还未尽兴，直到夫人宋庆龄担心其身体、力劝之下才结束。中国基督教青年会在这样的环境下发展很快，1922年发展到顶峰。这时全国市会有40处，会员达53800余人；校会有200处，会员达24100余人，外籍干事95人，中国籍干事87人。

然而，正当青年会处于鼎盛状况时，中国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非基运动”。这犹如一场暴风骤雨，猛烈地打击了基督教青年会发展的势头，使它们一蹶不振。以后尽管时有兴起，但再也没有恢复到顶峰状况。各阶段详细情况下面分章叙述。

中国基督教女青年会，简称女青年会（Young Wo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 简称 Y.W.C.A 它的）。发源地也在英国。

1855年，金纳德夫人在伦敦创立了女青年会，最初只进行宗教和社会服务工作，如在青年女职工中开展查经班和设立女护士单身宿舍，后来也开展了一些社会改良工作。不久就传到德国、美国等地。1894年，世界基督教女青年会在英国成立，总部设在日内瓦。

中国基督教女青年会是由美国传入的。在1890年，杭州弘道女中组织了我国第一个学校女青年会。1899年，女青年会第一次全国委员会召开^⑤。会后，女青年会在我国迅速发展。至1906年，全国已有市会3处，校会30余处。1920年，全国已有市会12处，校会89处，交费委员总数6414人。1923年，

在杭州召开了第一次基督教女青年会全国会议。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全国协会正式诞生，会址设在上海，丁淑静被推举为第一任总干事，并决定出版《女青年报》作为会刊。中国基督教女青年会还加入世界基督教女青年会，成为世界基督教女青年会的分会。

1922年，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在北京举行第十一届大会时，我国基督徒学生认为，中国基督教男女青年会有联合的必要，提出“中国基督教学生运动”的提案。提案内容是：提出中国基督教学生运动的需要和特点——以学生为主体，全国性的，不分宗派，不分男女。提案得到出席这次会议的中国代表的赞同，并委托男女青年会对此作进一步研究。

1926年，在济南举行的青年会与学生立志证道团全国大会时，决定由男女青年会和学生立志证道团合作，派代表15人详细讨论此事。

1927年，三个机关派出的15名代表在南京集合时自动组成“中国基督教学生运动筹备委员会”，并规定学生运动的宗旨是：本耶稣精神，创造青年团契，建立健全人格，谋民众生活的解放与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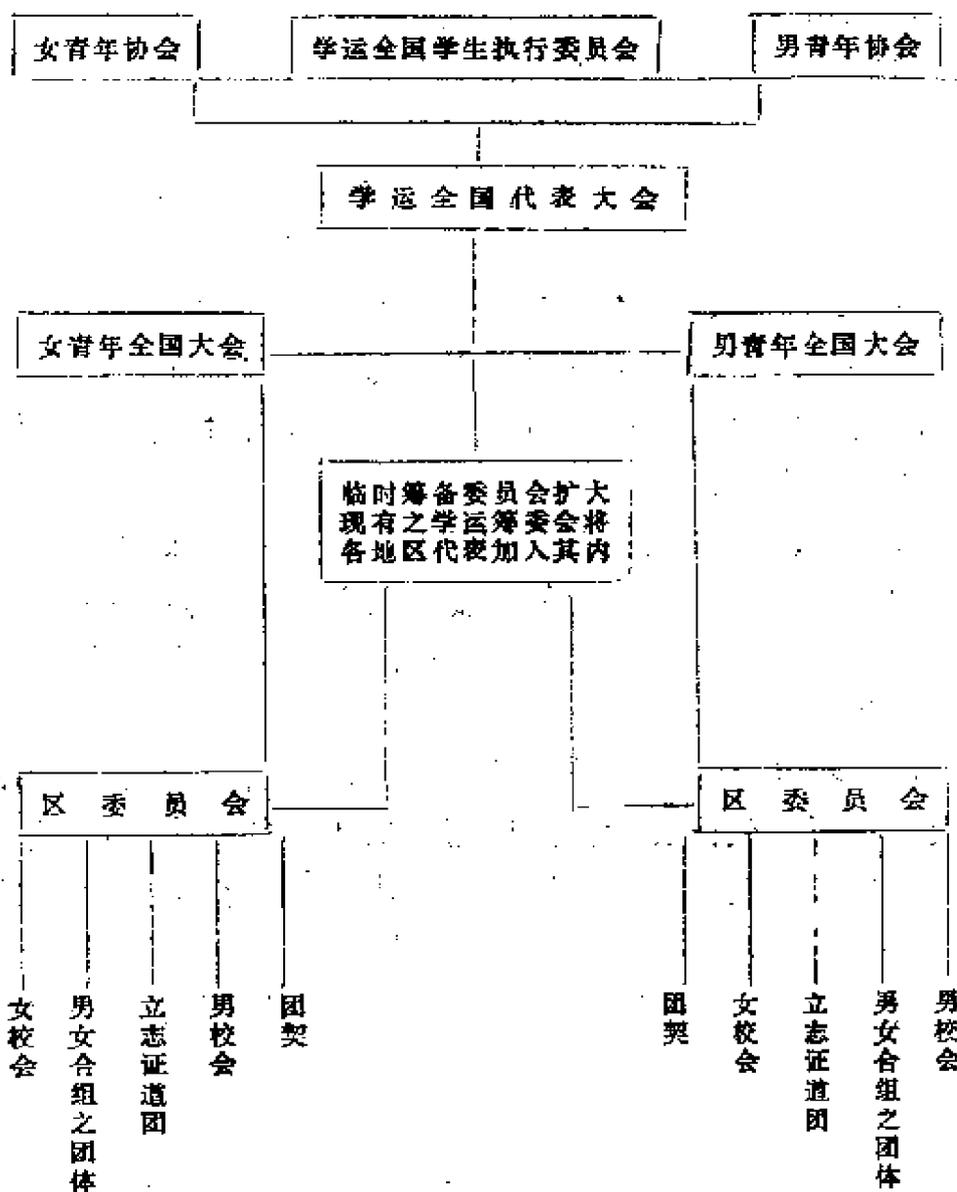
1933年8月，中国基督教学生运动筹备委员会在上海沪江大学举行学生团契大会。出席这次大会的13个区联共150名男女代表自动发起组织了一个“中国基督徒学生全国临时总会”。学运筹委会便宣告完成历史使命。临时总会设立三个专门委员会：乡村改进委员会；社会改造问题研究委员会和国货促进委员会。又委派了一个信仰与使命研究设计委员会。

总会本身的组织机构是：成立了各学联联席代表大会，为该会最高权力机关，下设常务委员会和它委任的经济委员会、出版委员会、宪章起草委员会、地方团体促进委员会。

此外，总会还成立了一个干事部和顾问部。

1936年8月18日至25日，在苏州和上海召开基督徒学生全国大会，正式成立了中国基督教学生运动。

中国基督教学生运动与中国基督教学生男女青年会全国协会关系如下图所示^⑨。



基督教学生运动与男女青年协会之关系

二、宗旨与会训

中国基督教青年会的宗旨据会章规定为：发扬基督精神，团结青年同志，养成完美人格，建设完美社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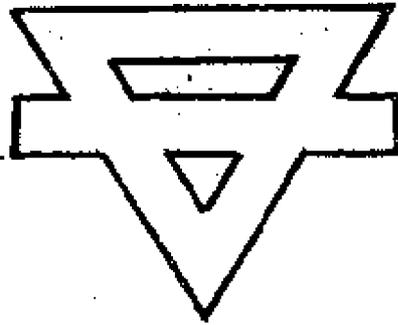
基督教青年会的宗旨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地充实完善。基督教青年会的早期宗旨是对青年实施个别的宗教和道德教育。进入20世纪后，它的宗旨从对个别青年施加影响而逐渐扩大到对整个社会推行改良主义，参与政治活动和社会活动。除了推广“社会福音”外，还扩大到同西方许多政治组织保持联系，广泛参加国际性的政治活动，这完全与资产阶级的利益相吻合，因此，垄断资本家把它作为对外扩张的工具。白宫能作为它的开会场所，总统塔夫脱会给予大力支持，大资本家愿掏出巨额资金为其提供活动经费等等就是例证。

中国基督教青年会的会训是：非以役人，乃役于人。它的意思是：不是要受人的服事，即奴役别人，而是要服事人，即为别人服务。

中国基督教女青年会的宗旨，在女青年会的章程上写的是：“团结中国少女和妇女，根据耶稣基督的教训，推进德、智、体、群四育，服事上帝，服务祖国。”

女青年会的会训是：尔识真理，真理释尔。会训来源于约翰福音第8章32节，意思为：“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会叫你们得以自由”。

会徽含义是表示德、智、体、群四育。会徽为一等边三角形加一横条构成。



男女青年会会徽示意图
男青年会为红三角形红横条
女青年会为蓝三角形蓝横条

中国基督教男女青年会是基督教性质的团体，但它不同于教会。教会主要是传福音，进行宗教活动，满足信徒的宗教生活，而男女青年会则是本基督精神，为社会服务，做荣神益人的工作。参加男女青年会，并不等于参加基督教，即男女青年会的会员，并不都是基督徒。其中有不少非基督徒，当然男女青年会的权是掌握在基督徒手中的。

三、建制和经费

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初名总委办，后来因字的含义与组织性质不符，于1913年改名为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组合。不久，又感到“组合”二字，近乎日本人经营上的名称，容易造成误会，又于1915年中华基督教青年会第七

次全国大会上修正，定名为“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根据穆德的意思，在所有国家里，战场是在城市里，城市是风暴的中心，也是人口、影响与机会的集中点。城市怎样，国家也就怎样。他又认为，第二战场是学校或知识青年。1899年，穆德指出，在非基督教国家里有两亿学生，这对基督教国家的青年会是一个何等巨大的责任，这就是穆德有关两个战场的指示。据此，中国基督教青年会在全国协会下设二组八部，即城市组、校会组、宗教部、职工部、庶务部、体育部、智育部、干事部、学生部和书报部，分别承担各种会务。全国协会由全国各地地方城市、学校青年会的责任会员，每届三年选举正式代表召开青年会全国代表大会一次，决定一切办法及任务，并由代表选举出委员56人，再由委员选出9人组成董事部。董事部执行一切立法职权，按月开会一次。全国协会的任务是：（一）提倡在各地建立青年会；（二）辅助之任务：协助各地建立青年会及完善青年会机构；（三）统一之任务：帮助各地青年会联系、传递信息；（四）代表之任务：代表各地之青年会与世界各青年会联系。

中国基督教青年会的干事由董事会聘请。受聘者一般要具备以下6个条件：（一）身体健康；（二）具有完全的知识，即需大学毕业生；（三）基督徒；（四）具有丰富的交际经验；（五）有贯注全会的魄力；（六）有宗教事业的实绩^⑦。

中国基督教青年会一向是一个以会员为基础而组成的基督教团体。市会每年举行征求会。凡基督徒参加青年会的为会员，有时称同宗会员，非基督徒参加青年会的为会友，由会员或会友中所聘请的基本会员，于召开年会时选举董事，

组成青年会董事会。只有同宗会员才有资格参加每年一度的董事选举，会友是无权参加的⑧。

基督教青年会还根据应征会员交纳会费的多少，把会员分成“名誉会员”、“永久会员”、“普通会员”等等。这种要钱式的征求会员制度实际上与其宗旨和会训相冲突。

在国际上，中国基督教青年会是世界基督教青年协会的团体会员，也是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的团体会员。不过，它最密切的国际关系还是北美协会。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中国基督教青年会是北美协会的分支机构，因为中国基督教青年会的一切会议记录和事工报告、旅行报告都要制成复本寄往纽约，一切重要决定都必须用函电向北美协会请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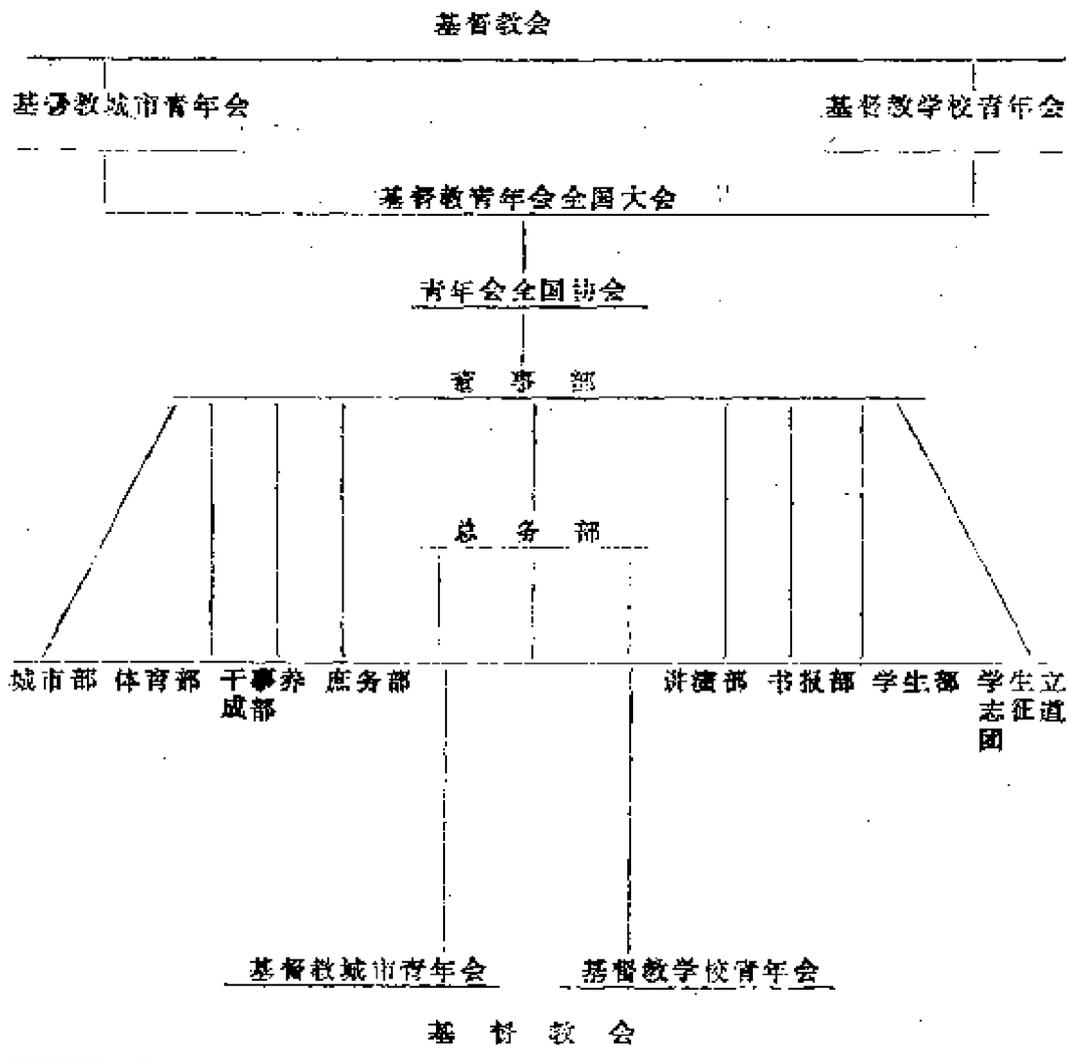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基督教青年会是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的团体会员。

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全国协会组织建制随时间推移而稍有演变。它与男青年会也略有区别。女青年会有6个部门：事务、市会、校会、财政经济、出版宣传和体育卫生。全国协会委员会起初由30个妇女组成，大多数是中国人，外国委员代表着各外国团体本部。2/3的委员住在全国协会所在地——上海，其余有8个代表代表地方女青年会，两个是实地工作委员会委员，此外还有各委员小组联合选举出来的委员。这时的全国委员会是自己选举的，从第一届全国大会开始，选举权由代表全国的代表们来掌握⑨。女青年会最高的领导机构是董事会，是由全体会员大会选举出来的，每年选举1/3⑩。

新中国成立后，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全国协会是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和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的团体会员⑪。

中国基督教男女青年会在新中国成立前，他们的经费主

要来自三个途径：（一）依靠美国大资本家的捐款和在中国国内的募捐；（二）会员的会费收入（这仅是象征性的收入）；（三）事业收入，如青年会举办的旅馆业、电影院、健身房、餐厅和其他娱乐收入、办训练学校、出版发行的收入等。新中国成立后，男女青年会实行独立自主，不再接受北美协会及美国女青年会的赠款。



全国协会之组织及其系统②

四、活动形式

中国基督教男女青年会的活动主要围绕德、智、体、群四个方面开展。

男女青年会的德育带有宗教色彩，形式很多，如举办宗教演讲、主日学、灵修会、夏令会、退修会、开设查经班等，联络基督徒感情，吸引青年人入会。其中较重要的形式是青年会负责组织安排布道大会。辛亥革命前后有多批布道家到中国各城市举行大规模的布道大会。1905年到1906年，穆德就以布道家身份到中国许多城市进行布道。他还采取了双保险的方法来保证听众，扩大影响，即他租用了大戏院，采用双倍发票——2000个座位发4000张票的办法，同时还利用青年的好奇心，大肆宣传吸引青年听讲。1913年，他又会同另一位美国布道家艾迪到中国14个城市布道，累计青年听众达137000余人，连袁世凯都曾去听讲，事后还大加赞赏。1914年，艾迪又到中国12个城市布道，累计听讲青年达121000余人。青年会如此精心组织规模巨大的“布道大会”，其目的是扩大基督教的影响，吸引青年入教。

自进入20世纪20年代，西方布道家看到中国已一天一天的渐成工业化，而同时中国的工人也一天一天的觉悟了，西方激进的社会思潮也一天一天的卷入了^②。工人运动高涨，他们的布道大会也一变而成为改良主义的说教大会。如艾迪在1922年再次来华布道时就专门演讲“基督教与劳工问题”，跑了24个城市鼓吹劳资合作，提倡阶级调和，还到处留心调查工业情况。在沪津等地，他还直接到工厂及工人家中调查劳工生活、思想情况，与中国资本家讨论如何平息工

潮及劳资合作问题，提出了一整套改良主义方案。1934年，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对华侵略扩张，蒋介石采取“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对红军发起第五次“围剿”时，艾迪又亲华跑了2¹个城市，举行多次布道大会，大讲“青年与宗教运动”，企图以此来影响青年行为，吸引青年信仰宗教，以防止青年人倾向共产主义。

基督教男女青年会的智育主要抓教育和出版两方面的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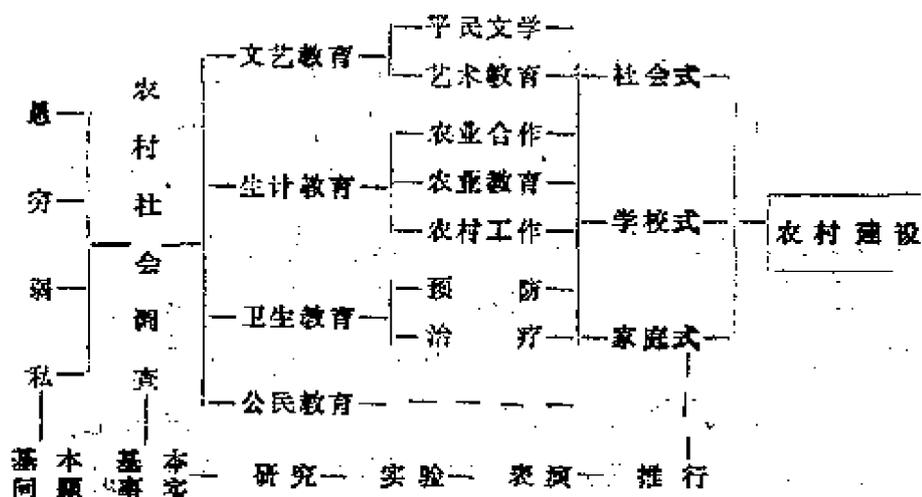
教育工作主要是开办各种类型的学校。如创办少数青年会中学，开办半日学校、夜校、补习学校、儿童义务学校和文盲义务学校以及现代教育、公民训练、职业指导、读书会等。

基督教男女青年会市会教育工作的重点是搞平民教育。平民教育是由青年会干事晏阳初发起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他在法国华工中开展识字教育等活动，回国后，他认为国内文盲多，这是关系到国家民族前途的大事，于是在全国各地大量开设平民学校，自编教材《平民千字课》，还订了一个铲除文盲的计划。在该计划的推动下，青年会于1923年8月在北京举行了全国平民教育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平民教育促进会（简称平教会）诞生，晏阳初任干事。此后就形成独立的平教运动。1933年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与平教会在河北省定县联合举行了一次平民教育现场会，盛况空前，得到美国大资本家洛克菲勒赏识，愿出资100万美元扩大这种试验，后因日本帝国主义侵吞华北而作罢。

平教会认为当时中华民族已衰老、堕落、涣散，根本的问题是“人”的改造问题，于是就针对当时社会的四大弊病：愚、穷、弱、私；提出四大教育：以“文艺教育”培养

知识力来救“愚”；以“生计教育”培养生产力来救“穷”；以“卫生教育”培植强健力来救“弱”；以“公民教育”培植团结力来救“私”。在定县，他们还提出了“除文盲、作新民”的口号，以千字课为课本，使全县人识字，并养成科学的头脑、合作的习惯，坚强的体魄，平与仁的精神。为推行四大教育，他们又提出了“学校的”“社会的”“家庭的”三大方式。平教会的工作分5个步骤：调查、研究、实验、表演、推行。整个平民教育实验的内容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见下图表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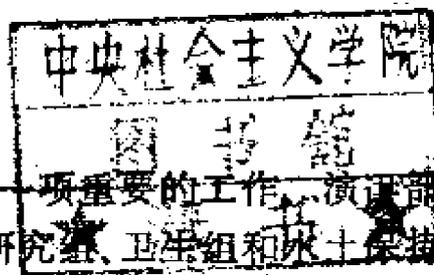
工作系统表



校会则以公民教育为重点，他们提倡“人格救国”、“读书救国”、“合作救国”。如刘湛恩负责举办的“公民教育运动周”活动和创办公民训练所等就是一个例子。

讲演工作主要是通过中国基督教男女青年会演讲部和布道者开展。

基督教青年会演讲部自饶柏森在1906年组织起来以后，



青年会全国协会一直把其视为一项重要的工作。演讲部设了4个组，即科学组、教育问题研究组、卫生组和水土保持组，外加一个准备表征材料的实验室，进行准确、通俗、用实验来说明问题的科学演讲。演讲中它还针对人们“耳听为虚，眼见为实”的心理，采用直观教育法，即用幻灯片、图解和活动电影片来说明有关旅行、工业及种种题目，效果甚佳。如教育问题研究组的演讲员余日章曾在14个省份做了带有实物表征的演讲。这些演讲使许多城市里有势力的人物感动得落泪，并采取了坚决的行动。

基督教男女青年会还通过全国协会的出版部，出版中文书刊：供青年会内外人员阅读的普通读物和专供董事、干事及会员用的专业书。

普通读物主要有科普书籍，关于德、智、体育、经课传记、立身处世、社会服务、布道灵修等书，其目的是：1. 为了在知识分子中间为基督教创造有利的接触点；2. 为了培养基督徒信念和激励其服务精神。

专业书有青年会沿革之历史、组织原理、组织管理方法等书籍。

男女青年会自一诞生就着手办会刊。青年会在1897年就创办刊物《学塾月报》，每期1页；后改名为《青年会报》，每期4页，每年出6—8期，每册附铜板图画一页。1907年3月扩充到13页。1906年2月《青年会报》又改名为《青年》月刊，同时又办英文青年季刊。1911年又创办《进步》月刊，1917年《青年》与《进步》二月刊合并为《青年进步》。1921年市会创办机关报《同工》，1928年校会创办机关报《消息》。

女青年会在1917年即创办《女青年报》，开始是季刊。1920年起改为月刊。

男女青年会的出版部随着它们活动内容的拓宽，其出版物的内容也在变化。早期男女青年会的出版部着重宣传宗教。1920年后，随着青年会活动由社会服务转化到社会改良，出版部门的注意点也逐渐转移到青年与宗教问题、社会潮流转变中青年会对青年的责任等。出版物的内容大都是讨论基本的社会原理和世界各地社会主义的实验情况，出了许多改良主义的读物，如改良和持基督教观点的爱国主义小册子等。仅1920年就出版新书和重版书高达233100本，《青年进步》月刊每期销售7500份^⑥。

从上所述的教育、出版工作的大致情况就可看到，基督教男女青年会的智育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演变着的，不是静止不变的，是参与社会生活的，不是超世的。

体育是通过中国基督教男女青年会体育部开展的。中国基督教男女青年会可说是中国体育事业的开创者。来华第一任总干事来会理牧师很重视体育工作。他创办体育部，引进当时流行于西方的体育项目，举办体育讲座、卫生讲座，宣传体育锻炼能增强体质，锻炼人的意志，增添乐趣，扩大影响，吸引青年人参加体育运动；开设健身房、游泳池、弹子房、篮球场等体育健身设施，组织体育竞赛，训练体育师资和裁判员、教练员，同时还积极组织运动会。中国最早的运动会是他们于1902年在上海和天津举办的，1909年在南京举行的中国第一次全国运动会也是青年会主办的。他们在1913年和1915年与菲律宾、日本青年会联合组织了两次远东运动会。他们还开办体育学校，组织中国业余体育会。体育工作很快打开局面，成为青年会一项普遍的、有影响的活动。连当时被封建枷锁锁在深闺的妇女都逐渐走出家门，投身体育活动。1916年女青年会体育部在上海创办了中国第一

个基督教女子体育训练学校。1921年6月女青年会体育部征集了上海1000多名女学生在远东运动会上表演群众活动和集体游戏。

群育工作主要是中国基督教男女青年会参与劳工和农村改良实验等活动。男女青年会全国协会都设有劳工部，帮助产业工人众多的各城市青年会开展工作，在农村和劳工中进行改良主义实验。美国大资本家洛克菲勒为支持这种实验，曾于1923年至1925年间捐款25000美元。青年会先后在上海浦东建立“劳工新村”、在上海沪西设立“沪西公社”。青年会还与沪江大学联合办了一个“沪东公社”。1928年，青年会又在苏州唯亭山举办了一个农村服务试验场。最出色的是1933年晏阳初在河北省定县设的中国农村改造试验中心，用四种教育改造中国农村的贫愚弱私四种弊病，很成功，成了当时致力于农村建设者的楷模。尤其是青年会与平教会联合举办的平民教育现场会更是轰动一时。

中国基督教男女青年会在开展四育活动时略有不同。从19世纪末到新中国成立，中国妇女绝大部分被“妇女无才便是德”、“男尊女卑”等封建绳索捆在家中，只有到她们自己的家中才能找到她们，而要她们出来开会、活动就很难，要请她们长期担任工作更是难于上青天。走出家门的妇女很少，而有团体工作经验的妇女更是凤毛麟角，所以，女青年会的工作就比男青年会要分散，并且难开展。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妇女逐渐挣脱了封建枷锁，走出家门，女青年会的工作也由难变易，特别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在男女平等的口号声中，妇女大批冲出家门，走向社会。长期以来，妇女解放运动是女青年会的一项主要任务。女青年会的活动内容也有其自己的特点。她们于1923年10月在杭州召开的第

一次全国大会就确定了禁烟(吸食鸦片)、放足、提倡平民教育和改善妇女生活待遇为女青年会的主要活动内容^⑩。

中国基督教男女青年会开展德智体群活动的目的是为了发展青年四育俱备的基督化人格，引导青年归向基督。

通过对中国基督教男女青年会的透视可见，19世纪末的中国已在列强用枪炮逼订的众多不平等条约下丧失了主权，演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人民在三座大山的压迫下，过着屈辱、贫穷、痛苦的生活。反对帝国主义、挣脱不平等条约的枷锁和向西方学习科学技术、振兴中华的矛盾心理是当时主要的社会心理。基督教男女青年会一则在政治上受不平等条约的保护，二则在经济上依赖西方资产阶级提供的经费，三则列强常以教案为借口发动侵略战争尤使中国人民愤怒。当然基督教男女青年会不等于教会，但它们与教会关系密切：教会因它们接触面广而希望通过它们散布基督教的影响，逐步使人们慕道、信主，成为某个教会的信徒。故各地教会都大力支持青年会，教会内部一些有地位、有权势的教牧人员担任青年会的董事等职，以上三因素势必引起人们对它们的反感。另一方面基督教男女青年会是基督教社会服务性机构，主要从事社会服务工作，它所开展的传播西方科学技术、兴办女工夜校、平民学校、举行文娱体育活动等工作又受到人们的欢迎，特别是青年人的欢迎，因为这一些活动正符合青年求强、求新的心理，同时，中国基督教男女青年会干职人员在开展社会服务时，也受到社会上各种思潮的影响，所以，基督教男女青年会中思想开明、关心社会、追求真理、主持公义、爱国爱教的人为数不少，他们易与广大人民相一致。

上述诸因素决定了中国基督教男女青年会起伏跌宕的命

运、它们与中国青年运动势必时而相悖、时而相融。

〔注释〕

①顾长声的《传教士与近代中国》第29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②《青年会的过去与未来》来会理讲，刘良模录，载《消息》民国21年（1932年）12月20日

③来会理的《中国青年会早期史实之回忆》，载《青年会50周年纪念册》

④1907年纽约出版，穆德编著的《世界征服中的重要点》转引自《青年会50周年纪念册》第194页

⑤共青团中央研究室编《中国青年工作年鉴》第527页（1986年）

⑥摘自《中国基督教学生运动史》

⑦《青年会干事应具有何种之资格》著者来会理，何君肥笔述，载《青年进步》第一册。

⑧另一说：基本会员或称同宗会员是由董事会在一些知名的基督徒中邀请。如上海青年会的100余名基本会员就是上海董事会邀请的，他们有选举、被选举董事的权利。每年举行一次“基本会员年会”改选1/3董事。董事任期3年，每年改选1/3。会友通过征求会招募。此说系罗冠宗回忆。

⑨司德敦编《中华归主》第796页

⑩《上海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40周年纪念特刊》

⑪共青团中央研究室编《中国青年工作年鉴》第526页（1986年）

⑫摘自《青年进步》第6册第30页。另一说，董事会下

面是干事部，其中主要是总干事，由总干事再聘用其他干事，提请董事会通过，其余各部是在干事部下面。不同时期“部”的设置有所不同。此说系罗冠宗回忆。

⑬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第307页

⑭杨雅彬《中国社会学史》第180页，山东人民出版社

⑮《中华归主》第789页

⑯全国妇联妇运史研究室编《中国妇女运动史》（试用教材）第74页。

第二章

西方文化的传播者

一、传播科学文化知识

1840年以来，列强一阵紧一阵的洋枪洋炮的轰炸声，一个又一个的不平等条约，终于使中国青年知识分子从中央天国的美梦中醒来，特别是看到中国自从资本主义经济成份壮大，封建等级制和家长式统治已难于管理社会化大生产的经济，传统的重义轻理的文化模式严重地阻碍了中国人思维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传统文化长期陶冶出的民族性格也暴露出其不适应近代社会的一些弱点……仅传统文化难于承担中国近代化的任务。中国知识青年开始反思几千年来一直深信不疑的传统文化，开始注意历来不屑一顾的夷邦文化——西方文化，慢慢悟出西方强盛与文化有关，西方文化可利用，同时列强也看到坚甲利兵能征服中国人的躯体，但无法打开中国人的心扉，于是他们又采取文化侵略措施，成千上万的传教士在不平等条约的保护下涌入中国。据不完全统计

计，从《南京条约》签订到1914年，进入中国的传教士，仅新教传教士就达5400多人^①。他们深入到中国各地，大肆进行传教活动，企图改变中国人的信仰，但收效甚少。中国青年对基督教不感兴趣，对传教士的讲经，起先还有人怀着好奇心听听，渐渐地就连一个听众都没有了，即使有人信教，也不是真信教，无非是出自实用主义心理：想教会的好处，即信的是面粉教、福利教、出国教、奶粉教……虔诚的教徒寥若晨星。这种现象促使传教士探索新的传教方法——改单纯的、直接的传教为多角度传教。他们开始在中国传播西方文明、建立学校、医院、出版书籍、开展文体活动等来影响中国人，吸引中国青年，感化他们的思想。青年成了他们的工作重点。他们深知“中国的命运端赖它的许多青年……老年人是随处被传统思想及责任所束缚的，青年人则不然，他们有勇气脱离过去的关系，为中国造成一个新命运。基督教青年会以一团体的资格自然有机会去转移中国优秀青年的思想及生活。”^②于是，他们就借助青年会开展传播西方文明的活动。西方文化源源引入中国，西方文化的冲击波开始打开传统文化的缺口，冲击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甲午战争失败，震动了举国上下，为了救亡图存，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奔走呼号，西方思潮如潮水般涌入。“进化论”、“民权”、“文明开化”等用语成为一般青年的时髦用语。“文学救国”、“科学救国”、“教育救国”等口号响彻中华大地。青年会也赖此多种因素得以大展宏图。

19世纪末出版印刷事业还不发达。物以稀为贵，书籍对青年人的吸引力较现在强多了。中国基督教男女青年会就注重利用印刷媒介宣传西方文化。它们在创始时期就办刊物、出版书籍，尤其是在1896年以后，全国人民的思想迅猛向新

时代推进，男女青年会把握良机，传播西方文化。正如范百海在《青年会对于文字之贡献》一文中说的：“值此时期，深愿做全国思想的领导者，输入西方文化，以为中国固有文化的辅助，并认定此种工作，为青年会文字事业的天职。十年以来，马不停蹄的一意迈进。……《青年》报既是风行一时，每期销数至七八千份。其他重要的伟大书籍也愈出愈多”。就书籍出版而言，1912年前只出版了20余种小簿本；1912年后由90余种增加到几百种较大的巨帙。书籍内容有：

（一）宗教书：宗教讨论类有21部，经课类有38部，灵修类有14部，还有阐扬基督教义方面的书，译自西方宗教界的书及布道小笺等。（二）科学常识书：自然科学方面的有医药卫生书；农林业技术书及用浅显易懂的文字介绍普通科学知识的书；社会科学方面的有社会问题类15部、公民教育类30部、平民教育类14部和体育类26部；（三）人生哲学书：立身处世类30部，有专门介绍西方哲学的书，也有以中国文化为背景探讨西方哲学的论文集。（四）文艺书：传记历史类、故事小说类。主要是用文学手法描写基督教的故事，历史及思想的书。（五）国际问题书：以浅近适用的政治文字提倡国民外交，促进国际和平，沟通东西文化。（六）会务应用书：供青年会内部应用的书刊，如会务类书。（七）综合类书：如吴耀宗主持的青年丛书共有52种，包括性生活、社会、宗教、修养四方面内容。（八）妇女解放的书，如提倡妇女教育、解放妇女天足、确立妇女“人”的地位、批判“三从四德”等旧观念，提倡男女平等，鼓励妇女走出家门参与政治的书籍等。

总之，当时流行的新思想、新道德、新知识、新信仰以及个人卫生、学校卫生、家庭卫生、社会卫生及两性问题

等，都可以从青年会出版的书报中看到。中国基督教男女青年会出版部出的书品种繁多、内容丰富多彩。西方文化通过这些印刷媒介展现在青年眼前，同时，中国基督教男女青年会还将西方文明、体育卫生事业引入中国。

体育能提高人民的身体素质、思想素质和锻炼青年的意志力。就如西谚说的，健康的身体，蕴藏着健康的灵魂。健康的人，心地清明、志气坚定、精神活泼、勇敢乐观。然而，在讲究斯文的中国，一直认为柔弱的白面书生是高雅者的外貌标志，故直到二十世纪初还没有建立系统的现代体育运动事业，国民的体质也就普遍较差，被人贬为“东亚病夫”。不过，体育运动同样受到活泼的中国青年的喜爱，中国基督教男女青年会创建了中国第一所体育学校和女子体育训练学校，举办了中国第一次全国运动会，发行了较齐全、正确的体育书籍。

1909年，北美协会派体育干事艾司诺博士来中国建立现代体育系统。1910年艾司诺博士就在南京趁南洋工业展览会举行时举办了第一次全国运动会，出席的运动员有150多人。1914年北平青年会在北平天坛举行了第二次全国运动会。1924年武昌青年会在武昌举办了第三次全国运动会。一切现代运动的比赛项目在这次运动会上都齐全了，如足球、篮球、网球、棒球、中国拳术、田径赛等等。这三次运动引起了别的教育机构对体育的重视。许多体育团体在全国各地相继诞生，以后的运动会就直接由政府部门举办。全国体育协进会也随之诞生。

在基督教青年会的倡导下，中国成为远东体育协会的一个活跃会员。1921年远东运动会在上海虹口公园举行。中国不仅有男运动员出席这次运动会，并且有1000多女学生参加

运动会的33个项目^③。国民党中央政府还决定参加世界运动会。1932年中国短跑健将刘长春参加了在洛杉矶举行的世界运动会。

体育活动在基督教男女青年会的倡导和推动下，在学校、社会普遍开展，体育团体也不断诞生，各处都建立了游戏场所。这受到青年人的欢迎和关注。他们不仅积极参加体育运动，还深入研究体育运动，如恽代英同志曾在《青年进步》杂志第四册上发表文章《学校体育之研究》。特别是女青年会首创妇女健身运动，女子体育学校训练了一批批的女子体育人才是对妇女解放运动的一大促进。

几千年的封建习俗、封建道德规范要求女子笑不露齿、足不出户，并提倡脚裹得越小越好；三寸金莲成为美女的标志、代号，致使中国女子深居简出、失去了言行的自由和健康的身体。基督教女青年会提倡的天足运动使中国女子免去了缚足的苦刑，体育运动使其获得了行动的自由和健康的体魄。

《刺一下‘肮脏的’中国人》是1989年2月12日香港《大公报》发表的文章。文章谈到“中国人的‘脏’亦是‘老大难’关。脏的历史是很悠久，只有到了人民政府手里，才下力气治理过”。确实，20世纪初，中国卫生极差，严重影响了人民身体的健康。传统伦理规范是：男女授受不清，分娩不能请医生（当时因女子不出家门，故医生均为男性）而请接生婆土法接生，不消毒、不科学，致使妇女分娩如过鬼门关，为此殒命、得病者不计其数。

家庭卫生更差。中国传统习俗的核心之一为注重孝道。父母病，子女须亲侍，不住院、不隔离，病人的食物、汤药须由子女先尝甘苦，再奉给病人，且病人剩的饭菜也由子女

代吃，加之随地吐痰，传染病到处蔓延。

传统习俗之二：勤俭治家。全家合用一块毛巾，（当然穷困也是主要原因）以致沙眼传染利害。

传统习俗之三：视厨房为污秽不堪之所，故苍蝇满室，饭具器皿污浊都不介意，反认为苍蝇、蚊子、跳蚤、臭虫是夏令必有之物，并不考虑其产生原因是环境卫生太差，它们是传染病的媒介。

传统习俗之四：见到熟人的婴儿，以接抱小孩接吻来表示爱抚，不知道婴儿抵抗力差，接吻易传染疾病。

迷信，有病不求医而求神，以神物、香灰为药，结果使病情更趋严重。

厕所、水源等均不注意卫生，加之那时还有酗酒、押妓、吸毒等恶习造成的花柳病等。

针对以上情况，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与中华医学会、博医会联合组成了卫生教育联合会，专门进行卫生工作。为了扩大影响，就公众卫生研究举行悬奖徵文活动。

女青年会还在各地发起卫生运动，如上海女青年会举办好婴儿卫生展览，健康比赛及营养补助、医药救济、创办诊疗所等活动。

中国传统习俗之五：认为性本能是一种反面的负值的東西。“性”在传统习俗里是一个“脏”字，是难以启齿的兽性，被视为洪水猛兽，谈“性”色变。然而，越将其视为禁区，越引起青少年的好奇心，甚至因此而陷入泥坑。由于性知识、性道德的贫乏而造成的婚恋悲剧举不胜举，就是维系着的家庭也无幸福可谈。正如北大出版的《新潮》杂志里《对于旧家庭的感想》一文的作者所说：“中国之旧家庭犹如‘古庙’，稍佳者比之为‘观音殿’，其劣者比之为‘阎

罗殿’。盖中国人之视家庭，极似彼头脑昏沉者，做那‘古庙’中渗淡无聊的生活也。若要略寻快乐，又非置身社会恶丛中不可。有友人来访，则宁可多费金钱而导致茶馆、菜馆、戏馆、旅馆，不愿请其友人到家中话旧谈心，品茶共饭，无非因家中秩序纷纭，积尘盈寸，羞以示友人也”。可见，青年人一生的成败、幸福与家庭中两性关系是否正常、家庭生活是否美满分不开的。鉴于此，基督教男女青年会采用各种形式对青年进行性教育，就两性问题给青年以正当的指导，他们传播性的科学知识、进行性的公开教育，破除性的神秘感，使更多的人在性生活中得到乐趣，使更多的家庭通过性的纽带得到巩固。同时，他们还着手改良中国家庭，将西方的家庭介绍给中国青年，改变中国人的家庭观念，提出四条措施：（一）必须使家庭舒适：房屋不求大而华丽，但求质朴清洁，布置雅致，改变有钱就购置华贵的服饰，招摇过市，向市人夸耀自己的富有，而家中则任其污秽不堪的旧观念。（二）公余时间不要消磨在灯红酒绿之处，而应到家中休息，并破除男尊女卑思想，帮助妻子共做家务。（三）应有适当的消遣法，以娱身心，如读书看报、唱歌奏乐、游玩运动等，而应戒除嗜赌等不正当的消遣法。（四）在家应酬。朋友往来不在阔绰，在家应酬也不应大摆酒席，呼吆喝六，杯盘狼籍，朋友之交不应建立在食品上，而应注重学识上、道德上、精神上。中国基督教男女青年会会员为将中国家庭改良为象西方一样，成为一个增进乐趣、发生美感、宜于交际的场所而作出种种努力。他们除提出上面四条措施以外，还采取了许多方法：他们出版发行性知识书刊、举办性知识演讲会、普及科学的性知识；举办家庭问题演讲会、研讨会；开设家政学讲习班，进行家庭组织、家庭科

学、家庭卫生、家庭工务知识教育；发动保婴运动，灌输保婴知识；每年举办齐家节、思亲节、父子会、母子会等，促进齐家意识、改进家庭生活；介绍有益的娱乐活动，如各种健身运动、音乐活动等等，并提供娱乐场所，以高尚的娱乐活动吸引好动的青年人，使他们不至于因无聊而步入歧途，或沉溺于花天酒地，或流涟于赌场烟窝。

人的素质与文化水平关系密切。中国基督教男女青年会为提高中国青年的文化、智力，努力开展公民教育和平民教育，干得很出色。

普及公民教育首先要使公民识字。青年会特聘文字专家将日常用字编成千字课，由浅入深、分期教授。自青年会提倡后，识字教育风行全国各地，各地都用千字课为课本提倡义务教育、成人补习教育。

幻灯演讲是公民教学中行之有效的办法。中国人一般形象思维强于抽象思维，故普通演讲很难引起听众兴趣，于是他们就采用形象教育的方法，将演讲内容编成幻灯教育图表，如各国人民教育程度与中国人民教育程度比较表；人民不识字之痛苦情况表；国旗、国歌、地图、各种教育图表；公民教育图画12张；公民唱本16种等等。因当时电影没有，幻灯就象电影一样吸引力很强，美丽的图表引起听众兴趣，演讲者再按图说明，发表议论，使听众很快就了解内容，且经久不忘，效果非常好。

中国基督教青年会每年还在全国各大城市广设公民训练所，训练公民获得所需知识。训练所训练时间一般为六至八个月，所授课程有：（一）社会问题。（二）地方自治。（三）殖边问题、内国问题、三民主义、农工问题、国际问题、不平等条约、怎样做公民、公民与自治、生活问题、经

济问题、政治问题……

乡村的公民教育，青年会采取设置暑假服务团，组织宣传队，携带各种简章及教育用具到乡村各处举行公众演讲，编印适宜的公民教育刊物、教材，分贴在乡村各处墙壁上；同时调查乡村的各种需要及工作状况汇集付印，以供改良乡村者参考。设置乡村民众学校，用千字课作教材，扫除文盲，使乡民能读报看书写信，便于灌输公民常识；编公民教育丛书数十种作为公民教育课本，内容都是公民必备知识，如公民教育运动计划，国际问题讨论大纲，不平等条约讨论大纲，关税问题讨论大纲，领事裁判权讨论大纲，公民研究团办法，爱国者应研究的问题，和平运动、公民诗歌、廉洁问题，卫生运动实施计划，增订公民纲要等等。

1929年，中国基督教青年会仰承国民政府之意志，协助政府向公民灌输市政知识，使市民了解市政建设意义，及市政与民主政治的关系。他们编印市政常识图，市政与公民教育之关系图表，市政常识丛书，组织市政训练班。

各地青年会在举办市政训练班，举行模拟市议会议员选举、模拟创制复决罢免之投票。

青年会贡献最大的是首创平民教育事业，即民众教育。几千年来的封建专制统治者实行的都是愚民政策。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我国派出20余万华工到欧洲战场去帮助英、美、法三国军队做工。这些华工大多来自山东及沿海各省。他们远离家乡，人地生疏，加上没有文化，常因精神空虚无聊而做出有伤国体的事。美国青年会鉴于此，特发起组织华工青年会，聘我国留学生晏阳初等50余人赴战场为华工服务。他们寄身于华工营中，亲眼目睹苦力的生活状况，感到教育是华工最需要的，于是华工青年会就将教育事业作为重

要任务。他们采用各种方式开展教育工作，如办夜校、举办演讲会、编周刊、写家信……二年多的教育使华工受益非浅。

晏阳初等人回国后，打算在国内继续办平民教育，国内环境与华工营不同，平民教育的对象比华工复杂得多，所以，华工用的教材于国内平民无益。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他们首先着手编写课本，平民千字课四册，然后掀起大规模的识字运动，在全国选了几个点。

第一个大运动于1922年春，长沙青年会联合当地各界人士在长沙掀起。他们招收了1400多名目不识丁的学生。这些学生年龄为11岁至42岁，来自各行各业。他们将这些学生分在五个平民学校学习，每晚上课。经过四个月的学习，学生中考试及格毕业者有967人，约占总学生数的69%。

第二个大运动设在烟台，也是由烟台青年会发起，大致情况与长沙相同。有区别的是这次学生不象长沙都是清一色的男生，而是男女生都有，共招收了1800人，经过四个月的学习，考试合格者达1250人，约占总数的69.4%。

第三次大运动设在杭州，受当地地方官重视，招生全由警察负责，共招收了2000名学生，分在八十所平民学校学习。经过四个月的学习，1434名学生考试合格毕业。毕业率高达71.7%。

这三个试点都很成功，引起了国内教育家的注意。陶行知、胡适之等人均就近到各点参观，目睹现场情况后都认为这种识字大运动应在全国推广。

1924年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总会成立，会所设在北平。朱其慧任会长，聘晏阳初为总干事，接着各省都纷纷成立分会。瞬间，平民教育事业风起云涌，迅速推广到全国各地。南

京、上海、汉口、南昌、苏州、宁波、北平、济南、天津、太原、开封、郑州、重庆、成都、广州、汕头、厦门、福州、大连、沈阳、哈尔滨等21处青年会都相继举办大规模的识字运动。小规模识字活动，如设立平民学校等几乎全国所有基督教男女青年会的市会和校会都在搞，平均每个青年会都设有一二所或三五所平民学校。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各地青年会所教授过的平民学生达25万左右。

基督教青年会开展的平民教育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初级教育以千字课教育为主，历年销售的千字课课本达百万册以上，也有针对学员情况自编教材的，如沈阳车向忱与青年会工作人员郝克勇于1925年在沈阳小南关第一监狱创办的沈阳第一所平民学校，也是沈阳最早的工读学校，因学生是幼年监的200多名轻罪犯，他们就针对学生的特殊心理，编写一些教育孩子们热爱劳动、并尊重别人劳动成果的课文，如：出自己的力，流自己的汗。自己的事，自己干。劳动不偷懒，勤学加苦练，大家争当英雄汉。^⑤继续教育有平民高级学校，它注重常识如历史、地理、算法、书信及卫生等课。还有平民图书馆，收集一切关于平民的读物，供人随意翻阅。有平民同学会：由学生自动组织，教师参加做顾问，其宗旨是联络感情、研究学问和服务社会，凡平民学校毕业的学生都要参加，以尽会员的义务（后来含有强迫性）。还有平民讲习会。宗旨是增进平民知识和技术，活动不定期，有一周一次的，也有一月一次的或数月一次的，具体视各地情形而定。

平民教育在文化教育上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不过，因它只触及到当时中国社会“愚、穷、弱、私”的表层，而没针对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源——不合理的生产关系，所以没有也

无法根治社会问题。

各地基督教女青年会还专门为女工开办了女工夜校。女工夜校的宗旨是提高女工文化水平，以达到改善生活。它为许多平民妇女解除不识字的痛苦，培养了不少妇女人才，尤其是上海女青年会办的女工夜校在邓裕志等人的努力下，办得非常出色，她们从1930年到1948年就教授了11400名学生。详见下表：

年	1930	1931	1932	1933	1934	1935
学 生 数	400	300	400	500	500	500
年	1936	1937	1938	1939	1940	1941
学 生 数	500	500	600	800	800	700
年	1942	1943	1944	1945	1946	1947
学 生 数	600	300	200	700	1000	1000
年	1948					
学 生 数	1100					

女工夜校的开办、发展并非易事。因当时女工每天的工作特别繁重冗长，加上社会、家庭、封建伦理的压迫，要她们挣脱这一切，晚上出来上学，其难度可想而知。起初，尽管女青年会的干事绞尽脑汁、想尽办法，采取各种方式，如放映电影、茶点招待……也只能吸引几个学生，不过，她们并不灰心，继续努力。皇天不负苦心人，局面终于打开，女工夜校在各地出现，来上学的平民妇女也越来越多。

事物是复杂的。列强入侵给中华民族带来说不尽的屈辱

和痛苦。然而，客观上却又使中国人跳出井底，看到西方工业发展之迅速，工业水平远远超过中国。这迫使中国人求强求富。在实业救国的旗帜下，民族工业开始发展，同时，列强也利用不平等条约在中国开矿、办厂。只是工业的发展给工人带来的却是生活每况愈下，日益窘迫、衣不蔽体、食不果腹，住宅更是卑陋不堪，阶级矛盾日益尖锐。为诊治社会现状，基督教男女青年会推行改良主义，掀起劳工新村运动，企望通过实施劳工新村制度改良劳工的居住环境、进而改良社会运动。根据友爱、互助、清洁、俭约等原则改良劳工生活。劳工新村实行自治、推行劳工教育，最后通过该试点达到健全的新社会、新国家。

通过九年试验，较有成效的是上海浦东劳工新村。

1925年，上海基督教青年会鉴于上海劳工住房条件大都较差，拟在浦东创办一个小规模的劳工新村。1926年建成住屋12所，公社1所。1928年冬天又在各界资助下，添造房屋12所，至此共有住屋24所。住屋不但内外整洁，且光线、空气都很好，占地六亩。另建有公社一所，学校一所，运动场一方。浦东新村实行自治，订有村规。公社是劳工新村的中心。公社根据财力逐项举办平民教育、儿童教育、职业指导、改良家庭运动、节俭卫生节制等运动。故新村不仅改善了劳工的住房条件，且改造了劳工的精神生活。住户间感情渐渐融洽，绝少争吵。村民通过教育，文化水平普遍提高，全村80多人，除最老、最幼者以外，全部识字。迷信、赌博已绝迹。村民对村中公益事情都积极参加，且肯负责任。

中国是一个农业人口占80%的农业大国。二十世纪初，由于列强经济势力的侵入，加上天灾人祸，农村经济濒临破产，农民极度贫困，且无机会受教育，文化水平低下。故

“到民间去”、“复兴农村”、“建设农村”的口号成为当时社会的一种普遍呼声。基督教男女青年会在国外是光从事都市运动。传入中国后，作为一个社会服务机构，面对中国现状，也不可能漠视农村。

为农村服务，对于青年会来说是一项创举。他们先搞了几个试点。

青年会全国协会与苏州青年会合作，在唯亭山创办了一个农村服务的试验场。唯亭山位于苏州与昆山之间，交通方便。山的周围二里内共有小农村22处，计有农户500户，人口2000左右，民风淳朴。试验场工作主要抓德、智、体、群、经济五项。

他们制定的工作大纲是：

（一）救穷（经济）。

甲. 改良农业方法。

乙. 提倡副业。

丙. 组织各种合作社。

丁. 劝导节约。

（二）灌输常识（智育）。

甲. 提倡识字运动。

乙. 通俗演讲。

丙. 讲解新闻。

丁. 壁报。

戊. 书报室。

（三）提倡卫生（体育）。

甲. 演讲公众与个人卫生常识。

乙. 分期卫生运动。

丙. 介绍简易药品并介绍医生。

丁. 养成少年卫生习惯。

(四) 改良社会生活(群育)。

甲. 激起爱乡精神, 促进团结能力。

乙. 提倡地方公益事业。

丙. 化除恶劣习俗。

丁. 提倡有益的消遣。

(五) 培养人格(德育)。

甲. 服务者以身作则。

乙. 用诚恳的友爱与农民交往。

丙. 讲解人格与物质进步的关系。

丁. 用相当的图画提醒为人之正道。

这计划后来在实施过程中略有改变, 但无大更动。经过几年试验, 唯亭山农民改变了旧观念, 无论在精神、文化、经济或社会生活上都有了显著的进步。

唯亭山农村服务试验场试验成功后, 全国有10多个青年会都相继办起了农村服务机构。

芜湖青年会于1931年水灾后, 即在该埠丁桥设立农村服务处。该处有农村10处, 住户102家, 人口994人, 田2194亩。芜湖青年会除了举办合作社教育、副业、建筑社等, 还创办消费合作社、农村诊疗所、浴室、种痘、幻灯演讲、德育演讲、民众学校以及改良种子, 种棉植树等活动。

杭州青年会于1932年在杭属四区丁桥设立农村服务点。他们在丁桥建造了3间房屋, 作为办事员的住宅、办公室、诊察所、俱乐室、图书室等, 还建立了一间教室, 用以开设各种训练班、识字班。

香港青年会先后在新界屏山和水地设农村服务试验区。服务方针以指导协助为主旨, 设立乡村小学、乡治促进会、

平民学校等。民众服务部主要开展卫生演讲、幻灯演讲、旅行卫生展览、建设格言牌、创办平民阅览处、问字处、代笔处等工作。

广州青年会的农村服务工作与上面各青年会不同。它主要侧重改善农民生活，先从市郊着手，采取流动式的循环服务。服务项目有常识演讲、时事报告会、卫生幻灯、益智电影、挂图展览等，增加农民知识，开展正当娱乐活动。

南京青年会与金陵大学合作举办了霞曙农村改进社，地点在南京中华门外殷行镇霞曙村。工作计划为文艺教育、卫生教育、公民教育、生计教育四项，很受农民欢迎。

此外，太原、宁波、福州、重庆、济南、西安、大连、哈尔滨等处青年会都仿效唯亭山，结合当地情况开展农村服务工作，目的都为改善农民生活，提高生产力。建设美满农村。

农村实验虽取得一定的成绩，但因生产关系没改变，农村经济的核心——土地问题没解决，所以农村问题不可能彻底解决。

女青年会在改善劳动妇女生活待遇方面也开展了一些活动。女青年会于1921年就成立了劳工部，两次派人参加在日内瓦召开的国际女子劳动大会和国际保工大会。她们在工厂办义务教育，还与中英美妇女会联合向上海租界工部局提出“订立保护童工条例”，包括禁止12岁以下幼童做夜工，并到处张贴“解放童工”的广告。1922年上海丝厂女工罢工，女青年会联络妇女团体为女工呼吁。这些活动得到社会舆论的支持和赞誉，女青年会因此而名声大震^⑨。

中国基督教男女青年会通过出版发行，体育卫生、家庭改良、平民教育、公民教育、社会改良等活动将西方科学文

化知识引入中国。

二、宣扬宗教文化

宗教教育也是中国基督教男女青年会的一项重要工作内容。无论是男青年会还是女青年会，无论是校会还是市会，宗教一向受到最大的重视。他们出版发行读经课程、基督教社会规范课程，举行布道演讲、退修会、宗教教育班，开展圣经研究工作，组织会员参加查经班学习等等。

1920年到1921年，女青年会在北平、天津、沈阳、长沙和上海举办短期训练班。参加志愿查经班进行正式研究课程的学生总数约有1450人。

基督教青年会会员参加查经班的人数也历年递增，详见《学校青年会历年比较》表（在第40页）。

自1919年以后，中国基督教青年会与教会的关系渐趋密切。在广州，余日章和赵牧师领导全市布道运动的时候，青年会充当了总部。在天津等城市，干事们在地方教会联合委员会中承担了执行的责任。上海青年会为各教会20个青年查经班提供领袖。在杭州，牧师和教会职员被邀请参加青年会的征求会员运动，目的使他们和地方某些人士认识到，这些人如能被说服，将会成为很有影响的教友。沈阳、吉林、昆明和福州青年会的查经班鼓动青年到教会去。汉口青年会努力使市内教友成为青年会的正式会员。有一位牧师告诉某位宣教师说，他的教堂的教友大部分来自青年会的查经班。

青年会全国协会和女青年会全国协会提倡学生立志传道团和基督教学生运动的目的，也是征募有为的青年加入教会。青年会实施青年与宗教运动就是为了唤起青年对教会的

学校青年会历年比较

年代	校青年会 数 目	学校学生 总 数	基督徒学生 数 目	学校青年会 会员人数	参加查经班 的人 数	本年受洗礼 人 数
1915	135	18670	5832	10572	7612	1086
1919	170	24158	9158	15555	11319	1242
1920	174	29639	10028	18867	10561	1319

兴趣。

在增加教会的青年力量上，中国基督教男女青年会是作了很大的努力，起了很大的作用的。仅青年会请世界著名布道家穆德、艾迪等来华演讲就引领了成千青年加入教会。

青年会除了象中国教会一样大肆宣传个人福音外，还大肆宣扬基督教的社会福音，鼓吹社会改良运动，组织惠工事业，服务劳苦大众，提倡农村工作，改良乡村社会……努力造成入世的社会主义化的天国模范。

仅上面所举的几个方面就可看出中国基督教男女青年会传播基督教也是很积极的。

对此，人们褒贬不一，原因在于宗教是一个复杂的系统。随着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尤其是思维科学的发展，人们开始认识到宗教不是一个简单的系统，思想领域中的历史现象非常复杂；宗教观点与其他思想文化浑然一体，关系密切，不能割裂。正象恩格斯晚年与年轻学者的通信中多次指出的：“不能把人类的精神生活与物质生产活动割裂来理解其中任何一方面，特别是不能忽视思想文化，包括宗教观点对历史进程的作用”。同时，宗教与文化、艺术等一样，胚芽也是由于社会需要而产生。不同的是，各自扎根的社会需要不同，从某种意义上说，有时甚至是相互对立的。另外，它们各自起的作用也是有差别的。

所谓宗教，就是相信在现实世界之外还存在有超自然、超人间的神秘境界和力量，主宰着自然、社会和人生，因而对之产生敬畏和崇拜④。

宗教文化则是文化发展中的特殊形式。它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既是文化的一个门类，又是宗教的一个部分。宗教文化主要指宗教思想、观念和意识，宗教知识入门书、经

典、圣训、宗教艺术品和宗教建筑等宗教器物以及宗教仪式、典章制度和清规戒律等。它是人类社会文化结构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宗教文化在发展过程中与人类文化中的其它因素相互关联、相互渗透，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如宗教诞生是人类在抽象思维发展到能作简单推理时，出于生存的需要，试图解释自然、生命现象而又将偶然并发的事件，如同一时刻有生有死等看成必然的联系：灵魂不灭。古代人类把对自然、社会人生的认识概括为“宗教”的解释体系，它反过来又影响古代人类的全部社会实践活动。因此便形成了宗教与文化的必然联系。宗教文化对各民族的知识、历史文化和艺术生活都具有强烈的影响，双方相互渗透，有时甚至浑然熔为一炉。基督教与西方文化也一样，如基督教经典《圣经》，它一方面是基督教文化的结晶；在文化史上表现了人们渴望独立、渴望自由意志和文化意向，另一方面则表现了人类普遍相信超自然的、奥秘的、丰富复杂并且非常矛盾的体验。又如西方许多流传百世的艺术精品：弥盖朗琪罗的《创造亚当》、拉斐尔的《圣母像》、但丁的《神曲》、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丢勒的《亚当与夏娃》和莫扎特的《加冕弥撒曲》等等，都是宗教题材，为宗教思想、宗教感情所激励而创作出来的。由此可见，西方文化与基督教因缘之深。

宗教文化不是单一的、平面的、静态的系统，而是一个多侧面、多层次、动态的复杂系统。故基督教青年会将其传播到中国的功过之评也是个复杂的问题。

三、西方文化的传播者？

还是列强侵略中国的工具？

中国基督教男女青年会积极地将西方文化（包括宗教文化）引入中国，究竟扮演的是西方文化传播者的角色？还是列强侵略中国的工具的角色？对于这个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似乎没有疑义，人们一致公认其为帝国主义侵略工具。依据之一是列宁的话。列宁说：“一是刽子手职能，一是牧师职能。使用武力和炮舰的一手是容易觉察的，也容易激起我们的愤怒和反抗。但是，使用‘仁爱’、‘友好’、‘慈善’的一手，则是隐蔽和毒辣的，很容易被它欺骗和麻醉。”如青年会进行的活动表面上传播西方文化，起启蒙作用，但实际上，在解放前无论是经济、人事都是北美协会的，只不过它采用了中外合作的幌子。依据之二是中国基督教男女青年会的一些历史现象。它们是在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用枪炮迫使清王朝签订了不平等条约，保证了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特权，也为基督教男女青年会在中国的发展铺平了道路的情况下来中国落户、发展的。基督教传到中国已有一千多年历史，但是鸦片战争之前一直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强大排拒力而无法在中国发展。鸦片战争后，情况突变，基督教势力迅速发展，速度惊人。据1923年中国基督教会年鉴报告：“基督教在全国1713个县中还没有占据的，只有126个县，其余的都树立基督教的旗帜”。据中国基督教教育调查会报告：“耶稣教所设立的小学、中学，全国合计约为6890所，学生达199694人，加上专门以上其他学校，

计7000余所，学生共205000余人”。并且，中国外交每失败一次，基督教就发展一次。另外，教案常是帝国主义为发展势力而发动侵略战争的借口、导火线。每发生一次教案就发起一场侵略战争。1858年，法国借口广西杀了一个法国教士而发起英法联军侵华战争。英法联军破天津，入北平，火烧圆明园，结果以中国割九龙、扩充租界地七处，赔款1600余万两白银而告终。1897年，德国借口山东曹州杀了2个德国教士而派舰队侵占胶州湾后，各国纷纷向华要索。于是，俄国租大连、旅顺，英国租威海卫，法国租广州湾，2个德国传教士之死，几乎使中国被瓜分。1900年义和团运动，列强籍此借口而组织八国联军攻打中国，迫使中国缔结城下之盟，赔款98000余万两白银不算，还断送了国家命脉关税主权。尤其是美国在中国的扩张史，清楚地证明宗教事业被美国作为主要的侵略手段之一。美国为后起列强，当它将目光射向中国时，中国已被英、法、日、俄占领，几乎已无插足之地，美国就采取来中国传教，办学堂、设慈善机关，收买中国人心。待中国人对美国逐渐产生好感时，美国资本家就在中国着手组织新银行团，提出国际共管、开放门户……宗教在美国侵华中起了开路先锋的作用。

依据之三是美国资产阶级统治集团之所以大力支持基督教青年会向亚、非、拉地区扩展的计划之目的是为了利用基督教青年会为其政治、经济政策服务，为其侵略扩张计划服务。正象穆德说的，美国垄断资本集团是没有灵魂的，他们之所以慷慨解囊：美国大资本家投资3500万美元在世界各国建立青年会会所，每年负担青年会经常经费500万美元，并不是慈善动机，而是因为青年会的活动效果完全使他们满意。

基督教男女青年会的终极目标是为传教服务。对此，美国长老会传教士狄考文于1890年在《如何使教育工作最有效地在中国推进基督教事业》一文中讲得很清楚。他说：“可以有把握地说，传教士是为了基督教的利益而办教育的。虽然教育本身有许多好处，但是这些好处本身还不足以调动教会的金钱以及男女信徒们献身的努力……教育是基督教的重要支柱，不容长久忽视。重要的问题是，如何使教育服务于它的最高目标？对此，我的回答是：首先进行全面教育，其次是用中国语言施教，第三是在强大宗教影响下施教。”他又说：“当代教育很多虽说不是怀疑宗教也是非宗教的；因此，有些人准备反对整个教育工作，不愿将西方科学传入中国。这既不是正确的政策，也不是真正的新教教义。我们不相信愚昧是虔诚之母。在中国我们不能不从事教育。不管我们愿意与否，西方科学正在传入中国。基督教若是明智的话，就应站在教育工作的最前列，在中国取得如同她目前在西方所占有的地位，成为中国高级和优良教育的先驱，这是它固有的权利，也是它应尽的义务。这样做可以通过扩大科学文化的影响，来发展它自身成就。”狄考文将基督教教育的目的阐述得非常清楚：为了传教，为了发展其自身成就。传教士在中国人受列强奴役的痛苦岁月中还叫中国人忍受，要接受上帝安排的命运，无疑是为帝国主义的侵略起了枪炮起不到的作用。鉴于以上三个依据，得出中国基督教男女青年会传播西方文化是出于为列强侵略中国服务，是文化侵略者似乎是顺理成章的。

事实上，光有足够的温度，没有受精的鸡蛋也是孵不出小鸡的。如果基督教青年会传播西方文化仅是侵略者的意图，那他们再努力也难在中国传播。基督教传到中国一千多

年，起初，无论传教士怎么努力也难发展。中国人对救世福音相当冷淡，马礼逊到中国达十年之久，才给第一个信徒施洗礼。1922年，梁漱溟先生在其写的文章《今天我们应当如何评价孔子》中说：中国人是世界上唯一淡于宗教、远于宗教，可谓“非宗教的民族”。同年，罗素在《中国问题》书中说：中国简直没有宗教，不只上层阶级如此，而是全民皆然。中国文化的非宗教性使得传教士使尽浑身解数也以徒劳告终。只有在洋枪洋炮的轰击声中，中国人看到了自己挨打是传统文化的不足，西方迅速崛起是其文化使之然，看到中国要摆脱贫穷落后、受欺挨打的局面，需引进西方文化、吸收现代文明，才有“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洋务运动，才有高举科学和民主两面大旗的新文化运动，才有中国基督教男女青年会的教育运动、社会改良运动，即西方文化得以在中国传播是顺应了中国社会发展的某种需要，也就是说外因与内因相结合，温度与鸡蛋齐备才孵出传播西方文化的小鸡。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人们开始从多种角度、多个层次去研究中国基督教男女青年会的活动，尤其是对传播西方文化的活动作了较全面的分析。中国基督教男女青年会在新中国成立前是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工具之一，这不容置疑。但是，它积极传播西方文化的活动要全面分析，它传播的宗教文化有消极因素：宣扬超世的力量，宣扬唯心主义，宣扬逆来忍受的消极态度麻醉了中国人的精神，特别是在列强横行中国的日子里，这些宣传起了枪炮起不到的作用，为列强在中国的侵略消除反抗因素。它传播的西方文明、科学知识等有积极的一面，在思想上对中国青年有启蒙作用，并且对中国青年的身心健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就

是对宗教文化也不能简单地评价。宗教文化是一个复杂的系统，不能认为它全是消极的。

宗教能产生并能流传那么久，尤其是到今天，科学已高度发展到卫星上天的时代，都没能消除宗教在历史和现实生活中的作用和影响，说明其还含有某种合理的因素，还符合当前社会的某种需要。仔细分析也确实如此。例如，不同民族、不同地区产生的不同宗教都寄托了一个共同因素：信仰者的人性要求。宗教教义、宗教崇拜行为流露了信仰者在其受到自然和社会异己力量的支配而无力主宰自己时，对自己命运的焦虑和对自身利益获得的渴望，如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劳苦大众总希望有一个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存在，以便能救自己出苦难生活，虽说这是幻想，但毕竟在其漆黑的生活中给了其一丝希望之光。何况，人生最大的痛苦莫过于心理折磨。象基徒山伯爵选择的最残忍的复仇手段就是将其仇人置于痛苦的心境中，慢慢折磨他，以消自己之恨。当然，宗教行为、宗教文化不能解决信仰者的根本问题，但可使信仰者求得一些心理安慰，解除一些心理痛苦，也不能说毫无益处。

基督教的“摩西十戒”后六戒规定了生活准则：孝敬父母，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贪恋他人的财产，以及他们为了吸引非信徒归从，在道德生活上严格要求自己，从而使许多人自觉遵守社会道德准则。这些对提高人的素质和维护社会治安，保持一个正常的社会秩序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基督教还与西方的教育、艺术、哲学、语言等关系密切，甚至西方的科学发展也与基督教有密不可分的关系。这似乎令人难以相信，因世人都认为基督教会与自然科学长期

矛盾。其实，这只是二者关系中的一面。另一方面，自古以来西方自然科学研究者中又有许多是僧侣。例如英国著名的哲学家、实验科学之父罗吉尔·培根是一位方济各会会士，他著的《大著作》等书都是献给教皇的。哥白尼、伽利略等著名科学家都是修道僧。僧侣从事科学研究似乎很矛盾，其实二者内在有一个共同点，即都试图打开自然与生命之谜。

总之可见，宗教文化是一种极复杂的现象，内中不乏合理因素。故对于中国基督教男女青年会对宗教文化的传播也应多角度去评价。

由于宗教现象扑朔迷离，神秘难测，故它对社会的功过历来争议颇多。中国基督教青年会在中国传播西方文化，宣扬宗教文化是有益于中华民族？还是有损于中华民族？利多弊少？还是利少弊多？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科学技术、思维水平的不断发展，历史将作出全面、公正的判断。

〔注释〕

①雷振阔《宗教概论》河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8月出版

②1901年纽约出版的《北美青年事业50周年纪念册》第447至449页，转引自《青年会50周年纪念册》

③《中国女子的运动问题》，载1924年11月的《女青年报》

④赵复三《基督教与西方文化》，载于《新华文摘》1987年第10期

⑤盛雪芬《教育家车向忱兴办平民教育始末》，载《沈阳文史资料》第九辑

⑥全国妇联妇运史研究室编的《中国妇女运动史》（试用教材）第75页

第三章

冲撞，非基督教运动

基督教男女青年会以基督教新教办的社会服务团体传到中国——一个以农业为主体的，封闭的社会里，一个专制王朝统治下、禁止团体活动的社会里，一个贫困、枯燥、缺少娱乐活动的社会里，对于活泼好奇的中国青年来说，无疑是一个新天地，受到了他们的欢迎，尤其是他们介绍的西方科学技术、体育卫生、改良主义思潮、改良运动等吸引了众多知识青年。进入20世纪，中国基督教青年会的发展势如破竹。1920年，中国3/4的地域被基督教宣称为是他们的责任地，受餐信徒^①达36万余人。基督教势力还渗透到政府机关中，广东省官员中基督徒占65%。到1921年，基督教刊物已达107种。中国基督教男女青年会于1922年也进入“黄金时期”。当时，全国城市青年会有40处，学校青年会有200处。女青年会在全国有城市青年会12处，学校青年会80处。中国基督教男女青年会的各项事业也进展顺利。这从下两表可略见一二。

1920年学校青年会总数量统计

省名 类别	东北三省	直隶	山东	山西	江苏	浙江	安徽	江西	河南	湖北	湖南	福建	广东	四川	总计
校会数目	5	21	24	7	26	12	6	7	6	9	11	21	23	2	174
会员人数	296	2227	1829	569	3376	1311	282	67	317	955	1035	2449	4122	32	18867

中国少年事业——1920年报告

市名	类别	少年会员 总数	参加查经班 人数	宗教集会 出席人数	本年度决心 归主人数	参加各种教 育班人数	参加各种体 育班人数
沈阳	(奉)	16	38	...
吉林	(吉)
安东	(奉)	...	71	1205	8	19	...
北京	(直)	88	...
保定	(直)	115	235	2156	841
济南	(鲁)	104	25	469	14	147	...
烟台	(鲁)	255	46	2325	2	87	...
太原	(晋)	3685	9

续表

西安 (陕)	110	12	79	...
天津 (直)	480	275	3143	...	173	1962
上海 (苏)	1726	829	12253	17	3836	16914
苏州 (苏)	...	129	1200	10	44	...
南京 (苏)	955	510	12631	70	1222	840
杭州 (浙)
宁波 (浙)
南昌 (赣)	362	...	549	35	218	...
开封 (豫)	165	...
郑州 (豫)	...	21	3697	...	21	...
汉口 (鄂)	519	535	840	3	436	5677

续表

武昌 (鄂)	486	520	120	...
长沙 (湘)	538	604	424
福州 (闽)	264	500	592	4364
兴化 (闽)	2	...	38	...	5	15	...
厦门 (闽)	...	140	89	3560
广州 (粤)	82	63	832
香港 (粤)	1087	376	4696	...	38	74	31694
新宁 (粤)	21	...
成都 (川)	607	500	1791	10974
昆明 (滇)	388	51	7314	...	1	331	...
合 计	8080	5379	56201	...	227	9669	78082

然而，正值其兴盛时期，爆发了一场由国共两党发动和组织的非基督教运动，延时五年之久（从1922年至1927年），波及全国城乡。这运动给中国基督教男女青年会迎头一击。从此，中国基督教男女青年会犹如夏季长势正旺的庄稼受到冰雹袭击似的，一蹶不振。

该运动含有两大高潮，1924年前以反世界学盟北京会议为中心，1924年后运动围绕收回教会学校教育权开展。

一. 弄巧成拙，非基督教运动兴起

随着西方文化的源源输入，西方国家内部反基督教、反宗教的信息也传入中国。这使中国青年了解到，西方许多学者认为一般宗教，特别是基督教是进步和科学的障碍。宗教在西方也像儒家学说在中国一样遭到抨击。例如1921年，一些留法的学会青年会员给巴黎大学的教授写了一封信，询问有关宗教和现代化以及中国是否需要宗教的问题。巴黎大学的中国史教授葛兰言、小说家巴巴塞和社会哲学及社会学教授都回信对此问题作了明确的答覆：否定。法国学者认为宗教对于原始人也许是需要，而对现代人已不再需要，科学已使宗教名誉扫地②。

1920年，罗素到中国讲学，跑遍了大半个中国，赢得大批追随者。罗素在讲学中强调，现代社会不需要宗教，宗教只能怂恿人们争吵，维持现状，阻碍个性发展以及用感情代替客观依据。

严复也翻译了许多西方批评宗教的书。如宓吉著的《在华传教士》，该书猛烈抨击了传教士在中国的所作所为。

同时，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界和中国发生的众多事件如

第一次世界大战,巴黎和会、五四运动……以及工读互助团在中国各处试验均告失败等等,使中国青年面对纷至沓来的西方思潮开始思索,各种学说都在青年的思索中退下神圣的光圈。中国青年开始醒悟,中国反对封建主义,但也不能照搬西方模式。西方文化并非完美无缺,它也有糟粕。于是,对基督教持否定态度的青年不断增加。1919年至1922年的报纸上,专门抨击基督教的文章不断出现,并渐趋频繁。如1919年圣诞节前夜《广州时报》出版了《耶稣专号》,1920年上海的《民华周报》也出版了《耶稣专号》。两《耶稣专号》的内容都是指责基督教为过时的迷信、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和中华民族的敌人。1920年至1921年,少年中国学会连续出版了3期宗教问题专刊,发表了罗素关于宗教的演说辞及少年中国学会关于宗教的一些调查。其他杂志,尤其是《新青年》杂志也非常关心宗教问题的讨论。1920年初,陈独秀与沈定一就宗教问题在报刊上进行辩论。陈独秀在《新青年》第七卷第三期发表了《基督教与中国人》的文章。该文章批评了基督教会、教义和传教士的活动,但文中又提出耶稣的学说及人格很有吸引力。他认为,也许西方列强强大的原因之一是耶稣的伦理学说。对此观点,沈定一在《星期评论》第36期上发表文章《对于“基督教与中国人”的怀疑》予以批驳。沈定一认为,新中国不需要任何宗教,当然更不需要一个外国宗教。反对基督教的情绪在中国知识青年身上越来越高涨。五四运动更如兴奋剂,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特别是凡尔赛和约不仅置中国的合理要求不顾,反而允许将德国强占的山东租借地转让给日本,更使中国青年大为震惊,使中国青年看到这次世界大战的实质是帝国主义之间的利益争夺战,巴黎和会的实质是帝国主义之间重新瓜分世界的分赃

会。美国总统威尔逊大唱的和乎十四条只不过是会在和会上多获利而打出的骗人的幌子，美国一直来在中国披着的伪善的面纱也在这次和会中被揭掉。中国青年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帝爱国运动。然而有些教会学校却禁止学生参加爱国游行，这更加剧了青年反基督教的情绪。中国知识青年开始系统地提出20年代流行于西方的许多反基督教观点，用科学的名义谴责基督教，这进一步使中国青年反基督教情绪高涨。在这一触即发的时候，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主席穆德作了一个不明智的决策。他认为“中国是他与反基督教运动斗争的重要地点”，打算于1922年4月在北平清华大学举行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的第十一次大会，以此来平息中国青年的反基督教情绪，结果适得其反，这次大会成了点燃非基督教运动的导火线。

穆德于1921年安排中国基督教青年会的顾子仁到欧洲、美洲各国阐述在北平开会的理由。指出“中国现在是处在十字路口，一个纯粹唯物的路线，是一条最没有阻力的路线，今后十年内中国发展的方向将获得如此巨大的推动力，任何人想影响它向前的冲击，将是困难的。一个占有世界可居住的面积1/5的国家，朝着一个纯粹的民族主义发展，给世界带来的后果，将是严重可怕的……在我们学生当中相信唯物主义的占多数。1920年，英美著名教育家（指罗素和杜威）在中国游行、演讲，有的是公开攻击基督教，其他较好的是避而不谈宗教。他们给学生在思想上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影响……把这次国际性会议放在中国举行，我们将在全国人民的思想上产生一个深刻印象……这对未来的无数岁月中将给天国带来果实。”^③

同时，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决定用其机关刊物《学生世界》一月份刊专门发表关于中国教会、中国现代教育、中国

基督教教育、中国学生的观点等方面的文章。文章虽是中国基督教徒写的，里面却有不少批评中国教会和教会教育的文章。例如，郑庆一抱怨中国基督教会是外国人控制的外国机构，呼吁教会要在组织上和人事上中国现代化等等。

中国基督教青年会也于1922年2月用其刊物《青年进步》出版特刊。内容是有关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的文章及其在中国活动的文章，也有关于中国基督教青年会和其他教会组织在中国学生中活动的文章。出这期特刊的目的，是为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在北平开会作些舆论准备。

以上这些行动犹如火星掉在煤油上，燃起了中国青年的熊熊怒火，促使他们发动了一场席卷全国、长达五年的、声势浩大的反基督教运动。

首先是清华大学的学生在校方支持下，出版了《铲除基督教专刊》。1922年3月，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在上海领导一些爱国学生成立了非基督教同盟，并于3月9日发表了宣言。宣言内容如下：

我们反对“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我们为拥护人们幸福而反对“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我们现在把我们的真态度宣布给人们看。

我们知道：基督教及基督教会在历史上曾经制造了许多罪恶。这且不要管彼，但是彼现在正在那儿制造或将制造罪恶，凡我有血性、有良心、不甘堕落的人，决不能容忍彼，宽恕彼。

我们知道：现在的社会组织是资本主义的社会组织。这资本主义的社会组织，一方面有不劳而食的有产阶级，他方面有劳而不得食的无产阶级。换句话说，就是：一方面有掠夺阶级、压迫阶级，他方面有被掠夺阶

级、被压迫阶级。而现代的基督教及基督教会，就是“帮助前者掠夺后者，扶持前者压迫后者”的恶魔。

我们认定：这种残酷的、压迫的、悲惨的资本主义社会是不合理的、非人道的，非另图建造不可。所以，我们认定这个“助桀为虐”的恶魔——现代的基督教及基督教会，是我们的仇敌，非与彼决一死战不可。

世界的资本主义，已由发生、成熟而将崩坏了。各国资本家——不论是英、是美、是日、是法——因而大起恐慌，用尽手段，冀残延喘于万一。于是，就先后涌入中国，实行经济的侵略主义了。而现代的基督教及基督教会，就是这经济侵略的先鋒队。

各国资本家在中国设立教会，无非要诱惑中国人民欢迎资本主义；在中国设立基督教青年会，无非要养成资本家的善良走狗。简单一句话，目的即在于吮吸中国人民底膏血。因此，我们反对资本主义，同时必须反对这袒护资本主义欺騙一般平民的现代基督教及基督教会。

“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为现代基督教及基督教会的产物。他们预备于本年四月四日，集合全世界基督徒，在北京清华学校开会。所讨论者，无非是怎样维持世界资本主义及怎样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把戏。我们认彼为污辱我国青年，欺騙我国人民，掠夺我国经济的强盗会议，故愤然组织这个同盟，决然与彼宣战。

学生诸君！青年诸君！劳动者诸君！我们谁不知道资本主义底罪恶？我们谁不知道资本家残酷无情？现在眼见这些资本家走狗在那里开会讨论支配我们，我们怎能不起而反对！起！起！起！！！大家一同起！！

此外，非基督教学生同盟还制定了章程，成立了一个由一名书记，四名干事组成的五人组织执行委员会，主持一切事务。3月，非基督教学生同盟向全国各地发出通电。全文如下：

“北京清华学校学生诸君暨全国各学校学生诸君公鉴：

自文艺复兴以来，人智日开，宗教日促，是以政教分离及教育与宗教分离之说，日渐弥漫于欧洲。彼昏不悟，乃欲移其余孽于域外，以延长其寄生生活；政府巨商，以利其为殖民之先导，于是四福音书遂挟金铁之威，以临东土。金铁奴我以物质，福音奴我以精神。东南文盛之区，悉变而为耶教化，资本化，无复清宇之气；岂不可悲！华府会议，辱我至矣！上帝慈悲，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无端集合于我弱国之首都。吾爱国青年之血泪未干，焉能强颜以颂上帝。且北京不乏耶稣会场，清华为我国校，非教会所立，又焉能供一教之用。此而不拒，中国无人矣！伏乞诸君发为僇论，共斥横逆，以期永洁我青年教育界。非基督教学生同盟叩灰。”

通电呼吁全国青年起来支持非基督教运动，反对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的会议。

3月15日，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机关刊物《先驱》又出专号“非基督教学生同盟号”。专号全文照登“非基督教学生同盟的宣言”、“章程”、“通电”，还发表了陈独秀等人的文章，揭露基督教会是帝国主义政府殖民政策的“导引”。

上海学生的行动马上得到全国青年的支持。各地纷纷成立非基督教学生同盟。首先起来响应的是北京学者，他们将运动内容扩大到反对一切宗教，成立了非宗教大同盟。3月

16日，北京《晨报》登载了非宗教大同盟的宣言、覆电。他们在宣言里谴责了宗教教导人们服从，认为这是奴隶道德；谴责宗教宣传迷信，认为这违背了科学、束缚了思想、阻碍了对真理的探求。3月21日，他们向全国学生组织发出通电，抗议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在清华学校举行会议。覆电有无政府主义者、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员李石曾、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朱执信、吴稚晖、汪精卫、萧子昇和戴季陶等79人签名。

北京非宗教大同盟的呼吁得到了全国各地的响应，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支持、拥护。不仅共产党、教界、国民党、工会及劳工组织等部门给予支持，就连改良派梁启超也热心地投入了这场运动。他认为这次运动标志着中华民族的觉醒，批评了基督教的排他性及利用教育为宗教服务的做法。

4月4日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大会开幕。清华学校就收到了北京非基督教同盟的一封信，抗议他们用国立大学的设备为宗教服务。信中说：中国政府允许一批基督教徒学生安顿在首都，真太令人羞耻，认为这是违背政教分离的原则。信中还引用上海非基督教学生同盟宣言中的论点宣称：“基督教在西方已经如此没落，以致传教士只能试图通过把迷信的余毒移植国外以延长其寄生虫生活。金钱与枪炮奴役我们的肉体，基督教的福音奴役我们的灵魂”。

会议期间，全国各界人士纷纷发出通电、通函谴责基督教，致使教会人士惶然惊呼：“知识阶级……群起而反对，宣言与通电似雪片纷飞。”^④

4月9日，会议闭幕这天，北京非宗教大同盟在北京大学召开了反宗教群众大会。1000多名学生来听蔡元培等人的

演说。萧子昇、李石曾以科学名义谴责宗教；蔡元培批评一切宗教都是堕落的，强调了教育与宗教要分离，学校应保证无神论者有反对宗教的自由。

外界反对呼声如雷，会内也起风波。参加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会议的中国基督徒学生向会议各代表提交了一份备忘录。他们在备忘录里指出基督教的理想与基督教国家的行动之间的差距，批评了中国教会学校脱离中国人的生活，无视教育部的意见，使学生跟不上形势的发展，揭露了传教士治校专横，强迫所有学生都要参加宗教仪式。教会是由专断的西方人统治的外国机构。他们认为中国青年对教会和传教士的攻击是完全合情合理的。他们觉得许多传教士缺乏教育，思想落后于科学成就，无法处理科学与宗教的关系。他们要求教会应当更加注意社会服务工作及其他能使中国强大起来的的活动，要求基督教与教会教育应该中国化。

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的大会可谓是在满城风雨且内外交困的情况下召开的。

1922年基督教差会出版了一部关于在华基督教发展情况调查的书《中华归主》，书名和内容的用词都很猖獗，如“中国本土约有3/4已被基督教势力所控制，七个省份被渗透了基督教势力……五万人口以上的城市，除了18个以外都被基督教占领。”使反基督教的中国青年无法忍受。北京非基督教同盟就将《中华归主》书中一幅表明基督教差会在中国各地的据点与工作扩展情况的地图加上标题“宗教毒素的蔓延”加以翻印发行。非基督教同盟还将许多反基督教的文章收集起来汇编成册并出版发行，以进一步扩大影响。运动在全国各地持续着。北京、上海、广东、浙江、江苏、湖南等地的非基督教同盟经常进行反对基督教的宣传和鼓动。

二、目标消失，非基督教运动低落

反基督教和反宗教运动得到大、中学校师生的支持，得到各学术团体的学者及各党派人士的支持。当时几乎没有什么中国人对非基督教运动提出异议。然而，运动很快低落了，究其原因：一，是因为全国没有形成一个永久性的中心组织，也没有一个有影响的刊物专门对非基督教运动进行指导和联络。二，是宣传、鼓动只限于口号式的抨击，更缺乏对教会及其所办的事业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所以不能切中要害，从理论高度去批驳它。三，非基督教学生同盟是反对“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在北京清华学校召开大会而组织的，故会议结束，其直接目标也就消失了。目标失去，运动中的成员就感到不知所措。四，就组织本身而言，非基督教学生同盟不是一个健全的组织。控制论、系统论表明，一个健全的组织，至少要有三个子系统，即特定的目标——组织的灵魂，固定的成员——组织的实体、存在的基础，权力的中心（权力和地位的分层体系）——组织的核心。而当时全国各地的非基督教同盟有许多组织都非常松散，成员不固定，也没权力中心，横向联系不紧，缺乏权力分层体系，并且当时中国青年学生还缺乏长久维持运动和不断扩大政治影响的经验，所以，到暑假一放假，学生回家后，多数组织就停止了活动，有的就此消失，以后一直没有恢复活动。反基督教、反宗教运动鉴于以上四方面的原因，其第一个高潮在1920年下半年开始渐渐低落。

三、波峰再起，收回教育权运动

20年代初，中国知识青年提出“教育救国”的口号。他们认为义务教育是西方国家强盛的主要原因，而中国的贫穷和被奴役是愚昧无知导致。一个国家如不能为自己的国民提供教育，就不可能使政治进步、工业发达、道德高尚。^⑤他们对外国人控制教会学校很不满，要求确保教会学校为国家的目的服务，即他们已充分认识到教育的功能。而基督教会却在非基督教运动中出版了一本名为《基督教教育在中国》的书。书中提出教会学校要独立、自主，要把教会学校办成不同于中国学校的、在宗教气氛中进行教育的学校，在中国建立牢固的立足之地。这犹如火上加油，激怒了中国青年，将低落下去的非基督教运动又推向高潮。

首先“发难”的是少年中国学会。1923年10月，他们开会通过了一项方案，其中包括实行民族主义教育与反对宗教团体，并在这月还印发了一本小册子《民族主义教育》。学会领导人之一余家菊在《中华教育界》杂志上发表了《教会教育问题》的文章。两篇文章都指出基督教教育威胁着中华民族本身的存在，并用了《基督教教育在中国》这本书中的话作证据进行论述。如该书第15页上写的“现在是加强在华教会学校的机会，以使将来毕业于教会学校的男男女女，会把中国建成一个基督教国家”。第161页上的“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基督教教育将成为决定性的力量，还是相对来说它是无足轻重的正在消亡的因素，这个问题尚未解决。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将决定中国在未来的世纪里是否变成一个基督教国家，或者说变成基督教的大本营”等等。即以其之矛

攻其之盾，很有力，余家菊还在文章中抗议说：中国不是“一个野蛮的国家”，也不是“一个没有读书人的国家”，“而需要外国人来宣传宗教，发展教育……宁要没有基督教的中国，而不要没有中国的基督教。”

1924年8月，上海一些青年又重建“非基督教大同盟”。非基督教大同盟吸取了1922年运动没有永久机关和刊物而不能持久的教训，成立了一个由张秋人、唐公宪、柯柏年等五人组成的委员会。上海非基督教大同盟宣布其宗旨是：“秉爱国之热情，具科学的精神，从积极的手段，反对基督教及其所办的一切事业”，并借用《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出版了《非基督教特刊》来指导和联络各地的运动。同时，向全国发表宣言说：

我们所以要反对基督教，在一般意义上，也和反对其他宗教一样。他们都号召一个虚伪的和平观念，他们所希望的幸福，都在未来世界：天宫、西方、天国等。现世界一切生灭荣枯，都由神为天定，无关人力之长短；以此暴君不必与抗，富豪不必与争，率全世界劳苦平民，信神安命，但知心慕天国，不防身陷水火。这是何等世界，这是何等罪恶！各种宗教都有同样的罪恶，而基督教组织特强大，其危害也特深广，所以，应该特别反对基督教。在特殊意义上，封建时代基督教列在特权阶级。资产阶级扑灭当时的特权阶级，本系攻击基督教，乃因自身已成特权阶级，遂转而保留利用它。第一，用它麻醉本国工人阶级，使其信社会之贫富出于神意，不应以阶级之争，破坏现社会制度；第二，用它麻醉被征服的殖民地、半殖民地民众，使其信他们的兵舰、军队是为了赠送上帝的福音，赠送教育及一切文化而来，不

为抢劫金钱而来，使对他们永远感恩戴德，不思反抗。第三个作用，正是我们中国人不得不反对基督教之最大理由。神父、牧师头里走，军舰、兵队后面跟，圣经每页上都写着，‘送枪炮来，送银子去’，八十年来这种传教，通商的现象，我们怎能够忘记！近年来他们布教方法日臻巧妙，由教会而学校，而医院，而青年会，而社会服务团，而童子军，而贫民教育，日益遮掩其传教面目，深入社会，迷惑无数青年，只看见他们拿些学校医院的经费，而不看见他们拿去比这些数十、百倍的投资的利益。此外更危险的是：一般神父、牧师，他们回到外国，形容尽致的演讲中国人之愚蠢、野蛮、好骗取捐款，因此益增外人轻鄙华人的观念。他们来到中国，无论是布教与教育，有意的或无意的，都宣传其国际资本主义的国际观念，以破坏中国的民族觉悟与爱国心，所以我们应该于一切宗教中殊别反对基督教”。

宣言阐述了反对基督教的理论依据，号召全国的青年人起来反对基督教。不久，湖南、湖北、四川、河南、山东、浙江、江西、山西、广东、直隶等省都先后成立了同样的组织，甚至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也组织了非基督教组织。它们相互呼应，掀起了一个更大的浪潮。

1923年11月，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学生运动决议案”第五条中规定：中国学生运动之反对帝国主义运动，此时只限于日本。本团在此一年中须努力将此运动普及于反对英、美帝国主义。反对英美之武力干涉、财政共管、铁路共管等论调尤其应当利用。关于英美的外交问题——如片马、威海卫等问题做激烈的反对宣传。而对于基督教之教会学校，青年会在中国学生间的亡国教育之势力，

应特别注意攻击：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也指出：各地教育因经费支绌，进行停顿，英美帝国主义利用良机，在各地建立教会学校，星罗棋布，教育一班个人主义的、麻木不仁的、机械式的学生，养成一般柔顺服从、歌颂洋大人恩德的国民。要求退还赔款以兴学，造就依赖外国以拯救中国的人才。多数的中国青年一面是受本国官僚式的教育，一面是受教会洋奴化的教育，活泼有为的青年精神，屈服于此双轮推动之下，磨灭渐尽。

上海非基督教大同盟通过《非基督教特刊》、中国共产党的机关刊物《向导》、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机关刊物《中国青年》不断报道各地非基督教运动的情况，刊登大量文章，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方面来揭露基督教在华势力，号召学生起来斗争。1924年12月，他们又和《中国青年》编辑部合编了一本《反对基督教运动》的小册子，内收五篇论文：杨贤江的《反对基督教运动》、李春藩的《传教与帝国主义》、梅电龙的《基督教与中国》、蔡和森的《近代的基督教》和朱执信遗作《耶稣是什么东西》。《中国青年》杂志编辑部专门在《中国青年》第56期上发表文章，对它作了宣传和推荐，使该书发行数高达4万册，在青年学生中引起巨大的反响。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决定将12月24日至26日规定为全国一致举行反基督教运动的日子，号召青年：“我们应当丝毫不客气的反对基督教，我们应当在各种地方，借各种机会，公开的宣传而且努力扩大反对基督教的运动；我们应当到教会、青年会、教会学校的聚会中间，散布反对基督教的传单，我们应当到基督教势力范围中间，把

基督教一切的罪恶都宣布出来”。上海非基督教大同盟立即响应，12月16日在《非基督教特刊》上发表社评，建议12月22日至27日圣诞节前后一周为“非基督教周”。号召各地青年在此周发动大规模的反教活动，而且还发出通电，叫各地同时举行广大的活动。为了加强对这次运动的领导，恽代英又在《中国青年》杂志上发表了《打倒教会教育》的文章，指出“有一百万的民众，二十余万的青年，正在帝国主义所派来的牧师、神父、教会教育家手中，受他们的蛊惑动制。我们天天怕色彩，怕党派；然而帝国主义者已经籍教堂、学校、青年会的帮助，在中国造成这样一个伟大的党派了。我们愿意永远这样一盘散沙地屈服于他们这种党派行动之下么？还是我们应当为反对他们而组织起来？”恽代英还在文章中大力号召青年们立即组织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随着国民革命运动高潮的到来，群众性的反基督教怒潮更汹涌起来。

“非基督教周”活动在全国各地掀起。据当时各报所载，广州、长沙、武汉、济南、九江、上海、苏州、徐州、杭州、绍兴、宁波等地都先后成立了非基督教同盟，散发《非基督教特刊》，团结广大青年和各阶层人民，进行反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斗争，掀起极大的群众运动。例如，苏州非基督教同盟用浅显、通俗的文字将基督教的罪恶及其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先锋队的实质编成“滩簧”曲子向群众演唱，给听众留下了极深刻的影响。又如宁波于圣诞节这天在明伦堂举行了反基督教的演讲会。全国非基督教同盟负责人恽代英在会上作了报告，并当场成立了“非基督教同盟”宁波分会，在报上发表了非基督教同盟宣言。会议结束，在张秋人的领导下，以四明中学，崇德女校、甬江女中等校学

生为主的约5000人又举行示威游行，沿路高喊“反对奴化教育”、“收回教育权”等口号，到英国领事馆门前，张秋人还带头用英语高呼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沿途还散发了5000多张传单，有些学生还将传单投到教堂里。同时宁波学生联合会在报上还发表了“非基督教同盟宣言”，揭露了基督教侵入中国的情况，震动了宁波社会。接着杭州、绍兴也先后成立了“非基督教同盟”支部，开展了大规模的“非基督教宣传活动。”

国民革命运动的中心广州，青年学生除了成立“反基督教同盟”以外，还组织了收回教育权委员会，发表宣言，开展反帝国主义文化侵略、反对奴化教育和要求收回教育权运动。29日上海《泰晤士报》载广州通讯：此间国民党青年俱乐部进行非基督教运动，他们决心向省长和教育厅请愿：强迫教会学校注册，禁止在校内读圣经和举行一切基督教仪式，收回外国人管理学校权，以制止帝国主义之宣传和文化侵略。广州反教活动得到革命政府的支持。12月25日广州学生在广东大学（现中山大学）集会。廖仲恺到会发表演说，谴责了宗教，尤其是基督教。非基督教同盟的成员走访了一切教会机构，散发传单、发表演说。29日非基督教同盟又请周恩来同志演讲《基督教与帝国主义》。他的演讲辞表俱佳，听众非常踊跃^⑥。

运动也得到教会学校广大学生的支持。教会学校的管理脱离中国社会，与中国文化隔绝、极不科学。正如恽代英在“我们为什么要反对基督教”中说的“……但是基督教的教育事业，社会事业，主要是在骗人做他们的教徒。他们的学校是全不管学生心理的教育方法。他们只知迎合社会上卑劣心理，读一点四书，做几篇古文，严厉禁止学生请假出外，不

许女学生轻易见男子的面……他们的事业第一是引学生礼拜祷告，他们承认其余都是无关紧要的事。”

教会学校学生的思想、日常生活都受到严格控制，有些教会学校的校长自视高人一等，对学生态度蛮横。如圣三一学校的学生梁福文、刘天真、邓汉钟等人于1924年4月初，串连了一批对教会奴化教育制度不满的学生在课堂讨论组织学生会之事，该校校长（英国人）闻讯赶来训斥学生说：“英国人所办的学校，有英领事在广州，断不能徇你们的情，任从你们中国人自由。”^⑦

圣心学校的学生为了召开集会纪念“五七”国耻日，要求校长放半天假，竟遭校长（法国人）拒绝。校长还厉声呵斥学生说：“中国的命运早已在华会（华盛顿会议）中决定了！无庸你们去救，你们也是救不来的。”学生受此大辱，无比愤怒，全体学生立即停课举行集会。该校教员张元恺登台演讲，揭发华会上帝国主义者的阴谋，会后学生组织学生会，进一步开展和帝国主义者的斗争。九日，校长下令：“凡赞成学生会者，一律驱逐出校，不许逗留。”并且以手枪威胁学生，禁止学生返校^⑧。岭南大学美国人对学生说：“此是教会学校，只可宣传宗教，不许谈论国事。”广西梧州“津道”学校美国人对学生说：“我系不爱中国，所以不许你们同中国学生往来，共同救国。我要你们服从我，同我一样的来爱我们的美国！”上海三育大学的美国人也对学生说：“已入教会学校读书，应该断一切国家的观念：爱国二字断无存在之余地！”^⑨帝国主义者简直将中国视为它的属地，肆无忌惮地压迫教会学校的学生，正如圣心学校学生在二次宣言中所说的：“同人等入校以来，一切天赋自由被其剥夺殆尽；举凡杂志周刊，以及新思潮之书

籍，禁不许读，而新约旧约，所谓圣经书，则强迫背诵，尽量灌输。更复广送教书，媵赠神尽，威迫利诱，禁拒怀疑辩论，抗言立即斥逐；此思想言论自由被其剥夺也！学生来往书信，必须拆阅，稍涉嫌疑，即遭没收，甚至亲老病危之电，亦收后不发……又复广设苛例，事事罚鍰，无操帽者罚金二角，不满意者罚款一元。”教会学校当局压制学生的种种行为，尤其是压制学生爱国运动的行径激怒了学生，他们高呼：“吾国不亡于武力，不亡于经济，而先亡于教育矣”^⑩。各地教会学校的学生都纷纷投入这场运动，如徐州培心、南京明德、福州协和等教会学校相继发生反教会奴化教育的风潮。8月，上海学生“为集中反基督之势力及指导此种运动使之强健而一致起见，乃重新恢复1922年的“非基督教大同盟”，发行反基督教周刊和小册子，号召各地青年起而作同样的组织和运动。”^⑪不久，各地均恢复或成立反基督教的组织。他们的行动得到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支持。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机关刊物《响导周报》、《前锋》、《中国青年》等杂志先后发表了《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之各种方式》、《投降条件下之中国教育权》、《广州圣三一学生的民族革命》、《中国教育权》等文章，揭露了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和教会学校进行文化侵略的罪行，赞扬了圣三一学生的反帝爱国斗争精神，号召各地迅速展开反基督教和收回教育权运动。广州社会主义青年团也通过新学生社的公开刊物《新学生》发表《援助圣三一同学告国人书》等文章，在精神上鼓励了教会学校的学生。广州政府也大力支持圣三一学生的爱国行动。学生罢课时廖仲恺召集全体罢课学生，表示坚决支持教会学校学生的爱国行动，并鼓励学生说：“我们想得到自由，就要把象绳索的不

平等条约废除，尤其是要把帝国主义强盗们打倒，打倒帝国主义，然后祸根得除”。孙中山对罢课学生也表示了同情和支持。他认为罢课学生“有些觉悟，亦属可嘉”。圣三一学生退学后，广东省青年部又函请广东大学设法收容，并予优待，使退学学生得到妥善安置。12月23日，新学生社、广州学联联络发起成立“广东反基督教大同盟”，出版《反基督教特号》发表抨击基督教和教会学校教育的文章，印发敬告基督徒、敬告同胞等传单、标语12万份。24日至26日，他们组织了六个演讲队，以新学生社社员、黄埔军校学生、农讲所学生和沙面青年工人为骨干，分赴培正、培道、圣心等教会学校及东山、长堤基督教青年会去演讲，散发传单、张贴标语。25日、26日晚上，国共二党的要人廖仲恺、周恩来也亲临广东大礼堂发表演说，抨击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对中国进行文化侵略的罪行，支持青年学生的正义行动。青年学生的爱国行动也得到广大市民和舆论界的支持。《广州民国日报》曾就此事著有专论和时评等。72行商报中的《学声旬刊》也发表了数篇反基督教的文章^④。

广州教会学校学生的爱国行动很快在全国引起反响。为抗议教会学校当局干涉学生参加爱国活动及殴辱学生等，全国各地的教会学校频繁地发生罢课、退学事件，尤其是五卅运动以后更趋频繁。

四、催化剂，五卅运动

1925年2月至5月，上海、青岛的日本纱厂先后发生工人罢工斗争，遭到了日本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镇压。5月15日上海内外棉纱第七厂日籍职员枪杀了工人顾正红（共产

党员)、打伤工人10余名,激起了上海工人、学生、市民的愤怒。5月28日,中共中央决定进一步动员群众开展反对帝国主义的政治运动。5月30日上海学生2000余人到租界内演讲,声援工人斗争,号召收回租界,散发“打倒帝国主义”传单。近百名学生被英警逮捕,拘入南京路老闸捕房。当日下午,上海各界群众近万人集中在巡捕房门前,要求释放被捕学生。英警开枪打死10余人,伤多人,捕去53人,造成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五卅惨案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情绪。北京、南京、天津、汉口、广州、重庆等近五百城镇的人民纷纷举行游行示威、罢工、罢课、罢市及通电、捐款等表示坚决支持。他们要求取消治外法权、取消外国人的一切特权及全部条约的呼声响震中华大地。各地学生也纷纷组织示威游行、罢课,抵制日货、英货。他们的活动赢得全国各界人士的支持。教会学校学生的退学风潮也达到了顶峰。

教会学校的学生要求外籍教师旗帜鲜明地对五卅运动表明态度,大部分传教士或是借口不干涉政治,或是借口要等待公正的调查拒绝评论这一事件,至多就死难者对中国表示同情。有的传教士甚至认为5月30号是学生故意违反公共租界不得游行的法律,当事态失控,动用武力向手无寸铁的学生开枪是不可避免的。当然,也有少数传教士,如燕京的教师在进行公正调查的同时,抗议外国军队准备诉诸武力。此外,他们公开谴责英国官员的行为,并致书美国国务院,力促在平等的基础上重新谈判条约。他们不愿再接受美国炮舰、治外法权或其它特权的保护^⑧。

教会学校的学生向学校当局要求参加示威游行,却遭到有些学校当局的反对。对于学校当局压制学生爱国运动的行为,学生就以罢课、退学来抗议,如上海圣约翰大学的学生

在五卅惨案发生后与全市群众一起，积极参加“三罢”斗争。该校校长美国人卜舫济对学生参加爱国运动横加干涉。

6月3日，卜舫济竟强行撕毁学生们悬挂的中国国旗，并诽谤学生是“本校误养的一股强盗”，宣布关闭学校，命令学生立刻离校。如此蛮横的行为激怒了该校中国师生。学生当即就发表宣言指责校长卜舫济侮辱国旗，并决定一致退学，发誓再不回圣约翰，全体中国教师也同时辞职。这使圣约翰停办了二年。离校师生联合创办了一所新的大学——光华大学。他们的行动受到全国各地学生和教育团体的赞扬。

1925年退学风潮遍及全国各地。因学生踊跃响应爱国者的号召，走出校门参加游行示威，和学校当局冲突而罢课、退学的教会学校，全国约有50多所。如宁波的斐迪中学于1925年6月8日全体学生共163名都发誓离校，并在报上发表了宣言。6月16日又第二次发宣言，向全社会各界人士宣告，离校是迫于强暴压力，激于难遇之愤懑，致力从事爱国运动。学生离校后，借宁波棋杆夹弄傅家为临时办事处，继续从事爱国运动，他们多次组织化装演讲团，演出爱国新剧。端午节晚上，在傅家开演“沪滨血潮”等剧时，有一观众激动的当场摘下金戒子抵二角一张的门票^④。

此外，岭南大学、宁波崇德女校、圣模女校、华美医院护士学校等学生也相继离校。不仅沿海城市的学校如此，边塞城市及内地城镇的教会学校也一样。如成都华西大学的学生为声援万县惨案散发传单，受到学校当局的干涉，愤而全体退学。

退学学生还不断地用事实揭露教会学校的奴化教育。如甬江离校学生在《时事公报》上刊登《宣言》说：学生没有言论、信仰、结社、集会等自由，甚至连通讯自由也被剥夺。

如一学生在开学前一日，因访友至晚上九时才回校，即受到教员厉声指责。她把此事函告友人，不料被校方发现，罚她当众向教员道歉，并强迫她表态，劝告其他学生，不学她“泄露学校内情”的做法。更荒唐的是，校方处理失窃案件，竟用投票选举的办法，结果使一人“当选”受不白之冤。当该生喊冤时，圣经教员却说：“你要忍耐，祈祷上帝，假使你吃亏的，那么上帝会替你伸冤”。学生的行动得到了开明绅士的支持。当时《时事公报》连续报道他们的消息及声援的文章。

退学风潮使教会学校门庭冷落，并且许多学校因此而停办。据统计，基督教会中学从1915年到1932年的发展情况如下表所示。

年度	1915	1919	1924	1927	1928	1932
学校数	116	165	339	100	172	19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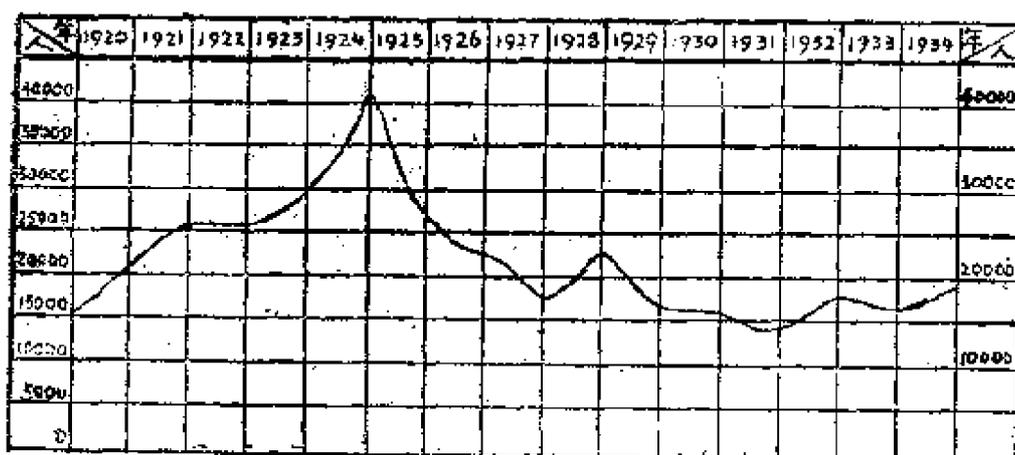
基督教青年会在非基运动、收回教育权运动中也与教会学校一样，受到冲击，一蹶不振。如1926年12月出版的《湖北学生》发表的《基督教青年会的真面目》一文指出：全国省市青年会44处、学校青年会212处，会员总数约7万余人，此外，尚有儿童会员6千余人及与青年会发生关系的儿童2万余人。文章说，那时基督教青年会是“代表英美帝国主义的势力，麻醉一般青年的东西”、“暗中附和‘反赤’，勾结统治阶级，维护旧礼教，堵塞革命思想流传”^⑤。又如雅礼学生罢课向校方提出的要求之一，就是要求关闭学校青年会。许多学校青年会随着学校的关闭而关闭。1922年4月至1927

年，青年会在非基督教运动和收回教育权运动的冲击下，人员急剧下降。据统计青年会会员人数降到只及1920年的60%，许多学校青年会不得不停止活动。如果以1920年为100%，那么，1927年参加青年会宗教活动的人数只有30%，参加青年会演讲会的人数只有42%，参加青年会日校读书的学生数只有46%，参加青年会体育班的人数只有20%。

1922年以后，女青年会的活动也同样因受此冲击而减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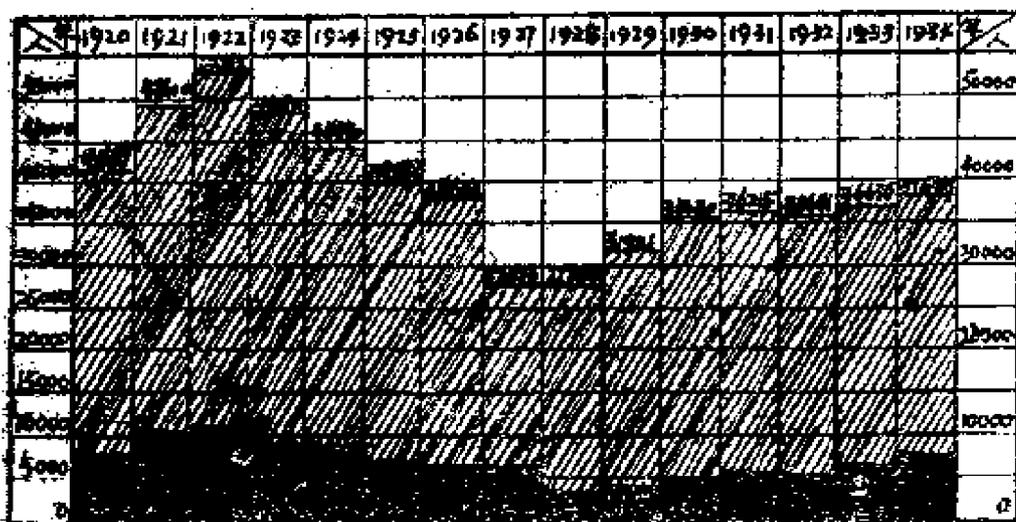
1920年至1934年城市青年会人员及学生数见下二表。

最近15年市会学生人数之比较



包括日、夜校及义务学校

最近15年市会会员人数之比较



横线指会员总数

黑色指少年会员

五、实行统战，运动向纵深发展

非基督教运动的持续，使“基督教”三字成了帝国主义对华侵略的代称，在当时青年的心目中成了贬义词。一提到基督教，当时青年对基督教深恶痛绝的感情就油然而生。这过度的反感使非基督教运动的领导者反省，看到了这场运动在初期很大程度上受青年情绪的左右，犯有左倾幼稚病。如当时提出的运动目标是一切宗教事业及其成员。有些地方的学联拒绝教会学校的学生加入，有些非基督教同盟任意鼓动教会学校学生退学，没有区分一般基督徒和少数混在教徒中的甘心做帝国主义走狗的下流知识众子和流氓地痞。如湖南

等地有些学生对教会学校的学生抱仇视态度，致使教会学校的学生因对其仇恨而不参加群众运动，这实际上削弱了自己的力量，给非基运动带来损失。有些地方的非基督教同盟不区分正常的宗教活动和帝国主义分子而在这运动中取一锅端的态度，全盘否定基督教活动和基督徒。

这种左倾幼稚病：整个的反对基督教，在表面上看来，好象是个彻底的办法，其实是很错误的。事实上，在中国的基督教中，除却一般无赖的游民和下流的知识分子，他们因为要想和洋大人接触，做了“上帝的儿女”，于是，事事仰承帝国主义的鼻息，一切言论行动，无不唯帝国主义命令是从，甘心做个忠于帝国主义的走狗的无耻基督徒外，还有一大部分中等社会的子弟，为了依附帝国主义的机关过日子，和一般贫苦工人为了得到一点慈爱的施与，而加入基督教的教徒。我们所反对的、所攻击的应该是前一种甘为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的无耻教徒，至于后两种是因为生活压迫而暂时托足于基督教的教徒，他们所受外国人的直接压迫更甚于一般人，他们正辗转挣扎于帝国主义的权威之下，而苦于不得其解除痛苦的方策，他们不是敌人，而是和大家同病相怜的。为了伸张革命势力，必须联合后两种人。正如恽代英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一文中说的：“我们反对文化侵略，是反对帝国主义软化驯服中国民众的阴谋，我们并不是说反对那些在帝国主义软化驯服手段之下的中国民众，如一般教徒、教会学生。”

1925年1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反基督教运动决议案”指出：“本团同志切不可因反对基督教而憎恶一般教民和教会学生，应该指出他们受传教士与牧师的压迫和欺骗。本团也不一定要引导已觉悟的教民

与教会学生脱离基督教的势力，应该引导他们在基督教势力下的群众中，努力作反基督教的运动。”

1926年1月国民党“二大”通过的《青年运动报告决议案》规定：“一切反基督教运动应站在反帝国主义的观点上与教会学校联合；不应站在反宗教的观点上与教会学校学生分离，在国民政府势力范围内尤应积极设法收回教育权”。

广州的非基督教大同盟于1926年改名为“反文化侵略大同盟”并明确指出：“过去的‘反基督教运动’只是站在非教的观点，笼统地反对一切教会学校和教会学生的做法是不妥当的。它还在“反基督教告全国同胞”文章中提出了求‘反帝’之同，存‘信仰’之异的指导思想”。

《中国学生》第四十期也登载了《“反基”运动的新策略》提出今后的策略为：促成基督教徒内部分子的分化。我们晓得中国的基督教徒，除却一部分甘为帝国主义忠狗的无耻教徒外，还有一大部分是为了生活压迫而暂时托居于基督教的教徒。他们一面祈祷上帝，一面是不忘祖国的，我们应该集中力量，促成他们内部的分化，使这大部分不忘祖国的教徒，站在国民革命的战线这一边来，然后集合他们的力量，向甘为帝国主义忠狗的基督徒进攻。

采取友谊的形式深入教会机关。现在一般青年，对于基督教徒，往往有任意的蔑视和鄙薄的情事，这种徒增恶感无补实际的态度是很错误的。我们今后应该用友谊的形式，深入教会机关，特别是教会学校，领导他们较左倾：不忘祖国的分子参加爱国运动。如去年的“五卅”、今年的万县惨案等，并努力本身利益的斗争。

各个青年团体都开始调整自己的政策，注意统一战线。并且正值此时北伐战争爆发，为非基督教运动扫除顽石，反

帝国主义文化侵略运动迅速向纵深发展。反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阵营不断壮大，教会学生和爱国教徒纷纷投入这一运动。如1926年10月初基督教青年会发起拒毒运动，公然说鸦片是帝国主义侵略的先锋，同时全国基督教协进会发表宣言，主张取消中国与列强所缔结的条约，根据平等的原则多少修改一点。著名的中国基督教领袖、青年会全国协会总干事余日章也发表谈话，赞成非基督教运动，并主张“修改不平等条约，立即废除一切传教特权。”武汉、长沙、上海、广州，杭州、桂林、兰州、南昌等地的基督教会都发表宣言，表示赞成以人民的武力收回一切权利，提出“教会要与帝国主义割断联系”、“教会自立”等口号。仅浙江温州市就有十几个教堂脱离了英国差会的控制。

1926年12月，武汉已成为革命政府的首都，政治环境较宽松，所以反文化侵略运动发展很快。湖北省汉口市的各级国民党部、各级学联，各工会以及青年团体于圣诞节之前着手筹备“反基”运动。反基督教大同盟在12月20日以前改组成立。从22日起，武汉有许多青年组成几支分队到各街道散发传单，有的还到教堂进行反对基督教的宣传。25日，武昌、汉口，汉阳都举行了反基督教群众大会，各处都有6000以上的人参加，会议结束均分队上街作大规模的演讲。这次运动一方面许多教会势力中的青年分裂出来，增加了反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力量；另一方面使教会内部，尤其是帝国主义者非常恐慌。汉口各教会学校都自动停止了学生祷告查经活动，各教堂耶稣诞日的庆祝仪式多停止举行。在圣诞节前，英国路透社一再发出“反基督教运动益见剧烈”和“教堂为群众所侵害”的消息以事中伤，但圣诞节一过却又发出，“耶稣诞日安然而过”的电报，表示帝国主义文化侵略

机关“脱险”的庆幸。

广东反文化侵略大同盟于11月初就开始筹备反文化周活动。北伐军后方各级政治部和反文化侵略同盟都发表反基督的宣传提纲，向各方面宣传。25日，广州各界在中山大学举行反文化侵略大会，到会者达四万余人。除各个社会团体、青年团体而外，教会学校的学生会参加的很多。大会除发宣言、通电而外，并向一般群众提出下列口号：（一）教会学生是反文化侵略的先锋队；（二）革命的基督教徒联合起来反抗侵略；（三）中国教会脱离外国教会的羁绊；（四）收回教育权；（五）废除传教条约；（六）打倒帝国主义及其工具。晚上，中山大学、宝华戏院、河南戏院等处举行游艺大会，除约请名流讲演而外，并杂以影戏、舞蹈及描写教会罪恶的戏剧、双簧等。广东这次反文化侵略运动特别普及，除广州市外，海丰、陆丰、中山、佛山、江门、惠州、汕头、潮安、梅县、石龙等县，皆有普遍盛大的群众运动。

江西教会势力很大，尤其是九江教会学校的势力占全埠教育之大半。当国民革命势力发展到江西，反基督教运动遂于北洋军阀长期高压之后，得到惊人的发展。南昌于25日举行反基督教大会，到会者达万余人；各工会、学生会、农会，国民党各级党部与六七军政治部均一致参加。九江于北伐军进驻之后，即有学联及其他青年团体发起组织反文化侵略大同盟。在圣诞节之前后由反文化侵略同盟领导当地青年举行反文化侵略周，连续作了七天的宣传。23日与24日，各青年团体分配会员在城厢内外张贴标语、传单及在教堂和教会学校附近进行流动演讲。25日在同文书院（教会学校）举行反文化侵略示威大会，到会者达万人。教会学校如同文书院、诺立书院、儒励书院等均一致参加。散会后，又由群众与

七军政治部商洽，请其转达省政府，实行明令取缔教会学校并开办专门容纳教会学校退学学生之学校。26、27日在市党部举行反基督教的辩论大会，到会者达3000多人。由反基督教的青年与基督教徒公开辩论反基督教的是非，结果经群众裁判。自然，最终是反对派获胜。在这期间各教堂、教会学校关于耶稣日的一切仪式与庆祝完全停止。

湖南反文化侵略运动自1924年雅礼大学退学风潮发生后，即不断进行活动使城市教会势力受到很大的打击。这次在圣诞节前，长沙、衡州等地的青年即开始大规模的行动。圣诞节那天，长沙市的运动系分三次举行。上午各个学校在校内一致举行反基督教的演讲，下午则公开演讲，有万余人参加。讲演者有李维汉、夏栖、周以柔、朱剑凡等十多人。最后表演新剧“帝国主义文化侵略政策”。各街市都贴满各种标语口号。主要口号有：“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先锋队的基督教”，“援助教会学生群众自由争斗”、“革新教会教育”、“政府从速颁布教会学生群众自由争斗”、“政府从速颁布教会学校立案条例”等。

上海当时虽然处于孙传芳军事行动的高压下，但是，圣诞节前后几天的反基督教工作，仍在多数青年的努力下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圣诞节前三天，闸北南市各通衢街道都贴满了彩色标语和传单。各报纸满载各团体反对基督教的宣言和通电，空气顿现紧张。25日各教堂，教会学校包探、巡捕、警察密布，如临大敌。但是还有许多青年冒险到教堂中去散发传单。结果，许多学生被教堂雇的流氓打手阻止，且有8个学生在北四川路某教堂因散发传单被捕，囚禁了大半个月之久。26日，上海非基督教大同盟召集游艺大会。大会内容非常丰富：有双簧、舞剑、唱歌，有短剧《教堂里的风波》，

还有自由演讲等。演讲者除一部分革命青年外，有许多是由教会和教会学校里出来的，背叛“上帝”的分子登台发挥反对基督教的意义。教会势力内的人演讲起来更有力。此外，杨树浦、曹家渡、小沙渡等各工人区域亦有工人群众的反基督教活动。

广西、福州、厦门等处皆有很热烈的反帝国主义文化侵略活动。

实行统战政策后，反帝国主义文化侵略斗争掀起了一个新高潮。不仅运动的波及面广达全国各大城市，甚至还努力向乡村推进；而且投身于运动的人也越来越多，许多教会学校的学生，基督教男女青年会会员也融入青运洪流，成为反文化侵略最得力的战士。对基督教的批判也由前期笼统的攻击，进而从理论上、科学上批判基督教。正如《中国学生》杂志第四十期发表的文章《‘反基’运动的新策略》中提出应站在“科学”与“反帝”二观点上反对基督教。反帝国主义文化侵略运动已从“站在教会大门以外乱喊”推进到“深入教堂和教会学校内部拉着教徒和教会学校学生一同战斗的时代了”。

声势浩大的非基督教运动是中国青年反对帝国主义利用宗教进行文化侵略的爱国运动。尽管运动初期由于没有区别对待教会人士、教会学校的学生和基督教男女青年会的会员而打击面过大，产生一些消极作用，但是，自从注意统战，团结了教会、教会学校和基督教男女青年会中的爱国人士后，对他们的促进作用还是比较大的。它使教会内部传教士的专权削弱，中国教牧人员的地位提高，使部分教会脱离差会，成立自主教会^⑧，使教会学校不再强迫学生选修宗教课程，参加宗教活动，并促使教会学校向教育部注册；对基

督教男女青年会的工作也有较大的促进，使它们从以前的偏重个人修养到将注重个人信仰与修养和关心社会问题并重。如中国基督教学生同盟1927年定的宗旨：本耶稣精神，创造青年团契，建立健全人格，谋民众生活的解放与发展。以后，它们又将重心移到关注社会问题上。如1933年中国基督教学生同盟成立临时总会时下设三个委员会，即乡村改进委员会，社会改造问题委员会和国货促进委员会——都是为解决社会问题的。

非基督教运动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帝国主义在教会中的势力，是反帝爱国运动。

〔注解〕

① 受餐信徒：接受洗礼或浸礼后，基督教徒可以定时领受圣餐、称之。

② 张庆思著《国内近十年之宗教思潮》1927年出版。

③ 《文史资料选辑》第19辑第19页。

④ 《批判非基督教言论汇刊全编》第1页，转引自刘心勇《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非基督教运动》，（载《上海青运史资料》1986年第3期）。

⑤ 温宗尧《论教育》，载《新青年》第二卷。

⑥ 《非基督教特刊》第一期。

⑦ 《广州圣三一学生宣言》，载《向导》周报62期（1924年4月23日）

⑧ 《1924年的教会学校风潮》，载《民国日报》1925年2月25日的副刊《觉悟》。

⑨ 《反对基督教》，载《民国日报》副刊《觉悟》（1926年12月25日）

⑩ 《否准教会学校立案》，载《中华教育界》第14卷第8期。转引自夏瑰琦《论我国1922—1927年间的非基督教运动》，载《杭州大学学报》第18卷第2期（1988年第2期）。

⑪ 林根《两年来的中国青年运动》，载《中国青年》100期（1925年10月）。

⑫ 陈家文、黄穗生《大革命时期广州学生反基督教和收回教育权运动》，载《广东文史资料》第48期。

⑬ 艾德教《燕京大学》第146至148页，转引自《中国教会大学史》浙江教育出版社。

⑭ 宁波共青团市委青运史研究室提供资料。

⑮ 《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第3册第316页至317页。

⑯ 钮志芳（杭州市政协）回忆。

第四章

融合，抗日战争

1929年秋，世界上爆发了历时四年的资本主义经济总危机，使资本主义世界工业生产下降了约40%，三千多万工人失业；农业普遍衰退，农产品价格大跌，农民破产者达几千万。为摆脱危机，各帝国主义国家除在国内建立法西斯专政外，还加紧对外侵略扩张。重新瓜分殖民地的世界大战乌云密集，德国、日本分别成为欧洲与亚洲的战争策源地。

日本于20年代受到战后第一次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冲击，1923年又遭关东大地震之灾，经济受到严重破坏，到1931年危机达到顶点。为摆脱危机，日本反动统治集团积极制定对华侵略政策。1927年7月27日《田中奏折》中写道：

“如欲征服支那^①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 “满蒙之权利如真正到手，则以满蒙权利为司令塔，而攫取支那之利源，以支那之富源而作征服印度及南洋各岛以及中、小亚细亚及欧罗巴之用。”发动侵略中国东北的战争，掠夺东北资源是日本整个侵略扩张计划中的第一步，

也是关键的一步。1931年6月，日本陆军省制定了《解决满洲问题方案大纲》。7月开始，日本帝国主义为寻找借口便不断制造事端。9月18日晚上10时左右，日本关东军向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和沈阳发动进攻，挑起了蓄谋已久的“九·一八”事变。由于蒋介石采取不抵抗政策，致使东北三省在3个多月的时间里就沦入日帝的铁蹄下。此后，日本帝国主义即按计划，以“铁血主义”——武装侵略的方针，并通过贸易、开拓、移民、经营铁路、厂矿等一系列侵略手段，不断加强其在我国东北地区的势力范围。1932年1月28日日军又侵略上海，制造了“一·二八”事件；1935年日军加紧策划华北五省“自治”，企图不损一兵一卒得到华北五省；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件，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日本帝国主义得寸进尺，步步侵吞。中国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民族危机使全中国人民都投身于抗日战争。中国基督教男女青年会会员也一样，除极个别汉奸以外，都积极从事抗日救亡活动。

一、大张旗鼓，宣传抗日

中国基督教男女青年会会员竭尽全力，采取各种形式，大张旗鼓地宣传抗日。

他们发表宣言，号召基督教界及各界青年奋起抗日。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基督教青年会校会组组长吴耀宗受印度甘地的影响，发表宣言提倡“对日不合作运动”，企望用和平的方法来制裁日本人的暴行。1932年“一·二八”事件发生，中国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和女青年会全国协会学生部就行动起来投入支持19路军抗击日寇的运动，并

于1932年2月19日发表宣言《为上海事件告全国基督教同学书》。②宣言如实反映了“一·二八”事变经过，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蓄意挑起事端的侵略阴谋及日寇在“一·二八”事变中的残暴行径：“东北三省，既告沦陷，沿江沿海各重要商埠，日人亦尽其扰乱威胁之能事”、“敌人计不得逞，于是闸北一带用飞机投掷炸弹，焚毁民房，以泄其愤。生命财产的损失，不计其数，我国最大之文化机关商务印书馆、印刷所、编译所及东方图书馆均于1月29日同遭浩劫，35年的惨淡经营，至此尽成灰烬。”宣言赞扬了19路军奋勇抗敌，打破日寇“上海中国区域，可于三小时内完全占领”的狂言，向全世界宣告了中国不可欺的英勇行动，还指出当时局势严峻：“19路军虽然得暂时胜利，而暴日箭在弦上，不肯罢手，势将倾其全力以图歼灭我反抗的力量。”提出吾人应有的几种觉悟及应加紧努力的几项工作。宣言最后将希望寄托在“吾人此时，亦惟有精诚祈祷，恳切吁天，冀劫运终得挽回，光明重复照耀而已。”1936年2月25日出版的《消息》又刊登了中国基督徒学生全国临时总会第四届执行委员会的宣言《对于时局的宣言》：

我们相信要实现大同的世界，必须先谋大众彻底的解决。我们站在真理和正义的立场上，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加于弱小民族的压迫和侵略，我们对于日本帝国主义压迫和侵略我们的民族，主张立刻用全国的力量去反抗！

我们不是狭义的爱国主义者，但我们愿为大众的幸福反抗残暴的恶势力，我们更主张联合全世界一切平等待我的民族和各族中的觉悟分子共同反抗！

我们不是武力主义者，但我们愿意为真正的永久的和平而奋斗。我们一面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和互相残杀的

内战：一面主张发动大众自卫的力量，去收复已失的领土和主权！

我们不但同情于全国学生的救亡运动，并且愿意积极的继续参加；我们更愿意牺牲一切，从事于解放民族的反帝抗日的斗争！

为实现上述的主张起见，我们要：

- (一) 发起参加救国运动
- (二) 实行唤起民众的工作
- (三) 提倡不合作运动
- (四) 实施战时服务训练
- (五) 实施非常时期生活训练

“九·一八”提倡的对日不合作运动和上述两个宣言，一则在舆论上起了唤起人民投入抗战的作用，二则清楚地表明了中国基督教青年会、女青年会会员积极抗日的态度。从第一个宣言的“反日本帝国主义”、“亦惟有精诚祈祷，恳切吁天，冀劫终得挽回，光明重复照耀而已。”到第二个宣言的“反对帝国主义”、“一面主张发动大众自卫的力量，去收复已失的领土和主权”，可以看出，随着日寇的步步入侵，他们对帝国主义的认识也逐步提高，并意识到要收复失地和主权不能靠祈祷，而要唤起民众起来自卫。炮火的轰击、同盟的鲜血震醒了唯爱主义者，使其认识到“爱”是阻挡不住侵略者的铁蹄的，于是他们抛弃了以“爱”救国的幻想，投身于现实的抗日洪流中。从和平主义转变为抵抗主义。不少基督教徒和男女青年会会员从超现实、超国家观念、唯爱主义、容忍思想中醒悟过来，纷纷投书基督教刊物说：“无论是基督徒或非基督徒，应当一致起来反抗日本的武装侵略”，“不能让别人去做爱国的事，自己则专门谈天

堂地狱而把国事放在脑后”，“不可用似是而非的道理来自欺欺人”^③，战争使他们从虚幻世界走向现实。

宣言也如实地向全国、全世界人民揭露了“一·二八”事件真相：日寇侵略暴行和其对华阴谋，国民党不抵抗政策和十九路军及人民奋起抗日的英勇行为。当时社会矛盾错综复杂且非常激烈，他们，一个非政治团体的宣言，从某种意义上说，社会影响力更大。

中国基督教男女青年会会员利用杂志、壁报、传单等数十种宣传品宣传报道广大军民英勇抗日的事迹。例如《时代的认识：学生们的怒吼的片断》如实地报道了北平学生“一二·九”游行的经过：“反动武装警察用救火机的喷射和皮鞭子抽打，驱逐我们这一群，后竟更加凶恶地拔出了刺刀，向我们徒手的队伍冲过来，有几个已经走得很累的女同学跌倒在地上了，警察们的鞭子便向下乱抽，我们看见他们有些人颈子里、脸上都流着血。队伍给武力冲散，走在后面的人都被枪口包围起来，许多人被捕了，许多人送进了医院。”

“有一个下级军官和一个士兵走过时，我们把传单发给他们，他们竟掉下泪来，一面立即擦干眼泪读我们的传单。”

“一个十五岁左右的小孩子被警察五人打倒在地，不能转动，仍拳足交下，此唯有大声喊：‘你打，你打，愿意杀就杀吧，反正我是爱国的中国人！’”^④又如《郭清殉难》报道了“三·三一”事件经过。^⑤《山东齐鲁大学学生爱国运动概况》报道了“九·一八”事变后，山东齐鲁大学组织学生反日救国团，从事救亡工作的消息^⑥。上海青年会在上海事件后，就以刊物为喉舌，向社会大声疾呼，他们的三月刊《学生评论》专向国内宣传，周刊《英文通讯》向世界各地宣传事实真相等等。^⑦“汉奸丑态”把汉奸卖国的可耻行径爆

光，使汉奸如过街老鼠，受众人谴责。

演讲是青年会会员的拿手好戏，抗战时正好发挥。各地男女青年会的爱国会员都组织演讲会、演讲宣传队宣传抗日。1932年闽北夏令会请刘强博士演讲“从东北问题谈到青年爱国者”详细地讲了东北物产丰富、土地肥沃、长官之昏庸无能、吏胥之舞弊为私、日本侵略之方式，教育、经济、政治及人民之惨苦等^⑧。哲理中学青年会定期训练会员、青年演讲，组织他们到民间去讲演^⑨。又如宁波青年会举行演讲会，听众达2700余人；他们还分别到镇公所讲演11次，听众达4800人；到各社团演讲3次，听众计1400人，通过电台播音4次，听众更多。^⑩烟台青年会也装置无线电机宣传国难。有的青年会干事甚至因组织演讲而被国民党逮捕，如西安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因积极进行抗日活动，组织演讲会，请沈子高牧师作“基督教与民主”的演讲，抨击国民党当局的法西斯行径，当即就遭到特务的警告，并曾因此而被国民党逮捕。

上海青年会和宁波青年会还别出心裁地搞了一个储力运动，轰轰烈烈，吸引了许多人。如1939年3月18日宁波举办的储力运动，中心内容有四个方面：心力、智力、体力、物力。布置很新颖：门口挂着上书集中大众“心力”、“智力”、“体力”、“物力”和抗战必胜、建国必成的活动广告灯。一通电非常引人注目。进口处放一只钱柜，凡入内参观者，扔一枚铜元，以计人数。出口处分赠树苗给参观者带回家种植。展览厅分四部分：心力部有民族英雄图、抗战英雄照片、古今贤哲图、三民主义图解、国耻图、漫画、抗战必胜、建国必成象征图，国花、国旗、格言、标语、书籍、通告等；智力部有各种常识挂图，各国国旗式样，新式军器图，书籍，军事教育模型，格言等；体力部有卫生挂图，体

格锻炼图，营养图表，体格发育标准图，漫画，烟酒之害说明，各种运动器具、书籍及各项运动章程通告等。物力部有各种废物利用、各种家庭工艺、生产教育书籍、家庭预算表及记帐、养兔、蜂等物件、书籍，各种储蓄章程等。四天展览，观众达七千余人。

电影、戏剧是最受群众欢迎、最易为群众所接受的，无论识字不识字，无论男女老幼都能看懂，所以各地男女青年会都采取了这种宣传工具。例如金陵大学青年会用放映电影来宣传抗战，激发青年学生的民族精神。重庆青年会组织会员在陕西街举行通俗讲演会并演戏《最后一计》、《父归》、《苍蝇世界》等，尤其是《最后一计》这部爱国话剧博得了群众热烈的掌声。哲理中学青年会通过义演戏剧，既宣传了抗日，又筹集了资金救济战区难民。南京等地的女青年会通过举办义演音乐会向社会募得数以千计的寒衣和急救包等支援前方，也激励了她们和其他基督徒的爱国意识。上海基督教学生团体联合会（简称上海联）搞了一次公演《黑暗势力》很成功。这次公演不仅解决了部份男女青年会的学生救济经费，还促使圣约翰、沪江等大学的基督教青年会会员注意到戏剧教育普及性的特点，而组织剧团宣传抗日。

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董事陈仁炳于1938年至1940年带领一个由28名抗日青年自发组成的抗日宣传团体——武汉合唱团。他们由武汉出发到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仰光等地宣传抗日。他们沿路讲演、合唱歌曲、演话剧《放下你的鞭子》、《雷雨》、《日出》、《中国万岁》等，不仅宣传了抗日，还为祖国募得捐款250万美金。

“这次的听众实足惊人，总有2千人以上，将这处的三叉路口挤得水泄不通。讲到激烈时，听众皆面有怒色，几欲

生啖日人而甘心，于此可见当时抗日空气的紧张。在这处直讲至11时方毕，然而已将肇庆全市民气变换一新了。我们和谢牧师握别时，即往乘轮，尾随千余听众，直送余到江干，始一声口号，黯然话别。”这是广州青年会中学生赴肇庆宣传的一个镜头，可见其宣传效果非常好。

基督教青年会的抗日宣传活动中影响最大的要数当时中国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学生干事刘良模组织的民众歌咏会。30年代初，他先在八仙桥青年会和四川路青年会办了二个民众歌咏会，教唱抗日救亡歌曲：《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毕业歌》、《大路歌》、《开路先锋》等，开始只有七八十人，后来增加到300多人。凡参加者不收任何费用，但有一个条件，即学会了歌要教别人。于是，抗日救亡的歌声一传十，十传百地迅速响遍全上海，不久又传到全国各地。歌声激励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斗志，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1934年夏天，青年会在上海南市公共体育场举行了民众歌咏大会被誉称为“万人歌咏会”。当时《大晚报》、《新闻报》等许多报纸都作了报道。记下了当时激动人心的场面。这只要摘录当时的一些报道就可略见一斑，如《新闻报》在6月8日作的题目为《青年会民众歌咏会举行七百人大合唱，东北籍警察禁不住淌下泪来，体育场中只听得‘前进前进！’》的报道。将当时热烈的镜头摄了下来：“这一两年来，紧随着我们民族危机的加深，一切‘毛毛雨’之类的无聊歌曲，都已成为被历史车轮轧碎了的废物，代之而起的，是充溢着民族解放气魄的歌曲，是自救的斗争性的歌曲。

昨天早上十时，上海基督教青年会主办的民众歌咏会，

在西斜路公共体育场举行第三届音乐会，有700多人参加大会，听众集中在体育场内的，也有5000多人，男的、女的、老的、少的，一切都有。”“接着便依照秩序单开始唱歌节目，700人全体合唱的有下列14个歌曲：（一）、大路歌，（二）、开路先锋，（三）、救中国，（四）、新女性，（五）、和平歌，（六）、大地行军曲，（七）、救国进行曲，（八）、锄头歌，（九）、‘一·二八’纪念歌，（十）、自卫歌，（十一）、军歌，（十二）、打长江，（十三）、自由神，（十四）、毕业歌。民众歌咏会分队个别唱的有：勇士凯歌、救亡进行曲、新的英雄、赴战、打哼歌、苏武牧羊。此外，还有一队十几岁小朋友合唱的歌：谁说我们年纪小。临时又添了‘打回老家去’和‘逃亡曲’等前进歌曲。

我们听众听了大会唱之后，临时由指挥刘良模教会了两个歌曲，一只是‘救中国’，一只是‘救国进行曲’……不到五分钟，我们便学会了，5000多人汇流的歌声，响澈了大地，体育场上的空气，顿时激昂热烈，已到了顶点，炎热的太阳，熏晒得这样火热，可是，我们内心的热血，燃烧得比太阳还要热烈，当我们唱到‘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前进进！’时，我们沸腾的热血像要从血管里爆裂出来的样子，紧握着愤怒的铁掌，大家拔直嗓子唱出这样‘震撼大地’的歌声。……其中有几个东北籍的警察先生，在他们听毕‘打回老家去’这只歌曲后，晶莹的泪珠从眼眶里直淌出来，不能自制，听吧！那雄壮的歌声……‘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起来！起来！起来！’这歌声，传遍了全上海长长短短的马路，这怒吼激动了每个萎缩的肝胆，等到四万万五千万个同胞都能大声唱出这样雄壮的歌曲的时候，那就是我们挣断捆在我们身上的铁链子的时候了。”

《大晚报》也发了“西安公共体育场上……空前的民众歌唱会，会唱者有七百人、听众有五千人”的报导。“……每个节目歌唱起来的时候，声音都洪大得那么壮烈，像煞一群英勇的战士在向敌人冲去样的。有人说‘天翻地覆了！’是的，谁能说形容的过分呢？你瞧！那屋顶上，树枝上、那竹篱上不是都站满了倾听的人吗？整个西门一带都给哄动了啊！当最后一个节目‘毕业歌’歌唱起时，群众而且都自动地和了上来，所有的人都站了起来，会场的空气，一时真激到了极点，我遥望场外，场外的群众也都沸腾起了热血，个个都在哗喇哗喇地响应呢。”这是该报导中的一段。

从两报的报导内容中可见，民众歌咏会收到了意想不到的社会效果。

不久，香港、广州、太原、重庆、浙江等地青年会都办起了民众歌咏会。

上海沦陷，刘良模率领一个青年会军人服务歌咏队到金华，推广抗日救国歌曲的工作。1939年周恩来同志到金华，刘良模闻讯去拜访，受到周恩来同志亲切的接见，并象会见老朋友一样和他谈话，勉励他“你在上海和金华推广抗日救国歌曲的工作，做得很好，要继续下去。”^⑩4月4日下午周恩来同志还特意到铁岭头十号看望了上海基督教青年会军人服务部歌咏队、上海慰问第三战区流动剧团和台湾义勇队的人员。周恩来同志对歌咏队队员说：“你们的工作一面宣传，一面组织，同时你们在浙江是负有重大使命的，不要忘记你们的任务”。^⑪使歌咏队队员受到极大的鼓舞。瞬间，抗日救亡歌曲响遍了全国各地，使许多青年从中受到鼓舞而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

内地的青年会除了举办抗战歌咏会，还举办农村演讲、

街头话剧、壁报、时事讲座、抗战画展，放映抗战电影等多种方法进行抗日宣传。

二、竭尽全力，募集资金

俗话说：枪炮一响，黄金万两。战争爆发，财政经济成为一个突出的问题，无论支援前线或救助后方都需要经费。故抗战伊始，全国各地的基督教男女青年会会员都积极从事捐献活动。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各地青年会、女青年会会员都利用自己所处的环境、条件、扬长避短，采取各种方式进行募集资金。例如，当国民党政府发行5亿元救国公债时，上海基督教青年会劝买活动在半个月中就超额完成了10万元任务。香港基督教青年会会员集资7000元作慰劳伤兵之用，香港基督教女青年会发动会员制作捐赠伤兵棉衣、内衣、慰问袋、救伤包及日用品、图书、各种药品等。广州青年会与女青年会于1933年4月16日召集各校青年会及各校抗日分会主席到长堤青年会召开联席会议，组织了“广州基督教学校学生援助全国青年会战区服务委员会”，他们发动各教会学校的学生捐款和制作军人内衣。他们向24所学校征集了3374套内衣，30磅棉花和1件衣服，还向协和女师等7所学校征得钱3110.05元，汇给中国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转发前方。详见第95至97页上的表《军人内衣征集结果统计》和《经济征集及支出表》

成绩最显著的是上海基督教男女青年会与《申报》、《新闻报》的“社会服务栏”联合举办的救济失学义卖市场。

“义卖市场”是男女青年会在集资中常用的方法，驾轻就熟。他们一面在《申报》、《新闻报》的社会服务栏登出

军人内衣征集结果统计（以套为单位）

单位名称	寄汇衣样套数	缝制交到数
岭南大学	6	657
培正中学	4	1000
培英中学	4	100
培建中学	1	380
真光中学	1	331
协和女师	1	99
美华中学	1	100
崇基女校	1	×
兴华中学	1	×
真光小学	1	49
女青年会职工学校	1	54
夏葛医校	1	40
瑞拿护士学校	1	43
岭南分校	1	×
岭南高职	1	×

续表

单位名称	寄汇衣样套数	缝制交到数
华英男女校	1	×
光华医校	1	×
淑正小学	1	45
圣心小学	1	100
图强护校	1	7
圣希利达女校	1	112+棉花30磅
妇孺学校	1	105+衣1
中德中学	1	×
大光学校	1	21
伍倚霞女士	1	10
许兆昌先生		10
黄登先生		2
总计	3374套	+棉花30磅(圣希利达女校交) +衣一件(妇孺学校交)

经济征集成绩及支出款项表

学校名称	交到款数	支出项目	款数
岭南大学	674.81		
协和女师	189.00		
培英中学	1440.00		
培正中学	150.00		
真光中学	300.00		
美华中学	180.00		
培道中学	215.24		
收入合计	3149.05		
		邮 票	4.13
		送信及内衣工资	13.75
		针 线	23.55
		印刷文具	35.38
		汇寄上海协会 (由市会汇出)	3024.24
		支出合计	3114.05
结余款项	35.00	(存余瑞尧处)	

举办“救济失学义卖市场”的消息，四团体为鼓励自助助人的精神起见，关于义卖市场的筹募货物、推销代价券及会场服务等事宜，拟请各大、中学校同学自动参加义务协作。各校同学对此如感兴趣而愿参加服务者，望即至男女青年会接洽。号召接受“二报”助学金的同学参加。另一方面男女青年会中的少年部、少女部及学生部的干事们又分头向各大、中学校当局游说，说明救济失学的必要，请他们支持学生参加“救济失学义卖市场”。结果获得极大多数学校当局的支持。沪江、大夏、大同、圣约翰、交大、复旦、华东、中法药专、同德医学院等大专院校和沪江附中、南洋模范、三乐、沪新、南洋、复旦实中、青年会中学、正养、辑规、中职、育群、圣芳济、上海工专、华联、清心、崇德、道中、明德、启秀、民立、培成、进德、晏摩氏、南屏、福莘、务光、第一女中、坤范等男女中学，共有30几所大、中学校的学生参加工作。规模很大，光圣约翰大学就有500多学生参加。学生以校为单位成立义卖组织，分头向工厂、商店征集义卖物品，向亲友推销义卖代价券，还自己动手制置玩具、墨水、糖果等。义卖那两天，各义卖组织都采用各种方式来回收代价券，他们除了经营店面，还组织演出、游艺室、咖啡茶座等。当时《申报》、《新闻报》对这二天盛况都有报道：“在青年会大门口，有大同大学学生在义卖助学纪念章；底层健身房和二楼图书馆、雪齋堂由30几个学校分别设摊出售自己的义卖物品，可说是大大小小的百货商店，其中规模最大的是交大、圣约翰和沪江大学。如交大同学制作了电动玩具和滑翔机、飞机、军舰等模型出售，沪江大学自制墨水、花生糖，大夏大学自制咖啡、糖等出售，圣约翰大学还出售颜惠庆的珍贵书画，南洋模范中学出售黄宗英、

王丹凤、周璇等的签名照片。底层的健身室办了游艺室，有钓鱼打枪、摸彩、测字等活动。二楼交谊厅是茶座，由沪江大学和圣约翰大学轮流主办，同学们亲自制作各种点心、咖啡，还有圣约翰大学同学组织的乐队伴奏，大礼堂两日先后演出音乐会、木偶戏、话剧、哑剧等。三楼设同德、约翰两个医务室，由医学院同学讲解病理，还有心肺、血压、血型检查等；另外还有变戏法、刻图章、书画等“技术表演”。两天义卖，直接参加义卖市场当“售货员”，“招待员”等服务工作的同学有1000多人，到义卖市场的顾客包括学生和各界人士则有十几万人。

两日义卖成绩辉煌，得捐款2681万元，超过原定目标一倍半。此次义卖活动得到各界人士的支持和称赞。1月27日《新闻报》以“奋发与慷慨”为题写道：“同学们的情绪非常热烈，各部报告的成绩也非常美满。在我们自己，差不多一二月以来，都觉得心情非常沉重，在那2小时内，就轻松了许多。抢救失学义卖市场……所有征集货物推销代价券，都由许多同学担任，活泼的青年，轩昂的意志，强毅的心情，蓬勃的朝气，他们为了同学的学业而努力，是值得赞扬的。学生如此，希望各界都如此。”“义卖市场”不仅募到了款，而且锻炼了学生团结互助，同舟共济的精神。学生受到了教育，上层人士受到鼓舞，人民群众增强了抗战必胜的信心，真可谓一石三鸟。

香港男女青年会在抗战初就动员各校募捐得款1500余元，分别寄长沙学生救济会及全国学生救济会。以后，他们又在校举行长期捐款，有的每日一分，有的每周一角。还时常举行特别募捐和就全港一元还债运动，并且还和香港联合作，向各校发出献捐封共五万个，捐得款4500余元。

各地男女青年会都为抗战筹资而进行形式多样的募捐活动，成绩颇佳。

三、雪中送碳，救济难民

战争使人们流离失所。家园被战火焚烧，人民开始逃难；校园被炸毁，学生开始流亡。随着战火的蔓延，难民与流亡学生与日剧增，成了当时一个极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于是，基督教男女青年会全国协会就号召各地青年会着手救济难民、流亡学生的工作。他们联合组织了“全国学生救济委员会”，并在上海、北平、西安、武汉及长沙、香港等流亡学生汇集点，由当地基督教青年会、女青年会联合组织了非常时期学生救济委员会，开始学生救济工作。他们开办男女生经济宿舍，为流亡学生提供廉价宿舍，并资助流亡学生回家或转内地上学，或以安排学生战时服务工作，使其得到相当报酬，而解决他们的困难。基督教青年会还推行“自助助人”的方针，变消极的救济为积极的工作，他们特设立了“学生工作设计小组委员会”为学生寻找工作。他们设计了二种调查表：一是徵求工作学生调查表，二是徵求学生工作调查表。以便向各机关征求工作机会，介绍学生前去工作来解决学生困难。

(一) 徵求工作学生调查表 (限为学生用)

注意事项：

1. 请求工作限于受教育部及本会或其他机关津贴之战区学生。
2. 每个学生每日工作以二小时为限。
3. 每小时工价以国币二角为限。

4. 请在愿参加之工作项目后以记号标出。

5. 此表在4月10日以前交盐行路20号青年会筹备处。

姓名	学校	性别	年级	籍贯	省县
工 作 项 目	1. 抄写稿件	10. 夜校教员	19. 写新闻稿		
	2. 校对印刷品	11. 难民工作	20. 配置墨水		
	3. 装订书籍	12. 伤兵工作	21. 制造浆糊		
	4. 抄写卡片	13. 教授歌咏	22. 纺织手工		
	5. 调查工作	14. 翻译书籍	23. 制造肥皂		
	6. 宣传工作	15. 整理案卷	24. 办理印刷		
	7. 防疫工作	16. 图书管理	25. 办理学生消费合作社		
	8. 家庭教师	17. 代卖物品			
	9. 机关助理	18. 实验室助理			

注意：20项至25项由本委员会设计开设征求同学参加工作

(二) 征求学生工作调查表 (限为各机关用)

注意事项：

1. 学生工作纯为一种救济性质。
2. 每个学生每日工作以二小时为限。
3. 每小时工价以国币二角为限。
4. 在需要学生工作项目后以“√”标出。
5. 此表请于4月10日以前寄交盐行路20号青年会筹备

处。

机关名称	地址	负责人	职务	时间	人数
工 作 项 目	1	抄写稿件		14	翻译书籍
	2	校对印刷品		15	整理案卷
	3	装订书籍		16	图书管理
	4	抄写卡片		17	代卖物品
	5	调查工作		18	实验室助理
	6	宣传工作		19	写新闻稿
	7	防疫工作		20	配置墨水
	8	机关助理		21	制造浆糊
	9	家庭教员		22	纺织手工
	10	夜校教员		23	制造肥皂
	11	难民工作		24	办理印刷
	12	伤兵工作		25	办理学生 消费合作社
	13	教唱歌咏			

内地基督教男女青年会学生救济工作也开展得非常好，帮助流亡学生解决各种困难。凡缺少旅费的，借给旅费；交不起学费的贷给学费；无钱买书的可到青年会借用；生病的，津贴医药费；热天还免费借用蚊帐，冬天，青年会又备

制了棉衣、棉被和鞋袜发给困难的学生，还尽最大的努力帮学生解决营养问题……

广州基督教青年会在抗战爆发后，不断用寒衣、被服、营养品及医药费、生活补助费救济流亡的大、中学生。据不完全统计，受过救济的学生累计达8000余人。

广州失陷，武汉撤退和长沙大火以后，基督教男女青年会所办的学生救济工作的重心也由上海、北平、长沙、武汉、西安、广州一带渐渐转移到重庆、成都、贵阳、昆明等西南城市。原因是抗战爆发后，战区的学校已无法开学，加上交通不便，父母也希望在战乱中能保持合家团聚，而不让子女上学。故绝大多数学校都搬迁到西南一带。

1937年底，日军已占领了北平、天津地区并将魔爪直伸到南京，分布在华东的学校面对这急转直下的形势，只有三种选择：一是战争期间关闭学校，二是留在华东受日本人干扰，三是迁到非沦陷区。当时，绝大多数的学校都选择了迁移的办法。广大师生在爱国主义精神的鼓舞下，不畏艰辛，长途跋涉，将学校迁到非沦陷区。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女青年会全国协会在上海沦陷后也迁到重庆。

为了对内迁院校的学生进行救济和服务工作等，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校会组、女青年会全国协会学生部就在各偏僻大学办“学生公社”和“学生服务处”。如在昆明的西南联大、陕西城固的西北大学、广西良禾的广西大学和贵州遵义的浙江大学等都成立了“学生服务处”和“学生公社”开展学生救济、学生服务工作，一定程度上在精神与物质上帮助学生坚定抗战必胜的信心及在艰苦环境下完成学业。如遵义学生服务处主要是为浙江大学的学生服务的（在涪潭的浙江大学分部也成立了涪潭学生服务处），1941

年，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派学生干事纽志芳等到遵义学生服务处工作。他们到遵义后，看到许多同学的学习条件很差，生活很艰苦，但很认真好学，有求是精神，使他们认识到学生救济工作不仅要做好医药救济、生活补助、营养供应等改善物质条件的工作，还应努力突破沉闷和闭塞的环境，帮助同学开拓思想、振奋精神、树立抗战必胜的信心。所以，遵义学生服务处在纽志芳的设计下，开设了许多服务项目，有图书阅览工作，剪报资料工作，供应营养豆浆工作，还设有便利同学互通有无的旧物、旧书的寄售部，为同学们提供文娱活动的幻灯放映，举办棋类比赛和协助浙大基督教团契的宣教工作等。特别受学生欢迎的是学生服务处设的一个小图书馆，它有不少进步的文艺和社会科学书籍，这些书都是从当时文化比较活跃的桂林、重庆等地的三联书店采购来的，为身陷沉闷、偏僻、闭塞的小城的学生提供了丰富的精神食粮。如苏联小说《战争与和平》、《静静的顿河》、《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及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夏衍、端木蕻良等我国现代进步作家的作品和艾思奇的《大众哲学》等书。阅览室里除了《大公报》、《中央日报》，还有《新华日报》和民主同盟出版的《民主报》等，让同学们通过自己的观察、选择，来了解当前国内外形势。1944年底，他们还设法获得美国新闻处的《时事新闻照片》，每半月在图书展览室里展览一次。新闻照片有：关于盟国开辟第二战场，日、德、意轴心国失败投降的照片，有世界地图，还有国内形势图，上面随着战局的发展，插着胜利的红旗，吸引了许多同学，鼓舞着他们抗战必胜的信心。学生服务处还在老城元天宫二号设立了宗教部，后又在那儿搭了一间活动室，作为浙江大学基督教团契活动的场所。浙江大学

团契活动很活跃，除了唱诗、查经外，还举行小组讨论、读书介绍、跳集体舞等，气氛融洽。他们常在一起交流对时局和学运的看法及学习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在遵义举行了“弥赛亚神曲”的大合唱，很受同学欢迎。后来，不少唱诗班的骨干加入了“浙大歌咏队”，演唱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深受浙大师生和遵义市民的欢迎和赞扬^⑭。

宁波青年会在抗战时期的学生救济工作也很有特色。曾被人称为“世界上最奇特的青年会”，是一个“游击队式”的青年会。因宁波青年会从1941年4月开始流亡直到1945年9月14日结束，共计四年半时间。流亡的地区达三个省（浙、赣、闽），20多个县，全程计8000华里，在6个县城设立过服务处开展工作。他们开展的工作有抗战歌咏队、战事常识演讲会、英文补习班、补习学校、救护队、商人讲习班、基督徒友谊社、难民救济及救助流亡学生等^⑮。

中国基督教男女青年会除了救济学生以外还积极帮助难民。

1937年抗战乍起，上海闸北、虹口及其他市郊相继失守，大批难民涌向市中心，不久，天气转寒，几乎每夜都有四五百人冻饿而死，上海联举办难民收容所，收留难民，为难民解决饮食、卫生、教育等问题。当时上海基督教男女青年会大部分干职人员都投入救济难民工作。他们直接举办了6处收容所，安置难民12000多人。他们还举办难民职业培训班、难民生产教育等为难民解决生活出路创造条件。接着各地男女青年会都开展难民救济工作。据1942年的一个报告统计，仅金陵大学青年会就从事了100项以上的社会服务活动。特别是在内地开展社会活动难度是很大的，因为内地农民与学生在文化、社会规范上差距很大。如华南女子文理学

院的女生，第一次访问附近农民时，农妇吓得慌忙逃离村庄，害怕被强迫剪短发、被拉去军训，不过，当她们离开村庄时，农民已不怀疑学生了，并且还用放鞭炮、送锦旗的传统方式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

难民救济影响最大的要数广州基督教青年会搞的枫连线。

“幸得枫连线，来把灾黎救，入得难民营，食住两无忧。”这是难民感谢广州基督教青年会办的“枫连线”而赠的诗。所谓“枫连线”就是广州基督教青年会在韶关沦陷时，见大批难民逃到附近枫湾，生活无着，就派谢琼孙携关金20万元前往枫湾办理救济。他一到枫湾就动员青年会会友傅伟和一些学生，借用当地祠堂及大锅等炊具进行施粥救济。不久，刚从乐昌办理学生疏散救济回韶关的干事邵明耀（曲江学生救济委员会执行干事）带领青年会最后留守韶关的部分职工，同女青年会干职人员一起到达枫湾，并立即投入枫湾的救济活动。面对着越来越多的难民，他们一面扩大施粥，一面筹设难民营，3天之内就设立了6处难民宿舍，收容了五六百人。他们还在疏散来的后岭大医学院师生的协助下办起了医疗站，替被日军打伤、或生病的人治疗。例如位于韶关郊区的仲元中学，因抗击日军，校长梁镜尧英勇牺牲，幼子梁元博脊柱被日军刺伤，学生也有数人受伤。当他们搬到枫湾时就得到医疗和安顿。消息传到沦陷区，闻风而来的难民越来越多，小镇被充塞得拥挤不堪，最成问题的还是粮食供应不上。为了及时疏通，他们在水村召开了一个紧急会议，由广州基督教男女青年会、青年会战时救济会及曲江学生救济会联合组织了一个领导救济工作委员会，青年会董事潘允和医生被推选为主席，委员会领导核心小组成员有

总干事王以教、副总干事兼枫湾总营负责人谢琼孙，华屋总办事处主任邵明耀、总督导邓锦辉，督导张广焜，后期枫连线主任李圣华^④。委员除核心小组成员外还有岭南医院院长马汝庄，广州青年会会长胡黄玉贞，青年会会友许彼德等。机构成立后，他们就开展枫连线疏散救济工作，将滞留在枫湾的大批难民疏送到安全地区，并解决他们的食宿及生活问题。开辟了一条由枫湾经小坑、华屋、隘子、坝子、坡头到连平的疏散线。这条疏散线长达300多华里，横跨曲江、始兴、翁源、连平四县（以后还伸延到老隆及兴宁，一度还深入到乐昌、仁化）。沿途定点设站工作异常艰难，时正遇上百年罕见的大雪，群山皆白，全线又没有大路，开山劈路历尽艰辛，但他们还是在半月以内就完成了沿途定点设茶水站、施粥站、难民营及医疗站的工作。6个月内共组织疏散队80多队计4000多人。各站收留的难民数累计达50000余人，还治愈了沿线患疟疾的村民约400至500人，群众对此十分感激。

四、救死扶伤，战区服务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各地青年会都曾在欧洲战区为军队举办服务工作。中国基督教青年会也于那时开始从事战地服务工作，故在这方面经验较丰富。抗战初期，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就发起战区服务工作。为便于领导全国市会和校会都参加这项工作，1933年2月间他们组织了《战区服务全国委员会》，简称战委会。战委会又另组织了一个“执行委员会”简称“执委会”。这两个委员会推选梁小初为执行干事。全国协会干事还专门为此事成立了“战区服务总部”

简称“总部”，内设五组，接着又在北平成立了“战区服务部”简称“服务部”，内设六组。

上海总部的任务是：（一）、设计，（二）、联络，（三）、筹募经费、保管款项、稽核帐目。（四）、派员分赴各地宣传，（五）、接收、购买及输送各项用品，（六）、搜集史料，编制各种图表、新闻及报告等。

各地市会和校会主要承担以下各项工作：（一）、募集捐款，（二）、致送慰问品，（三）、征募战区工作人员。如青年会全国协会干事刘良模曾应武汉青年会邀请到湘，征集了50人在湘受训练后，派到前方服务。（四）、举行报告战况的演讲会，使群众了解战情，（五）、组织演讲会分赴各乡各地演讲。

由于各战区情况不同，各地男女青年会会员所采取的服务方式也各有差异。但主要是围绕八个方面展开，（一）、设立普通招待处，招待普通往来的军队、军用车夫。（二）、设立伤兵招待处，供伤兵休息和采取一些救护措施，如供给一些药品等。（三）、设伤兵医院俱乐部。替伤兵代写书信、到各病房慰问并分发慰劳品和演讲，开展放映电影等娱乐活动……（四）、设军人俱乐部。一般设在前线附近，供前方军人换防时休息，并兼办救护工作。（五）、军官俱乐部。供军官闲暇时消遣、娱乐用。（六）、流动宣传。派人携带电影机、幻灯机分赴各区放映电影片《共赴国难》等，组织演员到各地巡回演出。（七）、协助各部门进行救护伤兵、救济难民等工作。（八）慰劳工作。

战区服务工作历时六个月，1933年3月至8月，广达12个区即天津、遵化、蓟县、密云、唐山、张家口、北平、通县、保定、榆次、阳泉及大同等地。

战区服务工作影响较大的是中国基督教青年会军人服务

部。

“七·七”事变，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为响应政府作出的全国抗战、出钱出力的号召，总结战时及平时服务于社会的经验，于1937年8月初建立全国青年会军人服务部，发动全国各地的青年会分区组织服务军人的机构，从事战区服务军人的工作。各地董事、干事、同工、会员及会友都争相出力、出钱，本着“乃役于人”的会训和“博爱牺牲”的教旨，努力为抗战军人服务。

军人服务部上为总部，设总干事、副总干事各一人，内分总务工作、经理人事、视导训练三组。各组设主任一人，有干事助理若干人共同工作。总部是全国军人服务之中枢组织。下为实地工作组织即支部——服务于某一指定部队或工作的据点，及游行工作队——分组如电影、戏剧、歌咏组，巡回各地慰劳军队。抗战初期，支部和游行工作队只有10多个，随着抗战迅速扩展，到1944年支部有40个，游行工作队有10个。这是全国军人服务部的基干组织。

军人服务部的组织随抗战的深入而壮大，军人服务部的工作也因形势而变化。抗战初期工作中心为设行军招待所，接待来往军队、军人，供应茶水、食宿和救护工作；设伤兵招待所及换药站，不分昼夜从事救护、急救工作。

抗战第二阶段。1939年至1940年，各地军医院都已成立，于是就增加医院服务游行工作和文化教育工作。青年会干事深入到各地重伤医院，成立军人俱乐部，内置各种娱乐设备，如留声机、乒乓桌等，调剂伤、病军人的精神生活，重伤不能动的就放唱片给他们听，或送阅书报，每周或每旬邀请当地文艺团体来表演，或放映电影，有时还举办大规模的同乐会为伤病员解除烦恼、减轻痛苦、调节情绪，使其早日康复。

游行工作队也经常到各战区巡回放映电影、幻灯、上演戏剧、并购置大量书籍到各部队设阅览室，还根据士兵的文化水平，编印军人消遣丛书20余种，分赠各部队，很受广大士兵的欢迎。

1941年军人服务工作随战势变化而变动，国内支部因部队调动频繁改为随军服务。这样就可开展一些耗时较多的活动，如军人识字班、军官补习班、卫生训练班、歌咏指导及体育活动等等。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际反法西斯阵营形成，中国先后派军队到缅甸，协助他们作战。青年会也派员随军进缅甸服务，并根据部队身处异国的特点开展工作，如教军士学习英语及国际仪礼，利用青年会是国际性的宗教服务团体来开展国际联谊工作。利用各种交际集会或举办联谊会促进同盟国间军人友谊……

青年会办的军人服务工作不但从物质上进行服务，还从精神上进行服务，且活动形式丰富多彩，深受军士喜爱，工作开展顺利，成绩颇佳，故也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好评和大力支持。他们纷纷解囊相助，当时的“认捐单”就可说明这一点。详见下页所附的“赞助青年会战区服务工作认捐单。”

军人服务部的工作成绩，我们可以从第113、114页图表中窥见一斑。

战区服务工作，基督教女青年会也不落后。各地女青年会都纷纷组织战时服务团投入抗战救亡运动。例如1938年9月1日，汉口基督教女青年会战时服务团成立。吴瀚（汉口女青年会劳工部干事）任团长，陈维清（女青年会汉口女工学校教员）任总干事。刚成立时她们的中心任务是：以服务伤兵为基础，开展抗日宣传活动，动员和组织广大人民群众参加抗战。起初只有24人，以后随着形势的发展和工作的需

作工务服区战会年青助赞

单 捐 认

敬启者敝人对于青年会从事非参战性之
战区服务工作十分赞同且认为系当今救
国之要务故愿捐助贵会 元

准在 月 日前交入此致

上海博物院路念号

基督教青年会全国战区服务委员会

姓名：

地址：

民国廿二年 月 日

1940年下半年到1945年军人服务工作统计表

服务项目	1940年下半年		1941年		1942年		1943年	
	年被服务人数	被服务人数	年被服务人数	被服务人数	年被服务人数	被服务人数	年被服务人数	被服务人数
教育工作		3020072	4720715	4731194	2872933			
体育与游戏		723920	1339342	3487091	3859034			
娱乐与慰劳		2008261	4478713	3771302	1082405			
个别服务		520395	240982	107448	209848			
总计		6272648	10779752	12097035	8024220			

军人服务部服务处所统计表

年 份 服务处所	1940年下半 年处所数	1941年 处所数	1942年 处所数	1943年 处所数
支部长期服务之 伤兵医院	55	61	52	53
支部长期服务之 部 队	111	136	86	65
游工队服务之 部 队	96	122	123	108
游工队服务之 伤兵医院	49	71	62	54
支部长期服务之 抗属学校				20

要，陆续增加到70多人。服务团人数最多时，分成三个队分别在湖北、湖南、广西、贵州四个省的十六个市、县、镇，20多个后方医院，3个荣誉大队工作，历时四年零五个月。工作颇有成效。如1938年9月武汉形势已很紧迫，大批伤兵转运到武汉，急待抢救，但服务团刚成立，救护伤兵所需的药物等全没有，于是她们就上街宣传抗日，并发起募捐，沿街向商店、住户、市民募集纱布、药棉、剪刀、镊子、药品以及毛巾、肥皂、草纸等。她们的行动受到武汉商界及市民

的大力支持，募到了大批物资，她们就带着这些东西到协和医院和第一伤兵收容所，投入紧张的救护伤兵工作。尽管当时日寇对武汉昼夜大轰炸，她们还是不顾个人安危镇静地替伤兵换药治伤。10月7日开始，她们因战势扩大随伤兵转移到长沙后又到衡阳等地。她们每到一地方，都到医院、荣军大队或居民点开展多种形式的抗日宣传活动。如街头演出、唱抗日救亡歌曲、演短剧、组织妇女儿童识字班、歌咏队和洗衣队（帮伤兵缝洗衣服）等。在伤兵医院、荣军队中，她们举办中山室俱乐部，给伤兵讲故事、教伤兵识字、唱救亡歌曲、出时事快报、墙报（医院称《战友》、街头叫《老百姓》、《大家看》等），内容有前方抗战形势分析、国内外形势分析、抗战漫画等，中心是宣传坚持抗战、进步、团结、反对投降、倒退；宣传军民合作，号召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全民一致抗日，荣军伤愈重上前线等。

每逢各种纪念日，她们还和当地政府联系与当地其他救亡团体一起，联合举行大规模的群众性的抗日宣传活动，组织街头宣传，火炬游行、纪念日大壁报、举办文艺义卖演出、慰问伤兵、募寒衣、募隔日报纸转送前线等等，均搞得轰轰烈烈。节目形式也多样化。有自编的双簧、快板、活报剧、抗日秧歌剧、镰刀剧和小歌剧《石榴青》等，也有与其他团体联合演出的大型话剧，如夏衍的《一年间》、王逸的《生路》，于伶写的《春光杯》等。

不过，她们的工作重点还是放在后方医院的伤兵服务工作上。她们给伤兵洗补衣服、灭虱、剪指甲、代写家信、给重伤兵、病员做特别营养餐等。尤其是刚从前线运来的伤兵，因途中不洗澡、不换衣服，到医院时，衣服上满是脓血屎尿、疥疮和汗水油垢，但她们对此从不叫苦、叫累，而是

愉快地干着这一服务工作，她们脚踏实地的服务工作得到了伤兵、后方医院和社会各界人士的肯定，同时也影响、鼓励了許多人投入抗日救亡运动中。

其他各地女青年会组织的战时服务团，如上海女青年会组织的战时服务团也与武汉女青年会组织的战时服务团一样，以其不怕苦、不怕脏、不怕累、踏实细致的服务工作得到各界人士的支持和赞扬。

五、四出奔走，国际求助

基督教男女青年会会员利用它们是国际性组织的有利条件，四出奔走、八方联络，呼吁各国支持我们的抗日战争。

抗战初期，男女青年会全国协会的负责人就联名致电国联大会，要求制裁日本。同时，男女青年会的会员都积极通过青年会团体和个人关系开展国际性宣传活动，争取世界舆论的支持。1938年7月24日，世界基督教青年大会在荷兰阿姆斯特丹的音乐演奏院开幕，有65个国家的1500多名代表参加了会议。在闭幕晚会上，中国的27名代表集体演唱了“锄头歌”，“大路歌”、“义勇军进行曲”等抗日救亡歌曲。青年会干事刘良模到美国以后，不仅自己给美国人民唱抗日歌曲、组织华侨青年歌咏会教华侨青年唱，而且还教美国著名黑人歌唱家保罗·罗伯逊唱“义勇军进行曲”。罗伯逊很关心中国的抗日战争，歌曲学会后他到美国各地举行音乐会，都唱这支歌，影响非常大。美国人喜爱地称此歌为中国抗战的象征和号角。

刘良模还积极在《华侨日报》上写稿，宣传抗日。《华侨日报》是华侨洗衣工人联合会主办的，由唐明照主要负责

的报纸。他还在美国人民支援我们的抗日团体——援华会担任演讲员，到美国各地报告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及唱抗日歌曲。

女青年会全国协会学生干事施葆真到美国各地演讲，宣传抗日，被美国远东救济委员会选为委员。该委员会到1938年就先后汇给中国6000元美金，以救济中国学生。

1938年7月，青年会全国协会校会组主任干事江文汉到瑞士参加国际学生服务社年会，在会上汇报了中国抗战的情况和中国流亡学生的情况。

各地基督教男女青年会和上海联还发动国际通讯运动。1938年圣诞节上海联就发动学生写了1500多封信给美国总统罗斯福，呼吁制裁日寇侵略，维护和平，还开展国际友谊叙会活动，及时将反映当时中国青年动态的照片汇编成册，趁世界基督教青年大会在荷兰召开之际，将2000本图册分送给各国代表团，使国际各界人士了解中国抗战情况。

沈阳青年会爱国会员自动组织起来，除了鼓励人民起来抗日以外，还冒着生命危险揭露日本侵略者的罪行。1932年，他们听到国联调查团将来沈阳调查日本侵略罪行的消息，不顾日本鬼子的大搜查、大逮捕和血腥屠杀，分头搜集了大量日伪报刊、文件、命令、布告等文字资料，分成两大部分，并译成英文，冲破日本帝国主义的封锁，送到沈阳英国领事馆。4月，国联调查团来沈阳时就拿到了这些资料，尽管日本特务费尽心机，百般封锁，仍未达到目的而成为徒劳。^⑩

上海基督教男女青年会于“一·二八”事件后向全世界人士揭露了日寇的侵略罪行。

基督教男女青年会爱国会员及其他爱国者的广泛的国际

宣传活动，终于使世界各国人民看清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丑恶嘴脸，彻底粉碎了日寇广泛散发的所谓“日本进军中国是为救中国不致陷于赤化”的反动传单的罪恶阴谋，从而赢得了世界各国人民的同情和支持。各国青年会还为中国抗战募捐，例如，美国专门成立了援助远东学生捐款委员会，到1938年已募集了2万元美金，其中大部分汇到中国。1937年国际学生服务社为援助我国受战事影响的学生募到捐款15万瑞士法郎，并及时汇到中国基督教男女青年会，专门用于救济学生。

世界学生保障和平自由文化联合会、美国青年和学生运动领袖都纷纷写信给中国学生、青年表示支持中国抗战。这给中国青年以很大鼓舞。这里抄录了美国青年和学生领袖给中国学生的一封信，足以说明国际舆论对中国抗战的强有力的支持。信的内容如下：

中国的同学，亲爱的朋友：

我们已知道你们反对日本侵略，争取中国独立的英勇运动，我们也知道了你们为这运动所遭遇到的巨大牺牲。千百个中国青年已丧失了生命，夺去了自由，这就是充分的证明。

在美国青年的立场，在美国青年学生运动领袖的立场，我们要竭诚地表示对你们的努力的同情，虽然，我们的国家常常把它的兵舰和潜水艇开来干涉你们的内政的。

在150余年前，我们的祖宗为了要从英国的压迫下得到自由，曾经有一次艰苦的战争。这独立战争是大不列颠加到美国殖民地身上来的。我们现在从日本政府对你们国家的侵略上看到了一种更残酷、致命的对“自

由”的进攻。我们是特别关心着的。因为中国独立的破坏非但就是你们和你们国家的陷于奴隶地位，同时也就是更加增长日本的气焰，使它更向制造远东战争的路上迈进。你们的运动是合乎正义的，你们的斗争是合理的。我们抗议一切对你们的压迫，同时将贡献给你们：我们继续不断的援助。

签名：罗杰·却司——哥伦比亚大学“spectator”杂志编者

保罗·司吉奇——基督教青年大会主席

利卡纳——纽约华盛顿日报主笔

安·麦克莱杰——美国学联加利福尼亚大会执委会秘书

马丁·哈凡——北美基督教青年会议主席

嘉尼他·杰克逊——全国监理教青年委员会副主席

马拉加莱脱·依·康敏因——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大学新闻》主笔

埃得华·皮·司得汪——全国黑人大会青年部主席

威廉·加登——美国学联康纳克的充分会主席

盖尔皮欧脱·白菲尔特——哈佛大学《山岭杂志》主笔

罗卜脱·其·司毕凡克——辛辛纳的《山狮杂志》主笔

乔塞·卡登——全美学生联盟秘书

乔塞·裴·辣希——美国学生联合会秘书

吉姆司·威奇勒——纽约“Student Advocate”杂志主笔

吉姆司·罗纳——美国反战反法西斯大同盟
秘书

1938年，美国妇女发起了“不穿丝袜运动”。为了反对日本侵略暴行，抵制日本制造的人造丝袜进口，她们提出“买一双丝袜就是供给日本四排机关枪的子弹”的口号，使日本人造丝袜输入美国的数量比1937年同期减少一半，打击了日本的经济的发展。伐萨尔大学等150多所学校的学生集会，在燃放烟火时，全体女生把丝袜倒卷下来，表示抗议日本的侵略。

美国有1500个城镇掀起了有百万人参加的“一道菜运动”，节约的钱达100多万美元，都捐给中国受难的同胞。

伦敦的学生也在胸前挂着“勿买日本商品，阻止日本侵略暴行”的标语牌，举行游行示威活动。

基督教男女青年会积极抗日的行动使青年们抛弃了鄙视他们的态度，热烈欢迎他们参加抗日救亡运动。中国基督教男女青年会会员在艰难的抗日战争中，扩大了服务对象，争取了众多的朋友，提高了自己的工作能力，融入了中国青年运动的主流。

1950年周恩来总理说：“在抗日战争时期，基督教青年会等宗教团体也起了很好的作用。”^①

〔注释〕

①外国人称中国为支那，最先见于印度梵文中，是文物国的意思。或以为支那是秦字的转音，秦朝统一中国，声名远播，所以外国人称我国叫秦。

②《为上海事件告全国基督教同学书》宣言，详见附录

③《宗教界在抗日救亡运动中——纪念抗战胜利40周年》

④⑥⑦《消息》民国21年（1932年）12月20日

⑤《消息》第9卷第4期

⑧《消息》1932年10月20日

⑨《消息》第11卷第6期

⑩《消息》第12卷第2期

⑪刘良樵《统一战线和基督教》载上海市委统战部编的《统战工作史料选集》第4期

⑫胡庭钦、沈才明整理《周恩来同志1939年春金华之行》，载1985年1月25日《金华党史通讯》第1期

⑬据当时浙江大学学生公社负责人、青年会干事纽志芳回忆

⑭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干事陈维新提供资料

⑮《广州基督教青年会枫连线疏散救济记事》，载《广州文史资料选辑》第25辑第113页

⑯《沈阳（奉天）男女青年会概略》，载《沈阳文史资料选辑》第九辑。

⑰罗冠宗《论抗日救国斗争中的一些基督教人士的活动》，载《宗教研究通讯》增刊，上海市宗教学会编印（1985年9月）

第五章

内战，各趋一方

一、内战，三叉分流

由日本侵略者发动的长达14年的中日战争（1931年到1945年），给中华民族带来深重灾难的战争，使中国青年历尽艰辛和痛苦的战争，终于在1945年8月14日结束了，日本天皇在这天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日，日本政府正式签署了投降书。消息传出，举国上下沉浸在狂喜之中。人人喜气洋洋，互相奔走相告。青年们更是欣喜异常：他们集会游行，高唱爱国歌曲……尽情庆祝胜利，憧憬着胜利以后能尽情享受祖国的温暖，能过上和平、安宁和幸福的日子。然而蒋介石却磨刀霍霍，抢夺胜利果实，发动内战。美国的好战分子也露出狰狞的面目。于是，中华大地复又烽烟四起，内战大规模爆发，青年又堕入更深重的苦难之中。人民愤怒了，青年们发出了停止内战、要求和平的吼声，一场反内战、争和平的斗争在全国开展。基督教青年运动在内战中分裂为三

股。1947年9月25日《消息》刊登的《基督教学生运动与学生运动》，即杭州学生夏令会的讨论记录清楚地阐明了这种情形。

夏令会就基督教学生运动应否参加政治的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有的人认为应参加，理由是：政治的意义是管理众人的事，没有人能过脱离政治活动的生活，基督徒的目的是天国理想的实现，如果用政治的方法能够帮助达到这个目的，我们即应参加政治。政治并非是污秽的名词，基督徒参加政治所应注意的乃是不违背基督教精神。有的人认为不应参加政治，理由是：政治腐败的主要原因在于道德问题，惟有宗教才能负起改造人心的责任。以基督教的精神来管理众人的事，未始不是参加政治的意义。这种参加政治的方式就是将个人改革的心表现出来，造成一种基督教的潮流来推动政治而不必以整个基督教学生运动来参加政治。

争论的结论是：基督教所追求的仍是宇宙的永恒的真理，此永恒真理不但在宇宙中表现自己，表现为自然界的“规律”与“秩序”——“美”，表现于人类社会者为人类的“友爱”与“和谐”——“善”，惟其为“真”、为“善”、为“美”，故必有其永恒的价值，而为超时空的。

政治的表现需要有一定的“政制”与“组织”，此种政制和组织因历史（时）与地理（空）的影响，其所表现的形态各有不同。超时空的基督教也应是入时空的，否则基督将失却其真实性。因此，基督徒应参加政治，且以此永恒真理领导世界前进。然而，基督徒不应为“受时空限制的政制与组织”所限制，故基督教不应组成政治斗争的政党。

中国学生运动是中国学生对不合理的现状要求改革的一种表现，其目标与基督教学生运动的目标基本一致，因

此，两者的行动也应有密切的配合。

从他们的讨论中，我们可以看到内战使中国基督教男女青年会会员由一裂为三：大部分会员与时俱进。他们认为青年会决不是一个落在时代后面、脱离现实的组织，所以他们都正视现实，投入革命洪流；有一部分会员消极避世，或缩进圣经，或远走他乡；也有少数会员逆潮流而动，他们站在人民的对面，与腐朽势力在一起，走上必亡的道路。

二、与时俱进

反内战、争民主运动

中国基督教男女青年会的爱国者接受共产党提出的关于停止内战组织联合政府的建议，积极投入了反内战运动。

1945年11月25日，昆明西南联大、云南大学、中法大学、英专等6000多名师生举行反内战时事晚会，国民党派出大批特务进行扰乱，他们包围联大校园，用机关枪、小钢炮射击恫吓。第二天早晨，国民党中央社还玩弄“贼喊捉贼”的伎俩，胡说联大附近昨晚“发生匪警”，当地驻军赶往，“匪徒竟一面鸣枪，一面向黑暗中逃窜而散”。他们的污蔑激起师生的愤怒。26日，各校学生联合罢课，抗议当局的污蔑。28日，昆明大、中学生为反对内战及抗议美国武装干涉举行集会，发表告全国同胞书。29日，大、中学生举行示威大游行，遇到国民党宪警武装镇压，枪杀学生多人。12月1日，大批军警特务闯入西南联大等校，捣毁校具，劫掠财物，殴打师生，甚至投掷手榴弹，于再等烈士遇难。12月9日，成都2000多学生在华西坝集会，基督教青年会干事吴耀宗应邀

发表演讲，会后还与学生一起游行。

1946年6月19日，上海市学生团体为统一反内战运动，谋求工会、商会、妇女团体及文化团体的支持，联合举行了“学生争取和平联合会”的开幕典礼，估计有72所以上的学校参加了集会，其中许多是教会大学和教会中学，代表中有好多是学校基督教团契的会员。23日，吴耀宗还参加了由11人组成的和平代表团到南京请愿，呼吁和平，停止内战。他还为代表团起草了一份给马歇尔的英文《备忘录》，表示中国人民坚决反对美国支持蒋介石打内战。代表团一到南京下关车站就遭到国民党特务的包围殴打，许多人被打伤送进医院。周恩来和邓颖超同志闻讯连夜到医院看望代表团成员，还送了食物，慰问他们，并要求国民党当局严惩肇事者。第三天还在梅园新村中共办事处设宴招待代表团成员。回沪后，邓颖超同志还代表周恩来同志到吴耀宗家去慰问。

杭州的浙江大学团契也没袖手旁观。他们开始接受并讨论唯物论的内容，对共产主义的革命性、集体性和相对真理都有了较多的认识。当然基督教的和平性，个人价值及绝对真理，他们也没有放弃。他们是在认为社会主义的社会到终极与基督教所憧憬的天国是同一类型的前提下，在和平运动中唾弃了反苏的煽动，在民主运动中发挥了全团契的力量^①。

反美抗暴运动

抗战胜利后，美蒋勾结，发动内战。美帝国主义用一切经济力量支持蒋介石独裁、内战，而蒋介石政府也不惜出卖祖国的主权换取美国的支持，先后签订了许多公开或秘密的卖国条约和协定。例如1946年11月4日订的“中美友好通商

航海条约。”这条约名为“商约”，实际上将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领土、领海、领空、关税等权利统统出卖给美国。在中国对美国一切开放以后，又签订了“青岛海军基地秘密协定”、“中美双边协定”、“中美航空协定”等等，中国逐渐沦为美国的殖民地。驻华美军成了中国的太上皇，他们肆意欺压中国百姓。美国船只在海上，吉普车在陆上横冲直撞，撞翻舢板、撞倒行人扬长而去；美国士兵酗酒闹事，侮辱、奸淫中国妇女屡屡发生。据当时报纸的大致统计，从1945年8月到1947年7月的两年中，美国汽车撞死中国人达1000多人，撞伤的更不计其数。被美国兵强奸的妇女有300多人。中国人民对此感到非常愤怒。

1946年圣诞之夜，两个美国兵在北京东单广场强奸了北京大学选修班的女学生沈崇。消息传出，全国燃起了抗议美军暴行的熊熊大火。正如上海英文版《密勒氏评论周报》美国记者撰文中写的“北平的强奸案只不过是落进火药库的一根燃着的火柴而已。”27日，北京大学校园内贴满了揭露美军暴行的抗议书，北大学生发表了《告北平市同学书》，呼吁全市学生联合起来把美军赶出中国去！30日，北大、清华、燕京、辅仁等校学生罢课一天，举行示威游行。燕京的学生还号召全国学生举行联合抗议。不久，南京、杭州、天津、汉口、台北、重庆和昆明等地都相继掀起了抗议美军暴行的风暴，参加示威游行的人达数十万。除学生外，各阶层人民也都直接、间接投入斗争，各种抗议组织：“学生抗议美军驻华联合会”、“抗议美军暴行联合会”等也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全国各地许多基督教男女青年会的会员和团契的契友也被美国兵的兽行刺痛了民族自尊心，积极地参加罢课、游行示威活动，其中一些基督徒还向上帝祈祷，要求惩罚那可恶

的美国报。《消息》刊登的“我们的意见”一文清晰地反映了他们的观点。“我认为站在一个基督徒的立场来说，不但强奸这行为是违背我们的教义，其更甚者，就是我们绝不能容忍那种以强暴的手段为求达一己的欲望，漠视他人的人格与道德的尊严。在战争时，基督徒紧守岗位与联邦并肩作战，未稍懈怠，无非是因为反抗德、日以强暴施行其侵略的霸欲，虽事有大小之别，但道理却是同一，是以基督徒必须主张根绝这种罪恶”。“中国是礼义之邦，一向看重礼节义理，对于曾在抗战时期援助我国的美国联邦，更常以宾主之谊相待，从未忘掉患难中的这份友情，战争胜利后，至今已一年多，美军并无充分理由，继续在华驻兵，更值国内局面纷乱，内战四起，对驻华美军时有猜忌，啧有烦言，在所难免，然始终未敢轻举妄动，无奈美军当局漠视我国人民的舆论，不作退军之策，致使这些离乡背井，久沦在中国的士兵，精神不宁，竟不爱惜中美这份友谊，屡次殴打我国黄包车夫，更做出丧心病狂的事来，中国人难道还能容忍缄默么？”“学生是知识阶级的堡垒，是学术的追求者，文化的继承者，对于国家社会负有建设的责任，今士兵竟敢如此轻蔑侮辱学生，持着武器的居然强迫手无寸铁者，正象征着今日的世界，武力仍然占据着优势，破坏的力量仍然四面潜伏，世界的和平仍然受到莫大的威吓。虽然，看此次举国学生情绪的高涨，在他们统一意志里所发生的喊叫，足视文化的力量，正义的堡垒，还有它不可动摇的防线，世界的和平，尚留着无限的希望，当然这仍要看我们学生努力的程度如何！”②

这些意见明确地表达了他们反对美军暴行，争取民主和平的态度，表明了他们中有不少人同所有爱国者一样积极投入抗议美军暴行运动。

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

国民党统治区，由于美帝国主义加紧经济侵略及国民党疯狂进行内战，军费激增，财政入不敷出，通货恶性膨胀。1946年全年支出为8—10万亿元，但收入为2万亿元；1947年支出为100万亿元，而收入只有13万亿元。这样巨额的财政赤字主要靠印发钞票来弥补，抗战结束时法币的发行额约为5千亿元，到1947年4月陡增至16万亿元以上。正如当时舆论嘲笑说：在百业萧条中，中国唯一仍在全力开动的工业是印刷钞票。这导致物价飞涨，到1947年4月物价比抗战前上涨了6万倍，到年底又上涨到14.5万倍。100元钱在1937年能买2头牛而到1947年只能买1/3盒火柴；加之天灾降临，1946年灾区遍及19省，灾民达1亿人；1947年又有15省遭受水旱虫雹等灾害。国统区陷于严重的经济危机之中，饥饿威胁着广大人民，不仅工人、农民挨饿，甚至连大学教授、学生也吃不饱。据1946年的不完全统计，全国有1000多万人死于饥饿冻饿之中。

国民党政府于1947年2月颁发《经济紧急措施方案》，妄图用加重征收和冻结生活指数即加紧对广大群众搜刮来挽救蒋家王朝的经济危机，结果是四大家族中饱私囊，人民大众更趋贫困。人民忍无可忍，反饥饿、反内战运动席卷全国各地。正如1948年3月25日《消息》上刊登的文章“时与潮”中所说的：1947年的5月是上海以及中国学生运动的伟大的日子。整个暑假都是在波澜澎湃中。整个中国的学生，以及一般社会的人，无论态度是如何的不同，是同情、反对或不关心，都在这股潮浪的影响之下……当整个学校环境象一锅沸汤的时候，她是无法处在一种静止超然的状态中。面对这场

汹涌澎湃的运动，国民党政府出于其反动本性却愚蠢地采取了镇压的手段。5月18日，国民党政府公布《维持社会秩序临时办法》，限制请愿、罢课、罢工、游行示威。5月20日，南京、上海、苏州、杭州等地16个专科以上的学校，5000多学生，齐集南京（当时的国民党政府首都）举行反饥饿、反内战、挽救教育危机的示威游行，准备到正在召开国民参政会的国民大会堂，向国民党请愿。当队伍通过珠江路口时，国民党竟出动军警特务用水龙、大棒袭击手无寸铁的学生，当时打伤学生100多名，逮捕28名学生，制造了震惊全国的“五·二〇”惨案。这犹如以油灭火，使运动更趋高潮，连超世的宗教界也卷入其中，越来越多的教会大学参加游行示威、罢课运动。燕京大学32位教师于5月25日发表的宣言说：“最近反内战、反饥饿，要求教育改革是学生对目前所处的政治混乱不满和对恶劣局势忧虑的自然结果。”^③

中国基督教男女青年会爱国会员也以各种方式支持学生。例如1947年5月26日，上海交通大学学生在校园集会，准备游行时，市长吴国桢闻讯派警察包围了学校，并在校门口架起机枪，不许学生进出。吴耀宗接到交大学生打来请求支持的电话，就约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总干事涂羽卿、上海青年会总干事陆干臣和上海男女青年会学生干事罗冠宗、沈佩容等人一起前往交大，在学生代表迫使吴国桢作出保证释放被捕学生等条件后由吴耀宗、涂羽卿、陆干臣、罗冠宗等签名作证人^④。1947年2月吴耀宗还应浙江大学学生会的邀请到杭州演讲，鼓励学生。他的演讲词刊登在浙江大学的《求是周刊》上，摘录如下：

学生运动不是为了学生自己（鼓掌），而是为了国家社会（鼓掌）。这种学生运动在过去一年中是呼吁和

平、反对内战，抗议暴行，保障人权，引起了昆明“一二·一”惨案。现在这种运动在抢救教育危机的号召下，又掀起了正义凛然，波澜壮阔的运动。实在说，这运动不只在抢救教育危机，并且抢救国家危机。它，反对的不只是教育与学校本身的腐败，也反对暴虐政治、残酷内战，以及祸国殃民，丧权辱国的罪行，……有的人说，学生不应过问政治，学生的本分在念书。我们姑且假定这是对的，但现在愿意念书的学生能否念书都成问题。这次学潮的起因是他们肚子饿了，学校设备不足，教育行政的腐败与压迫。学生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安分守己，试问能否埋头专心读书？但说到学生不应该过问政治，这句话是错的……看到学生的正义呼声，我们感到惭愧，说老实话，恐怕也要喊出来了。（鼓掌）最后，不论目前局势如何沉闷黑暗，只要诸位能了解到我刚才的解释，大家就会明白这是一个转变的关头。穷则变，变则通。变不是变为黑暗而是变为光明，这也许是相当长期的变，但最后，光明终会到来。我们要坚持下去，奋斗下去，甚至不惜流血流汗，为它牺牲，最终能迎接这新时代的来临！（热烈鼓掌一分钟之久）

“反饥饿，反内战运动”在“五·二〇”惨案后波及全国，各地男女青年会会员中有不少人以个人名义参加了这场运动^⑤。

上海基督教男女青年会属下的职业青年团体：职友团、职青歌咏团、职光团随着社会上反蒋斗争形势的发展也唱起讽刺国民党的“古怪歌”及使青年向往解放区的“黄河大合唱”“生产大合唱”、“山那边也好地方”等歌曲。他们还练了一些节目：控诉当时社会的“活不起”，鼓励学生同反

动势力斗争的“真理女神与魔鬼”等，到交通大学演出，支援学生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

1946年9月，上海基督教青年会鉴于抗日战争胜利后，美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国民党反动派疯狂发动内战，滥发纸币进行掠夺，造成物价飞涨，民不聊生，社会上许多职业青年陷于苦闷中，创建工商经济研究会(简称“工商”)。该会成立后即积极开展各种形式的活动。针对当时层出不穷的社会经济问题，如物价、货币、生活指数、失业情况等等，每星期四晚上都在青年会举行座谈会。每当国民党上海市政府编制的“物价指数”公布后，“工商”就发动会员调查物价，自行编制“物价指数”举行座谈会，将他们调查编制的“物价指数”分析给会员听，揭露当局编制的“物价指数”不确实，故意压低了物价基数，与实际相距很远，将当局的欺骗手段曝光。当国民党政府借口稳定市场发行金元卷后，“工商”即举行座谈会，揭露了国民党政府发行金元券稳定市场是假，搜刮民间资金是实。他们还在《正言报》上编辑了三期《产业周刊》副刊，以学术探讨为题对国民党经济政策造成的恶果，加以揭露和评论。

“工商”还在八仙桥青年会举办两期经济讲座，每周一讲，共40讲，听众达1万多人次。他们还将每次讲稿整理后发表在《经济周报》上。以后又将它们汇编成《今日工商之路》的小册子公开出版，扩大宣传。不过，他们搞的众多活动中影响最大的是他们配合反内战举办的职业青年生活展览会。1947年底，他们将当时青年职工艰辛的工作，菲薄的待遇，困苦的生活，苦闷的思想，渺茫的前途，举办展览。结果，观众踊跃，引起了行业青年的广泛共鸣。闭幕后，他们总结经验，动员更多的会员及青年会其他职业团体成员就

米、粮、酱酒、医药、银钱、邮电等20几个行业职工的生活进行调查，将调查来的资料，选出典型绘成多幅图片，用形象化的图画展示出当时职业青年苦难的生活状况，造成困苦生活的症结及解决这些症结的出路，编印了《职业青年生活展览特辑》。陈大鹤和潘稚平还根据调查资料写了两篇关于当时各行业工资制度和生活状况的调查报告，举行了第二次展览会。可惜因青年会领导层对公开展出意见不一而改为内部展出。不过，就是内部展出也有1000多会员前来参观。以后又将此图片借给益友社等团体展出，效果均佳。

面对分崩离析的国民党和充满自信的共产党，基督徒也觉得中国没有第三条出路。《同工进修》刊2上，于1947年6月23日发表了《今日时局与青年会》一文，阐明了他们对时局的看法。今引文如下：

今日时局与青年会

目前的局势：目前的局势可以说是已经到了一个山穷水尽的地步。

报纸上，本埠新闻版和各地通讯栏中，每天都可以找到几条穷教师、公务员或失业者，不能维持生活，因而单独或者集体自杀的新闻。农村中，情形更惨。“抽丁”抓走了年青的劳动力，剩下来的“老弱残病”，又给“征实”压得眼看着就要断气。人祸之外，更加天灾，农民们过不了日子，卖田地，卖儿女，卖掉一切可能卖的东西，可是横在他们眼前的还是死！

没有人满意现状：公务员待遇低，教师薪水少，工人嫌工资够不上物价飞涨，老板却因不能维持而关门，学生吃不饱饭，农民完不了税！

每个人厌倦“今天”，渴望“明天”，希望明天能

带给他们和平和安定。

大局在变动；不被人满意的现状，终于是要被打破的。

米价涨，有人吃不起了，于是就有了抢米。与其饿死，不如走险。

吃不饱饭，当然念不进书，要求改善而不达，于是来了学潮。

物价飞涨，工资慢涨，过不了起码的生活，工潮于是爆发了。

推根穷底，生活艰难由于物价飞涨，物价飞涨由于通货膨胀，通货膨胀由于军费庞大，军费庞大由于要打内战。因此，“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今天都一致喊出了反对内战的呼声。

得民心者昌，失民心者亡。今日民心如何，还看不出么？

今天的内战正在走向“全民战争”。老百姓都活不下去的时候，也许会有新的陈涉，吴广出来吧！

可见，他们承认学生抗议活动的合法性和爱国性。

基督教青年会在一次全国协会上决定基督教学生组织作为一个组织不能卷入政治运动，但基督教学生运动的成员能以个人身份参加学生运动。以后，许多男女青年会爱国会员都积极投身于学生运动，甚至有时也以团体出面。如“五·三〇”惨案后（31日），女青年会就女学生韩格兰被捕之事发表声明，支持学生的正义行动。10月，浙江大学学生自治会主席于子三死在狱中，引起杭州、上海各校学生的强烈抗议，连在5月间受波动不大的圣约翰大学也罢课抗议了。上海基督教学生运动举行过几次座谈会，对此事视同情态

度。中国基督教男女青年会大部分会员都与学生一起向反动政府抗议，投入反迫害运动。

救饥救寒运动

满目疮痍，遍地饥民。尤其是1947年冬天，每天都有数不清的人冻饿而死。据一天上海报纸新闻栏报道，“经过一整天的大风雪，昨夜慈善机构在各处拣收了800具童尸……”于是，中国基督教男女青年会掀起救饥救寒运动，在全国各地开展，形式多样，成绩显著。

1947年12月18日，同济大学工学院基督教团契8名学生出于对难民冻饿而死的悲惨命运的同情，首先在校内发起募捐寒衣，救济灾民。他们在校张贴布告指出：“昨天本市冻尸已有100具。今天天更冷，不知又有多少人将在寒冷中死去，希望同学，本绪良心，予以捐助。凡有余衣者，不论大小、式样、种类，一概欢迎，可送到工学院阅览室。”布告贴出，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学生虽然清寒却热烈响应，纷纷将多余的衣服捐出，有的甚至将身上的棉衣脱下。当天就收到衣服500多件，袜子50多双，鞋30双。当晚就由8位学生顶着风雪严寒将衣服鞋袜分发给难民。衣少难民多，使他们感到要完全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发动社会力量。

12月21日，同济大学出动几百名学生组成50多个劝募小队分头出去劝募。为了引起社会各界人士的注意，学生都佩带着救饥救寒的标志，举着三角形的黄色队旗，散发“告社会人士书”，并专门编排了文艺宣传节目到大街小巷、茶楼酒店、车站码头演出，一时间到处都可听到他们的歌声。

“月儿弯弯照九州，几家呀欢乐几家愁，几家高楼饮美酒，几家呀流落在街头。”“北风呼呼雪花飘，苦难的人民没棉

袄，穿不暖来吃不饱，一个一个都冻倒。前晚冻死 200 个，昨晚又死 100 多，大家踊跃募寒衣，救救穷人把命活。”

……

学生的劝募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一天下来就募到大小衣服 2000 多件，新旧鞋子 500 多双，还有钱、棉被、毯子等。接着各校都起来响应同济大学的劝募寒衣运动。圣约翰、之江、东吴三所教会大学也成立了“联合劝募委员会”，国立音专学生举行民歌演奏，将全部收入捐助难民；大同大学发起了一人一物运动；华模中学在圣诞节上把互赠的圣诞礼物也义卖捐款，甚至连一向不参加学生运动，被称为“上帝的好女儿”的圣玛利亚女中的学生也投入到劝募热潮中。可见，劝募活动，声势浩大。

劝募寒衣运动温暖了许多难民，然而也刺痛了国民党当局。他们暗中阻挠，派特务上街将劝募寒衣的快报、标语撕掉，强令冬令救济工作须由官办的“冬令救济会”统一办理，任何团体在社会上进行募捐，都必须持有“冬令救济会”印刷的收据，否则一律不准进行劝募活动。不过，这难不倒学生。25日，美琪食品商店的老板捐赠特大蛋糕一盒，作为圣诞礼物，慰问为难胞奔走的学生。学生就此商讨出一石二鸟的好办法：将蛋糕义卖给市长吴国桢——他们组织了一支特别义卖队，两人抬着大蛋糕，9个学生各在胸前挂着一块大牌子，上书“欢迎吴市长义买蛋糕”，一路敲锣打鼓，高呼口号到市政府，要求市长出 500 万买下这只蛋糕，市长只好苦笑着出 200 万元买下这只蛋糕。

第二天《申报》、《新闻报》、《大公报》等几家报纸都在醒目的位置上报道了“市长吴国桢义买蛋糕”的消息。于是几天前的禁令也被市长义买蛋糕之举冲得烟消云散。

历时两周的救饥救寒运动，据大致统计，全市先后有80所学校、3万多名学生投入这次运动，共募得寒衣近20万件，现金10多万元，救济了约20余万贫苦人民。基督教男女青年会许多会员、会友都投入这一运动，有的人还起了骨干作用。

救饥救寒运动既教育了青年，解决了部分贫民的困难，还深深地影响了社会各界。不久，南京、苏州等地也掀起了这一运动。

除了救饥救寒活动以外，全国各地男女青年会还就内战时教育经费被大量削减，学生伙食水平不断下降等问题提出抗议。上海国立大专学校公费生每天的菜金，只够买两根油条，学生在饥饿线上挣扎，健康状况很差等情况开展多种多样的助学运动。

上海，国民党禁止学生联合会搞义卖助学章，基督教男女青年会合办的学生救济委员会就与防痨协会联合搞义卖防痨助学章，给学生活动提供了方便^⑥。武汉、杭州及内地青年会于抗战时建立在国立大学内的11处学生公社继续开展学生救济工作，并根据以往的经验，对座落在郊区的学校设立了学生公社。他们的助学工作形式多、效果佳。如夏天发放蚊帐、冬天发放寒衣给贫苦学生、还开办经济食堂、营养食堂等。学生公社的阅览室里还有“华商报”、“群众杂志”等进步书刊，使青年在国民党统治下得以了解解放区、解放战争局势及共产党的方针政策。

杭州基督教男女青年会开展的学生救济工作比较典型。杭州男女青年会的总干事联合当地大专院校负责人，社会人士联合组成“杭州学生救济会”。从1946年夏到1948年夏的两年中，杭州学生救济会开展了许多活动。（一）在杭州青

年会内开办学生平价食堂。饭菜的价钱只是普通学生食堂的1/4，厨房、饭厅由工作自助同学轮流管理。（二）给学生提供工作自助的机会。贫寒学生利用课余时间参加一些工作。如管理图书阅览室、文娱室、学济会司帐、抄写，编织毛衣裤、理发，办工人夜校，协助青年会搞社会调查及儿童福利工作，识字班等，按工时给报酬，解决其生活问题。工作自助不仅解决了学生生活上的困难，还锻炼了学生实际工作能力。这项一举两得的救济活动普遍受到人们的好评。正如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在学生平价食堂开幕仪式上说的：“公费制度，并不理想，理想中最好都有工作自助的机会”。（三）医药补助和供应营养豆浆救济患病学生。凡患病的学生，经济确实困难的，给予一定数额的补助费，对患肺结核（当时是绝症）的学生，除发给补助费外，还供给牛奶罐头。另外，对身体特差的学生每日供应一定数量的浓度较高的营养豆浆。（四）冬天提供棉衣棉被，夏天发放蚊帐供给贫寒学生。（五）开展义卖助学运动。1947年9月学济会为了增加大学生救济的预算，全国学生救济委员会要求各地学济会，在当地自筹预算的20%，于是他们就发起捐募运动，首先开动各种宣传工具，向社会各界宣传，同时动员学生做义卖品。如做助学章、窗贴，收集美术品等，并组织了六个大队。9月7日义卖开始的第二天，各队出发卖义卖品，经过四天努力基本卖完。这次助学运动成绩还不错。一星期的努力义卖总收入约为1亿多元。

北京男女青年会在各校搞花生浆站，组织义演为学生募捐……当“七·五”东北事件发生时，还举办歌舞音乐会，募捐来慰问一些受伤的同学。北京学生公社内的图书馆有许多进步书籍供青年阅览。他们还组织了纪念鲁迅逝世会，刘清

扬在会上揭露国民党打内战的丑事，光未然（写“黄河大合唱”的作者）朗诵了鲁迅的诗等等，会开得很不错①。

天津、沈阳、西安、开封、青岛、长沙、福州、南昌、贵阳、苏州、南京、广州等地男女青年会办的学生救济委员会都开展了学生救济活动，解决了部分学生的生活困难，培养了学生的劳动观念和自助精神，同时男女青年会会员也在工作过程中得到了锻炼，提高了能力。

三、叉开的支流

风云激荡，革命洪流将绝大多数基督教男女青年会会员卷入青运主流，但也有部分基督教男女青年会会员却如叉开的支流，或消极避世，或走向人民的反面。正如《中国基督徒面迎一九四八》这篇文章中所分析的，有许多因素使基督徒袖起了手。可是，有几个因素是最主要的。第一，许多基督徒对时局的本质发展规律把握不住，迷于时局表像上的惶惑，便莫衷何是起来。第二，许多基督徒竟以为，现在世界的矛盾是基督教势力和反基督教势力的对立，于是正上了帝国主义者利用基督教的当。第三，今日的斗争形势大不若以前的那样温和，致使软心基督徒们不“忍”面对现实。第四，今日的局面下，无论你说点什么总要得罪人的，不是得罪甲，就是得罪乙，根本没有了中立的余地。这四个因素便使今日中国基督徒大大地迷惘了。基督徒向来以“超然”自居。所谓超然就是无党无派、不偏不倚。然而，这在内战时绝不可能做到。学生运动对政治问题不能不有所主张，而政治问题又与党派之争有直接和间接的关系。如果其主张与某党派的主张相同，就会被另一方猜疑为这是受某党派指使

的，这就使许多基督徒怀着一种惧怕，即怕被牵入“政治漩涡”中。他们觉得政治是黑暗的，龌龊的。由于有这种担心，所以有些基督教男女青年会会员就陷入困惑、消极，甚至麻木的状态。虽然他们不乏正义感，也想有所表示，但面对动辄得咎的局面，他们宁可袖起手；尽管良心不安、苦闷徬徨，还是取了洁身自好、清静无为的途径，或逃避现实，或缩进书斋，或离开祖国，或消沉下去，安于物质享受，甚至有的在糜烂的生活中消磨岁月。正如《消息》1948年3月25日登载的文章《也论基督教学运不是甚么》中“单凭三寸不烂之舌”一段所说的：

另一种倒是专谈基督教学学生运动，口口声声不离基督耶稣，常讨论基督教学学生运动的路线，不过止于常常讨论而已，从不干什么……

更有一部分基督教男女青年会会员跳入污水中，与腐朽势力同流合污。

[注释]

- ① 海磐《从社会变迁看浙大困契》，载《消息》
- ② 详见附录一
- ③ 1947年5月26日《大公报》
- ④ 上海政协编《统战工作史料选辑》第4辑
- ⑤ 《中国基督教学学生运动的回顾与前瞻》
- ⑥ 上海市政协秘书长罗冠宗回忆
- ⑦ 北京市基督教女青年会总干事陈文润回忆

第六章

斩断羁绊， 自治、自养、自传

一、自焚中新生：三自爱国运动

三年解放战争，人民解放军势如破竹，锐不可挡，一举将国民党政府赶到台湾。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这是一个完全不同于旧中国的新中国。随着社会政治基础的转变，中国的经济、文化等各方面也发生变化。

时代的突变震荡着社会各界，中国基督教男女青年会也在震波中激荡。建国初期，革命的热潮使许多会员离开了男女青年会，参加了革命工作，更多的会员因不了解新政府对宗教的态度而终日惶惶不安，甚至因怕别人批评迷信落后而不敢参加活动者也不乏其人，加上一些反动青年在男女青年会中进行反动宣传，致使迷惘者更迷惘，胆小者更惧怕。这是基督教男女青年会内部的变化。

由于基督教男女青年会与美帝国主义的瓜葛，由于其信仰与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相左等原因，使当时部分共产党员、

共青团员及革命群众对其产生歧视的态度，认为它是迷信、唯心的，甚至有些地方还有过激的行动，使基督教男女青年会的会员感到有压力，少数地方还受到冲击。这是外界引起的变化。

内外变化使各地青年会开展活动相当困难，许多男女青年会会员处于痛苦、徬徨之中，于是，有的放弃了原有的基督教信仰，有的趋向所谓“属灵的”生活，逃避现实问题；有的沉溺于个人享乐的生活，对于马列主义和现实问题不闻不问、不感兴趣；但是，更多的会员正视现实，面对感觉到的宗教信仰与新思想的矛盾，积极地思索，探寻……

正当此时，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召开，其三大文献受到基督教徒及全国人民的拥护，他们在学习、思考，尤其是对教会历史的反思中，有些人开始认识到：历史上没有真空里的基督教，即基督教虽然有它一定的内容，但是在历史上它必须通过和各时代、各民族的文化相结合的形式表现出来。在最初几个世纪，它是和希腊、罗马的古典文化相结合的。中世纪，它和封建文化发生了不可分离的关系，故中世纪文化，有时被称为基督教文化。从文艺复兴到现在，基督教又是以和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相结合的形式表现的。基督教传到中国的时候，它的形式就是现代资本主义的形式。百余年来，教会信众习以为常，常误认为这种形式就是其信仰不可分离的一个部分，丢掉了这种传统的形式无异于背弃信仰。换言之，他们认为西方资本主义文化乃是基督教永久不变的固定形式，实际上是毫无历史根据的。许多人认为今天的中国基督教能够、也必须和新民主主义文化相结合，以“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形式出现”，同时他们坚信基督教信仰的基本内容通过这种新的形式而相得益彰。

1950年初，吴耀宗、邓裕志、刘良模等人组织了一个全国访问团到浙江杭州、江苏徐州、山东济南、山西太原、陕西西安等地，一则传达政协会议精神，宣传新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二则了解各地基督教的情况。当看到各地基督教会、青年会活动有一定的困难，他们就会同卫理公会的江长川会督、中华基督教会的崔宪祥等各教会的上层人士于1950年5月到北京找周恩来总理，希望政府能发一个保护教会的指示到全国各地，以帮助解决教会的困难。

周恩来总理尽管开国初期工作相当繁忙，还是抽了三个晚上的时间与他们长谈。周恩来总理先静听了他们各人提出的有关教会的困难和要求，然后很坦率地对他们说，中国基督教现在之所以遇到这些困难，是因为它过去曾经被帝国主义利用，所以基督教和人民群众之间存在着一条鸿沟。现在，中国人民已经站起来了，中国基督教为什么不能也站起来，办自己的教会呢？……要是中国基督徒能办理自己的教会，那么，中国人民与基督徒之间的鸿沟也就不存在了。总理还向他们说明中国共产党是非常关心基督教的。周总理中肯的谈话不仅使他们心口俱服，也使他们开窍。在座的崔宪祥听了，当时就说：“对啊！好久以前，我们基督徒中间曾经主张由我们中国基督徒办自治、自养、自传的教会”。吴耀宗也在其日记中写道：“周总理态度非常公允，双方兼顾，令人佩服。我们在和周总理的谈话中得到一个启发，这个启发就是基督教应当自动地肃清帝国主义在它里面的力量和影响”。

他们告别周恩来总理以后，就发起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首先由吴耀宗起草三自宣言《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宣言明确指出：过去一百多年来，基

基督教同帝国主义的对华侵略发生了关系，号召全中国基督徒拥护共同纲领，在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为建设一个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还提出要使教会群众认识帝国主义在中国所造成的罪恶，认识过去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的事实，培养教徒的爱国民主精神和自尊自信的心理，在最短期内完成自治、自养、自传的任务。7月28日，以吴耀宗为首的全国各地基督教各教派、各团体的负责人共40人向全国基督徒发出一份公开信，号召赞成“三自”的教徒签名，并在全国基督徒中广泛征求签名。经过一个月，到8月底，签名者就达1527人。《人民日报》于1950年9月23日全文发表了这个宣言，并把第一批1527个签名拥护者的名字和单位都刊登出来，还专门发表了题为“基督教界人士的爱国运动”的社论^①表示支持。此后，各地基督教工作人员和教徒都热烈响应三自爱国运动。到1954年7月，签名的人已达41万多名，约占当时全国基督徒总人数的2/3以上。

中国基督教男女青年会的会员也与基督教各团体成员一样，积极投入三自爱国运动。他们认真研究基督教、并进行反思后认识到基督教的一些问题，首先是：基督教是依附在西方国家差会上，所以尽管传到中国已一千多年，但并没有被中国人接受，这从一般人都称基督教为洋教，可见其未在中国扎根。其次，俗话说：拿别人的手短，吃别人的嘴软。既然基督教接受西方国家差会的津贴就难免在人事、行政上要受差会的控制。第三，由于经济和领导人来自西方不同的差会，所以，西方教会的宗派传统也带到中国，造成中国教会宗派林立、互相攻击。第四，中国教会因长期依赖西方，故自立能力较差，尤其是中国人才的培养和训练就被忽视，

以致造成人才短缺。第五，因教会的经济来自国外，不仰仗中国信徒，所以教会对中国人民的需要就可以漠不关心，造成教会与现实脱节，和广大人民脱节。他们也认识到要改变以上状况，培养一个自治、自养、自传的中国教会是教会能在中国生存的必要条件，并且也是能做到的。基督教源于犹太（即今以色列国和巴勒斯坦的地区），本来与英美帝国主义文化无关，由于他们以英美不平等条约为掩护，传到中国的基督教本身已不是纯福音，所以我们完全有必要对此反思，也完全可以创立一个合乎民族的、大众的、不违背科学的神学系统。

收获最大的是，他们通过学习认识到60多年来，英美帝国主义一直利用中国基督教青年会作为文化侵略的工具。其实，早在1910年美国总统塔夫脱在白宫召开的特别会议上的讲话就说得非常露骨。他说：“一个先进的国家，总是要做生意的。无论那一个国家，只要有利可图，我们就要派商人到那儿去。我们做生意的原则是：最有利可图的交易，就是，我们可以用最低的价格买得我们所要买的东西，然后又用最高的价格在世界市场上卖出去。换一句话说，我们从落后国家的人民的手中无偿地得到东西，等于我们和落后国家的人民玩了一个Bunco游戏（按：“苹果”，外国赌场中的“轮盘赌”即骗人的游戏）。因此，我们在许多东方的国家中，很不受任何具有是非感的人民的欢迎。当我们和这些国家做生意的时候，我们的商业道德比在本国的商业道德更加低劣。因此，我们一方面要发展贸易，另一方面也要负起一个更大的责任，那就是派遣一些宗教团体到那些国家去，宣传我们所代表的道德和文明，帮助那些国家的人看清楚我们也具有高尚的道德标准。通过我们的国务院，我们对其他所

有国家在道德和其他方面的改进表示同情和关怀。不过国务院在这方面所能做到的事受到了限制，而且受到了严格的限制。但是象基督教青年会这一类的活动，就不存在这样的限制。没有人会想到，我们到中国去设立基督教青年会是抱着任何侵略领土或干涉国家内政的野心的，但是，基督教青年会的会员能够在他们本国的政府中取得重要的地位。我已经看到在中国和其他国家中，凡受过外国教育或其他因素影响的人，很容易接受我们的文明和道德标准”^②。这段话不打自招地说明了美国企图通过青年会的工作散播美国文化和培养一批为其服务的奴才，麻痹中国人民的思想，掩盖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面目。另外从抗战胜利到新中国成立，北美协会在中国青年会方面做的三种布置也可以看其用心。

抗战胜利前后，北美协会发起了一个“世界青年基金运动”，目标是800万美元，其中200万美元准备分配给中国，企图配合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活动。因此，抗战胜利后，不少城市青年会所重建，许多美国年轻的干事来到中国。青年会全国协会大办训练班，培养更多的年轻中国干事。1948年冬，蒋介石政府在其发动的内战中节节败退、即将全面崩溃之时，北美协会又作了第二种布置：所谓应变措施。它通过青年会全国协会从中国青年基金中拨出8万美元去发展台湾青年会。1948年12月16日，二位中、外干事联名致函美国青年会麦克伦，提出发展台北青年会的详细计划中说：“无论从心理上或战略观点上看来，现在是中国青年运动应该最大量、最具体地发展台北青年会的时候了。自从战争爆发以来（指解放战争），成千上万的中国人迁往台湾（指蒋帮分子逃往台湾），许多中国青年会的领袖也都迁往台湾……中国北方城市中的青年会工作已受到“限制”（指解放了的

北方城市)，但是台湾将是我们重要和永久的机会。台北青年会将有效地补偿我们在中国大陆上的损失”。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基督教青年会表示与帝国主义割断关系，北美协会采取第三种布置，1949年北美协会负责人亲自到香港，约中国青年会全国协会总干事等前往会晤，制定了一个《中国基督教青年会三年经济与工作计划》，简称“三年计划”。由北美协会一次拨出大笔津贴维持三年。

“三年计划”说明书上说：“我们的政策是要在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城市中建立强有力的青年会，使这些青年会成为我们光辉工作的榜样”，“所谓战略据点的确定，首先要根据地理上的重要性”，因此，它把中国的青年会根据地理上的重要性分为5等。如第一等是最重要的，计有广州、汉口、上海、北京、天津、沈阳、重庆、香港八个市会，即大致都是各大行政区的中心点。第二等的有杭州、南京、青岛、厦门、长沙、南昌六个市会，都是各省省会和沿海重要城市。……他们还企图促使全国协会同意把香港青年会作为中国青年会训练人才的基地，想在香港训练一批骨干，然后输送到新中国的青年会去进行活动，并将从中国撤退的美国干事安置在中国大陆附近的香港、台北、汉城、东京等地，以准备一旦有机会就可卷土重来^③。

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曾对各国基督教女青年会提出三种策略，大致意思是“……通过不同国家、不同政治情况和不同思想，发展各国人民的感情和个人关系”，“了解不同政治制度、不同哲学基础的国家里一切社会经济发展的情况”、“不论外界宣传的压力多么大，都应该保持思想判断的自由。”^④可见它并不否认政治因素。

尽管美国总统塔夫脱、美国国务卿杜勒斯的讲话，与三种

布置将帝国主义利用青年会进行文化侵略的用心泄露无遗，但是当时还有许多人对此认识不到。正如列宁所说的：“一是刽子手的职能、一是牧师的职能。使用武力和炮舰的一手是容易觉察的，也容易激起我们的愤怒和反抗。但是，使用“仁爱”、“友好”、“慈善”的一手，则是隐蔽和毒辣的，很容易被它欺骗和麻醉。”如世界学联所标榜的“普世教会”、“普世团契”与“教会合一运动”在当时曾迷惑了许多基督教男女青年会会员。所谓普世教会，是在超国家、超种族和超阶级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共同信仰的集团”，即凡是信奉基督的，不分国家、种族和阶级都是一体。信奉上帝的人，第一是忠诚于上帝，国家民族的利益都要从属于它。实质上，它并不超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学盟特设了一个“政治委员会”，提倡从“基督立场”来对待各种现实的政治问题，诬蔑共产主义为“极权主义”，把共产主义作为“挑战”和“威胁”来讨论，岂不是将基督教作为反共的武器了吗？

美国之所以“慷慨解囊”在中国建立“学生公社”、“学生服务处”，其目的之一是通过学生救济扩大美国的影响。如美国新闻处对各个“学生公社”、“学生服务处”大加利用，经常提供宣传美国的画报、图片和幻灯。

1950年就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青年会在全国展开了广泛的控诉运动，揭露了许多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青年会进行侵略的事实。

当主张正义、明辨是非的基督教徒认识到这一切后，他们就坚决地与帝国主义割断了联系。几乎全国各个男女青年会都投入了三自革新运动，基督教男女青年会的会员也纷纷在宣言上签名。这表明他们已有了明确的态度：坚决反对帝

国主义（不包括英、美及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中热爱和平的人民），坚决揭露任何利用宗教机构作掩护，从事反动活动的阴谋，但欢迎那些完全舍己为了上帝来中国传福音的西方传教士，中国教会应自治、自养、自传，脱离一切不必要的帝国主义的纠缠。

中国基督教男女青年会在三自爱国运动中脱胎换骨，在自焚中获得新生。它们摆脱了帝国主义的桎梏，转变为独立自主的教会团体。

二、生机盎然的50年代

新生后的中国基督教男女青年会生气勃勃、蒸蒸日上。

首先，中国基督教男女青年会组织在新生后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据市会部统计，到1953年底，全国已有城市青年会26个，其中华北区有北京、天津、太原三个市会；华东区有上海、南京、杭州、苏州、济南、青岛、福州、厦门8个市会，中南区有汉口、武昌、长沙、广州、南昌、开封、台山、汕头8个市会；西北区有西安、兰州、宝鸡3个市会；西南区有重庆、成都、昆明、贵阳4个市会。女青年会全国已有14个（不包括香港、台北的2个）。全国青年会（包括全国协会）有干事、职员、工友375人，服务的群众达20万人以上。

其次，中国基督教男女青年会在五十年代开展了许多有益的活动，对中国青年运动作出了贡献。

新中国刚诞生，很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基督教男女青年会的干事就利用参加世界和平会议的机会，介绍新中国的情况、新中国的方针政策，尤其是宗教政策，团结国际

友人共同为反对侵略、保卫世界和平而斗争。象吴耀宗先生于1949年到1959年，先后出席了15次世界和平会议，在会议上积极宣传新中国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与维护世界和平的决心，团结国际友人，为壮大世界和平力量做了许多工作，被选为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

中国基督教男女青年会还积极参加了保卫世界和平运动。他们热烈响应历届世界和平理事会所作的关于争取世界和平的号召、关于以协商方式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号召、关于制止侵略战争、禁止大规模毁灭人类的原子武器和细菌武器的号召等各项号召和决议。例如1950年各地男女青年会市会和教会一起热烈响应斯德哥尔摩的和平宣言，并广泛推动了和平签名运动，同时还致电向基督教青年会世界协会建议，将在丹麦举行的世界青年会执委响应斯德哥尔摩和平宣言。虽然这个建议未被采纳，但向国际表示了中国基督教青年会争取世界持久和平的愿望。

1951年4月，在抗美援朝的伟大运动中，政务院宗教事务处在北京召开“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基督团体会议”，成立了中国基督教抗美援朝三自革新运动委员会筹备委员会，作为全国基督教的领导机构。中国基督教男女青年会在其领导下积极投入了抗美援朝运动，他们捐献飞机、大炮支援中国人民志愿军。1951年全国各地市会均热烈地推动及参加宗教界、特别是基督教的反对美国重新武装日本运动。同年2月底，中华基督教全国协会事工组向各市会发出通知，号召各地市会积极推动这一工作。此后，各地市会均举行控诉会、示威大游行、制定爱国公约等，上海市会和全国协会干职人员全部参加3月21日上海宗教界举行的“反对美国武装日本”示威大游行，涂羽卿总干事还担任示威游行大会主席之

一。大会通过了爱国公约及向毛泽东主席等中央首长的致敬电文。汉口市会2月22日举行大游行，青年会剧社还为慰劳朝鲜人民军及救济朝鲜难民进行义演，宝鸡市会2月3日组织了8000多人大游行，通过了宣言和爱国公约。广州市会2月26日发动全市教会举行“反美武日控日暴”座谈会。太原市会发动了9000多人的大游行，厦门市会3月1日举行5000多人大游行，苏州市会3月7日召开大会并游行，南昌市会于3月11日举行“保卫和平、反侵略”为主题的祈祷会，同时筹得慰劳中朝部队的捐款300多元。济南市会3月18日发动了15万多人举行大游行，西安等市会也召开了大会^⑥。1953年基督教青年会干事和教会负责人还参加了第二、三届赴朝慰问团到朝鲜慰问志愿军。

50年代，中国基督教男女青年会宗教工作也开展得很好。上海、南昌、苏州、汕头、武汉等市会经常举办青年崇拜。南昌的青年礼拜每年按时举办，平均每次都有60多人参加。上海的青年礼拜采取系统讲道方式，每主日下午邀请各堂牧师证道，这对青年同道在探索圣经真理方面帮助较大。光1956年就有2815人参加^⑦。南京、福州、广州、苏州、汉口、厦门、重庆、杭州、上海、汕头等市会还与教会联合举办圣诞节和复活节的音乐崇拜。1953年全国有13个市会举行圣诞音乐崇拜，参加者达10600多人。仅上海市会，就有基督教青年会300多人组成一个圣乐团，连续举行了三次音乐崇拜，合唱了圣曲“弥赛亚”，并有崇拜证道，总计听众有4500多人。1955年1月，他们又借国际礼拜堂举行了三次上海市基督教青年冬令会，有代表30多所教堂的365人参加，内容有开幕崇拜、培灵、查经、闭幕礼拜和小组座谈会。青工团契还出版了《恩言》刊物。该刊物受到全国各地青年同

道的欢迎。8月1日至5日，他们又和女青年会全国协会、女青年会市会联合举办了夏令会，有来自48堂会的500多位弟兄姐妹参加，内容除冬令会上的几项外，还安排了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讲座”、“问题解答”及圣诗、圣画、圣剧的介绍。青年们通过夏令会觉得在灵性上、思想上与对三自爱国运动的认识上都有了长进。圣诞节前夕，12月17日至23日，还借慕尔堂（今改名为“牧恩堂”）举行4次圣诞音乐崇拜，每次由各教会牧长及同工分别担任主席、祈祷、读经、讲道与祝福。参加会众人数达4000余人。广州市会经常主办音乐会，由合唱团、口琴队等参加表演，最多时每月有3次，听众达900多人。南京青年会每周一次为基督教青年举办唱片音乐会，讲解音乐家的生平、活动，介绍作品的思想性与艺术性，提高青年的欣赏水平。其他市会也同样举办音乐演奏会，内容有古典音乐、圣乐、世界名曲、各国民歌及新时代歌曲等；形式有大合唱、小组唱、独唱、男女对唱、手风琴独奏、合奏等；也举办查经班和圣经研究班……。这些活动大多是在教会协作下开展的。据统计，1955年有22个市会与当地的各教会和女青年会联合举办了圣诞节和复活节的音乐崇拜和联欢会等。有8个城市举行了夏令会、春令会和冬令会，有些市会也单独举办青年崇拜、查经班、圣乐团、宗教座谈会等经常性宗教活动。这些工作不但对基督教青年在灵性上、思想上有神益，而且对三自爱国运动的发展有帮助，即各地男女青年会都在当地三自爱国运动中起着积极推动的作用。

基督教男女青年会的教育工作也很有吸引力。他们的教育工作主要有两类。一类是普通教育；举办讲座、美术班、图片展览、墙报、图书阅览等。另一类是举办补习学校和文

化补习班。

讲座是一种社会教育的好方法。如北京市会办的青年讲座包括青年婚姻和家庭问题、品德修养问题等；科学讲座内容有科学知识、健康卫生常识等。苏州市会办的科技讲座、南昌市会办的时代讲座、福州市会办的理化知识讲座等都受到青年的欢迎。

图书馆的教育作用也不错。1956年仅上海青年会的图书馆就发出个人借书证1537张，小组借书证256张，大组图书流通站借书证2张，馆内阅览证600张，合计读者3758人，全年到馆人数175674人次，借出图书52555册次。

广州市会举办的宣传总路线的图片展览，贵阳市会积极推动街道爱国卫生运动的工作，昆明市会设立普选站进行宣传的活动，长沙市会利用国庆节及其他节日对会员进行的一系列形象化的教育，特别是北京青年会的电影放映队，在1953年短短9个月中服务了180万人次，进行了很有效的爱国主义教育。上海市会办的3个月为一期的青年美术班绘画科，仅1956年就办了3期，培训了15514人次；以教美术字和复制漫画为主的2个月为一期的美术科办了两期，培训了14229人次。南京市会通过文艺作品的阅读和讨论，如方志敏作的《可爱的中国》等作品，启发了青年热爱祖国的感情。

另一类教育工作是举办补习学校和文化补习班。全国26个市会中有14个市会开办了补习学校和文化补习班，参加者达8129人。基督教男女青年会为了适应各地区的社会需要，在当地文教局的支持和领导下开办各类补习学校。如西北地区的西安和兰州两个市会举办了会计补习学校，以配合当地建设的具体需要。杭州、青岛、重庆等青年会为了协助解决

当时小学毕业升学的困难，开办、改办或增设补习班，课程相当于正规中学。各地女青年会举办妇女识字班、缝纫、会计、打字学习班、托儿所等。1956年中国基督教男女青年会积极配合当时国家的中心工作即扫盲工作，根据自身条件，为社会青年中的文盲、半文盲，特别是街道青年、家庭妇女、劳动妇女、摊贩、三轮车工人以及基督教中的文盲等广泛开展扫盲工作。

50年代，体育工作也在全国各地男女青年会中广泛开展。上海、广州、福州、天津、苏州、北京等处有较好的体育设备，如健身房、游泳池等。他们为了培养青年强壮的体格和充沛的精力，开展了各种体育活动。据统计，1954年7月至10月，经常参加篮球、排球、羽毛球、技巧、柔道、健力、拳击、举重、游泳等班级共有83665人次。1953年7月，青年会举办的排球联赛，参加比赛的球队有80个。同年，为迎接全市性及全国性的羽毛球比赛（参加者有129人），参加训练的群众先后达2500多人。上海青年会体育工作开展得较好。1956年游泳训练班、夏季游泳班在七、八两月内，初级班办了63期，补习班办了6班，中级班办了3班，共计训练了2699人次。温水游泳班全年办了10期共140班补习班、12班重点训练班，总计人数4745人。此外，还举办了篮球、羽毛球、技巧、柔道、摔跤、拳击、健力、举重、太极拳等单项运动训练班6期。总会79班、1704人；分会95班，1252人，共计2956人。还有各种项目的比赛节目、体育表演等。据统计，全年参加经常性体育工作的有90559人次，临时性的有38195人次，合计128754人次。

即使是设备较差的青年会也想方设法逐渐开展体育活动。如杭州市会当时没有专门训练的体育干事，室外场所也

不完整，但他们并不气馁、消极等待，而是采取积极的态度。一方面积极地和杭州体育工作的各方面取得联系，争取他们的支持；同时尽可能地发掘潜在力量，精简节约地利用和充实原有设备，建立管理制度；另一方面，他们努力克服困难，开展一定的体育工作，以工作实绩来取信于领导和各界人士，从而得到他们的重视和支持。他们认真研究了当地需要，决定以居民和教会青年为体育工作的对象，先开展健身班等活动，然后逐步扩展。1953年下半年，他们试办了有13个队参加的居民篮球联赛，观众达7000多人。这次比赛为他们体育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同时也完成了省体育运动委员会交给他们的任务，选拨杭州市庆祝国庆球类表演的居民篮球代表队，接着他们又举办了网球、羽毛球示范表演赛等。连着几项活动扩大了杭州青年会体育工作在社会上的影响，打开了局面。至1958年，他们共举办过五届居民篮球联赛，每届比赛都有十多个队参加，热闹非凡。他们还创办少体班（1954年至1957年改名东风少体校）设有游泳、乒乓、体操、羽毛球、棋类等项目，培养了许多优秀运动员。1958年实行公社化后，青年会的群体活动由市体委接收办理。

文娱活动是最受青年人喜爱的项目。50年代，中国正在进行有计划的经济建设。青年们在工作之余，非常希望能得到适当的休息和文娱活动。各地男女青年会为了满足青年人的愿望，举办了各种各样的文娱活动。有音乐舞蹈会，如合唱团、歌咏班、唱片欣赏会、音乐晚会、器乐组织、歌舞演奏会、各种舞蹈学习班等；有戏剧，如京剧社、评剧社、话剧社及各种戏剧表演晚会；有室内游戏活动，如各种节日庆祝、联欢晚会、游园会、周末晚会等；还有旅行活动，如名胜游览、节日郊游、长短旅行等。其中最受青年人欢迎的是

文艺晚会。天津市青年会搞得很出色。他们根据不同的对象分别举行。1953年，他们为基督教青年组织了一个音乐晚会，请天津市音乐工作者和歌唱团参加表演，除了音乐节目外还进行舞蹈、乒乓及棋类活动，到会的青年达1000多人。他们为工商青年举办了迎接新年联欢晚会，参加者的情绪也很热烈。上海青年会文娱工作也开展得很活跃。就1956年看，他们有新音乐合唱团、青音合唱团和中青合唱团，每星期各练唱一次，并经常应邀到各基层群众中演出，全年共演出42次，总计观众达17000多人。同时，他们还在总会办了两个月一期的大家唱班，共办了5期，参加者有857人。1956年10月，为了纪念聂耳、冼星海，他们还举办了两次音乐会，听众约有3000多人。上海青年会还将总会文娱厅和交谊厅内的各种文娱设备供给学生、青年活动，全年参加者计有20592人次。他们还为社会青年举办了16个舞蹈班和1个舞蹈训练班，参加的学员有1078人，全年到席人数为5894人次，还将其中的优秀者组成舞蹈队，加以基本训练后，就协助外界约31个机关、学校、团体的表演进行辅导，一年时间约有1000多群众在他们的辅导下学会了舞蹈。舞蹈队还应邀到各基层演出，全年共演出29场，观众达14000余人。他们还为社会青年举办了10个歌唱班，参加者4556人；举办了11次节日联欢晚会，参加人数达16760人次；组织旅行96次，其中短途旅行如到无锡、苏州、海宁观潮、昆山、嘉兴、七宝、青浦等地计77次2608人，长途旅行如莫干山、庐山、镇江、扬州、黄山、北京等地计19次457人，全年共计3065人。12月还举办“旅行参加人联欢会”及旅行活动与风景照片展览会，参加及参观者达4641人。他们还举办了大象棋表演赛60次，观众达16153人次……全年参加各类文娱活

动的总计有165535人次。

杭州青年会节日文娱活动开展得很不错。1955年元旦和春节先后组织了许多为青年所喜爱的文娱体育活动，不但使4000多青年欢度了节日，而且还结合当时的中心任务向参加者进行了一次宣传教育。元旦前夕，他们举行了唱片音乐欣赏会，以介绍民歌和艺术歌为主题，选播了一些俄罗斯、意大利、中国及黑人等民歌，并介绍这些民歌的特点，其中黑人民歌“深深的河”、“流浪”给与会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元旦下午举行了体育表演，内容很丰富，有举重、双杠、垫上运动及民族形式体育运动等精彩节目。元旦晚上，杭州青年会与女青年会联合举办的文艺晚会相当成功。那天晚上尽管外面下着大雨，但参加者仍达400——500人，把四楼礼堂挤得满满的。晚会文艺节目有管弦乐、大合唱、独唱、舞蹈、口琴、国乐及越剧等，均短小精悍，其中海陆空舞蹈、独唱“翻身道情”、口琴独奏等节目特别受到观众们的欢迎。春节活动内容更加丰富，除了上述节目外，还搞了两次规模较大的游园会。游园会大门口装了一排“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的霓虹灯，晚上非常醒目。在进大楼的门口和通道上布置着一幅幅有关社会主义建设等内容的立体画景、标语和漫画，游园会内有时事常识测验的思想室；有动物、植物、矿石等物的小小博物馆；有魔术室、记忆室、障碍赛跑等竞赛游戏，更有受观众欢迎的小小电影院，每隔半小时放映一场苏联彩色动画片。参加活动的各界青年达170⁰多人。

南昌青年会也同样，举办的春节文娱活动有乒乓表演赛、文艺晚会、图片展览会、专题报告会、唱片音乐欣赏会、象棋表演赛等，内容丰富。

西安青年会在开展文娱活动时注意扩大服务面。他们在春节举办的灯谜晚会上，除了邀请基督教青年、社会青年外，还邀请了平时与青年会有来往的朋友们，包括部分佛教徒、道教徒和天主教徒，约有200多人在张灯结彩，四壁悬挂灯谜，到处陈列着各种文娱用品——扑克、乒乓、象棋和康乐球的大礼堂里愉快地度过了春节，并增进了彼此间的友谊。

中国基督教男女青年会在50年代能如此生机盎然是与中国共产党与政府对其关怀分不开的。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的领导人认识到宗教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历史现象，它的消亡需要一个相当漫长的历史过程。在社会主义时期，由于还不能完全消除宗教得以存在的根源，宗教在我国还将长期存在。所以，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和政府就把正确处理宗教问题列为社会主义统一战线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将尊重和保护宗教信仰自由定为中国共产党对宗教问题的一项长期的、基本的政策，同时广泛地、多次重复地宣传这项政策，使全体教徒和不信教的人们联合起来，结成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当社会上某些同志对基督教青年产生错误的看法，及基督教青年对爱国爱教问题存在一些问题和想法时，全国青年联合总会和政府有关部门都非常注意和关心，及时地就具体问题发文和发表讲话予以解决。如1952年12月29日全国青年联合总会及政府有关部门了解到基督教男女青年会当时因经费困难，社会事业停办及交政府接办，活动收缩、男女青年会干事、职工因没事做而不安心，感到青年会没有前途的情况以及急待解决的经费短缺、会所被占等问题，即批示全国各地，请各地按具体情况予以解决。

又如，当时社会上有些人歧视基督教青年，使基督教青

年产生思想问题。在北京市基督教青年座谈会上，参加座谈会的青年一致说：现在社会上和学校里仍有一种旧眼光，认为基督教青年“落后”，我们是不是落后呢？难道我们不要求进步和热爱自己的祖国吗？北京师范学院童耀光说：“解放几年来，我们基督教青年经过祖国多次政治运动和宗教界的三自爱国运动，许多青年逐步洗清了“崇美”、“恐美”的思想，认识了帝国主义过去利用宗教来侵略祖国的阴谋，并从基督教里清除了一些帝国主义分子和反革命分子；今天基督教青年的思想感情与过去有很大的不同——我们热爱祖国、努力学习、工作，愿意把一切都献给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过去我们不大关心国家政治生活和参加各种政治活动，现在我们喜欢去听各种政治报告的讨论，许多活动也争取参加。这能不算进步吗？但是不少人却不看我们这种进步，一提到教徒，就把“落后”两字扣在我们头上，就联系到与美帝国主义有关系，这是大大的冤枉，我们感到心酸！自然，信仰宗教与唯物主义是有矛盾，但这毕竟是人民内部矛盾。今天的基督教是决不受帝国主义支配的，我们是爱国的。”北京儿童医院张鸾丽说：我们基督教青年常常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和关怀，尽管你怎样努力工作，提拔和进修都没有你的份，而党团员就容易被提拔，因此我在工作中有时感到心灰意冷……这时有关领导就予以纠正。如胡耀邦同志在全国青联委员会扩大会议讲话中就专门讲了“关于宗教青年的问题”。他说：“在这次会议上，有许多朋友反映了宗教青年方面的一些问题，应当引起我们的注意。我们要反复地同我们的同志，首先是共产党员、青年团员讲清楚，必须严格地贯彻执行我们党的尊重人们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这是我们党坚定不移的政策，现在许多团员和干部把自己是无神论者和

不应该反对有神论者两者混为一谈，这是不对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是马克思主义者，必须是无神论者，但是我们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可以和宗教界人士、有神论者在爱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上交朋友。宗教信仰者同马克思主义者在思想体系上是不相同的，这两者也不能混为一谈。我们不希望宗教界的朋友牵强附会的解释有神论可以和马克思主义相符。相反地，我们说有神论和无神论是不相同的，这是两回事、两种观念形态。但我们并不反对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以外的人的头脑里可以有神的观念。这就是说，我们马克思主义者并不把我们头脑里的马列主义强加于不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人的身上，这是办不到的事情，不仅短时期办不到，长时期也办不到。人们信不信神，要到科学高度的发展以后才能解决。因此，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不许人家信神是错误的，是违背宪法的，也是违背我们党的学说的。

由于许多同志对上述两者的界限没有搞清楚，因而许多地方还有不尊重教徒信仰，伤害教徒感情的现象，这种现象需要批评教育，需要纠正的。但是我们也要反过来想一想，克服青年团员、甚至共产党员和干部当中所存在的这种幼稚病，恐怕也不是一天两天所能办到的事情，要耐心的教育，一发觉了问题，我们就要讲。

有同志问，宗教青年进步的标准是什么？我说进步的标准有高，也有低，一般的进步标准就是爱国、遵守宪法，这是全国人民一致的、共同的标准。宗教青年入团的问题，我们曾经这么设想，不挖宗教的墙脚，就是不把他们的组织中的成员挖走。现在有许多宗教青年非急着入团不可，这个问题的产生是否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我们没有给他们解释清楚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二是有些团员，激进分子歧视他们，

看不起他们，这恐怕是最主要的原因。所以，我们不积极动员他们入团，不希望他们入团，其目的是使宗教界不会被挖垮。而不接受他们入团，并不是把他们当落后分子来看待，相反地，要同他们交朋友，只要他们是爱国者，我们就真心诚意地把他们当作爱国朋友来看待，这样，宗教界负责的朋友也会高兴了，宗教青年也会安心了，真是一举两得。”胡耀邦同志在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也提到要加强宗教青年的团结。这些讲话帮助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及积极分子纠正对宗教青年的不正确的看法，也消除了宗教青年的思想负担。北京师范学院黄耀光说：“我们觉得大家都生活在祖国的大家庭里，为什么不能相亲相爱呢？我们欢迎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胡耀邦同志的报告，提到加强宗教青年的团结，这使我们很高兴和感到鼓舞。”

三、窒息的60—70年代

50年代末，举国上下、男女老少都投入了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要求宗教界人士参加生产劳动，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于是各地基督教男女青年会和教会一样实行大收缩。有些地方的男女青年会合并了，如上海市基督教男女青年会与中华基督教男女青年会全国协会四团体合并。有些地方基督教男女青年会停止了活动，几乎全国各地的基督教男女青年会都只留个别人员看守会所，大部分干职人员都被介绍出去就业或被其他单位借用，工作也因此大收缩。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64年教会工作进行调整，在大收缩的基础上适当增加开放。中华基督教男女青年会全国协会在北京召开青年会总干事会，会议决定全国10个重点会所进行适当调

整：调回个别干职人员，开展一些当时力所能及的工作^⑧。

1966年，中国大陆掀起了一场空前大浩劫——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这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几乎将全国人民都卷入风暴中，几乎每个中国人都受到直接、间接、或大、或小的冲击。中国基督教男女青年会会员——长年被迷信、落后、帝国主义奴才这三个阴影时断时续、时淡时浓罩住的人，在这场浩劫中自然难以幸免。1966年8月18日“庆祝文化大革命大会”上，林彪在讲话中公开煽动红卫兵打倒所谓的资产阶级反动权威、保皇派及一切牛鬼蛇神，大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堵住一切钻向资本主义的孔道，砸碎一切培育修正主义的温床而掀起了声势浩大的“破四旧”运动：红卫兵唱着“拿起笔作刀枪”等革命造反歌曲冲向社会，扫荡一切不含革命意义的东西——街道、商店、住宅名称，宗教场所、古建筑、园林花卉、文物图书、金银首饰甚至人们留的辫子、穿的瘦腿裤……和横扫牛鬼蛇神运动。全国各地的宗教人士和基督教男女青年会的绝大部分干职人员都在这场风暴中受到冲击。轻则被勒令参加“学习班”接受“审查”和“批斗”，重则被随意打、斗、抄家，有的甚至受到酷刑，制造了一批冤假错案，严重伤害了信教群众的感情。

中国基督教男女青年会在红卫兵大搞的所谓“红色恐怖”中窒息：干职人员被斗，会所设备被毁，场地房屋被占，活动全部停止。它们从社会舞台中退出，从人们记忆中逝去。

四、复苏于80年代

十年，随着时光的流逝，人们经历了狂热、盲从到痛苦、沉思后，终于觉醒而奋起反抗。1976年，“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终于结束了；中国人民在热烈欢呼这一伟大胜利的同时，满怀信心地跟着共产党开始了新的历史征程，各项事业得以恢复、发展，尤其是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左”的流毒得到进一步肃清，祖国大地上到处都出现欣欣向荣的新气象。宗教界也同样，中共中央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宗教理论，在全面地总结了30多年来宗教工作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系统地提出了党对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明确提出尊重和保护宗教信仰自由是党的一项长期的基本政策，把争取、团结、教育宗教界人士作为新时期统战工作的内容之一，将宗教工作列为统战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还着手改正冤假错案。1985年12月29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中央办公厅调查组《关于落实党的宗教政策及有关问题的调查报告》的通知，落实了各项宗教政策，解决了一些问题。

中国基督教男女青年会在这股春风的吹拂下复苏，各地基督教男女青年会有的已恢复并开展活动，如上海、北京、南京、杭州、武汉、广州等；有的正在恢复，也有的准备恢复。总之，基督教男女青年会在逐步地恢复中，基督教男女青年会会员也在努力地为社会主义祖国的“四化”建设作出新的贡献。

[注释]

①详见附录二、三、四

②译自1947年美国青年会书局出版的《穆德全集》第3册《关于基督教青年会》第267至268页，转引自涂羽卿《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五年来的会务报告》（1954年12月2日）

③涂羽卿《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五年来的会务报告》（1954年12月2日）

④齐守成《沈阳（奉天）男女青年会概略》载《沈阳文史资料》第九辑第148页

⑤《同工》第42至43页（1951年4月1日）。

⑥况怀生《上海中华基督教青年会1956年度年会报告（摘要）》。

⑦中国青年报记者陈野《记北京市基督教青年座谈会》，载《中国青年报》1957年6月1日。

⑧钮志芳回忆

附 录

一、为上海事件告全

国基督教同学书

一、事变的经过及进展

自“九·一八”以后，暴日向我着着进攻，东北三省，既告沦陷，沿江沿海各重要商埠，日人亦尽其扰乱威胁之能事。上海为全国商业中心，久欲有所动作，而未得其会。1月18日有日本僧人5名，在中国地界马玉山路被殴，1月20日，日人四五十名，纵火焚烧该处附近之三友实业社，以图报复。同日，日本居留民举行大会，要求日领事采取强硬对付办法；散会后，在北四川路一带殴击华人，捣毁商店。同时日领事亦提出五项要求：（一）道歉，（二）惩凶，（三）抚恤，（四）取缔排日运动，（五）解散抗日团体。市府答复，日领事认为不满，即于27日提哀的美敦书，限市府于1月28日下午6时前，圆满答复，市府当于该日下午1时45分完全承认日领要求，并经日领表示满意。不意该晚11时许日本海军司令，借口保护日侨，通知市府，限中国军队立即退

出闸北，以便日军占领，不待答复，日军即于12时向闸北军队攻击。日领鉴于东北军政长官之不抵抗政策，曾向各国领事宣言，上海中国区域，可于3小时内，完全占领。不意我十九路军将士，以极大之决心，奋勇抵抗，沉着应战，在敌人大炮巨弹之下，绝不退缩，逐渐使敌军屡战屡北，遭极大的牺牲，而毫无进展。敌人计不得逞，于是闸北一带用飞机投掷炸弹、焚毁民房，以泄其愤。生命财产的损失，不计其数，我国最大之文化机关商务印书馆印刷所、编译所、及东方图书馆均于1月29日同遭浩劫，35年的惨淡经营，至此尽成灰烬。自此以后，战争日趋激烈。日军方面近更增兵数万，将作总攻，我国亦已充分准备，抵抗到底。成败之数，虽不可知，而人民共赴国难的精神，已极显著，盖我中华民族，虽酷爱和平，但决不肯为强暴的武力所屈服。

二、事变后吾人应有的几种觉悟

东北之祸，误于当局之不抵抗主义。抵抗非必以武力，然既不用武力，复无其他办法，则直等于屈服。至于国际方面，国联既无多大力量，公约亦无异废纸，列强既有同情于我者，亦因我国自身，绝无抗拒强暴的表示，故不肯有积极的行动。今十九路军奋勇御敌，连战皆胜，民气因之大张，敌人因之气沮，而国际之舆论，亦皆同情于我国，并努力旋于其间，足见天助自助，能自救者然后人能救之，吾人绝不宜自暴自弃，以张敌人之焰，此其一。

十九路军虽然得暂时胜利，而暴日箭在弦上，不肯罢手，势将倾其全力以图歼灭我反抗的力量。我国现状，千孔百疮，物质人力，皆不如人，内部意见，亦不一致，故十九路军及其参战军队，究能支持若干日，殊不敢预言。然暴日

自身亦未操必胜之券；日来大举增援，其国内舆论，渐起纷争，且经济恐慌，人心浮动，已呈外强中干之象。上海之役，能得最后胜利固属万幸，即不得已而败退，吾人亦当作持久之争。日人利在速战，我国利在持久，是以五分钟热度覆辙，万不能再蹈，此其二。

数月以来，敌人深入，居要位者举棋不定，拥大兵者，则惟以保全实力为念，不肯轻举一卒一弹，以御外侮，至于权位之争，意气之争，钩心斗争，则更非局外人所能揣测。然而在民众方面，目击国土之沦亡，不忍坐视，甚至起而自卫，东北数万义勇军，即此悲惨局面所产生之结果。吾人此后惟有组织民众力量，严厉监督政府，然后对外奋斗，始能发生效力，此其三。

战祸的惨酷，吾人固已公认，然非身受其害者，不能有深刻的认识。此次敌攻闸北，居民起火，日间则黑烟上冒，夜间则红光烛天，因此家室荡然，骨肉离散，亲友死亡者，不可胜计。吾人每至一收容所，则见形容憔悴，面有重忧者，举目皆是。其他困居战地，未能逃生，或因嫌疑，被敌逮捕，饱受精神及身体之痛楚者，更不能统计。至于前方战士，在重炮密弹之下，以血肉相搏，骨折肢断，死亡枕籍，固为惯见之事，此皆战时的损失。至若战事之后，百业凋敝，失业者达十数万人，尤为不易解决之问题。凡此种种，皆我沪上同人每日所见所闻之现实状况。无论战争有何重大理由，吾人对于世界各国容许战争存在，不能不发生重大疑问。此疑问一日在吾人心中，吾人决不许视战争为不可避免之事实，而不求根本解决之策，此其四。

基督教之根本精神为爱，而爱的方法与战争的方法，又绝不能相容，即使牵强解释，亦非心之所能安。吾人处此国

难，既不能主张不抵抗，以土地拱手让人，而根据耶稣的精神，对于武力方法，终觉其未妥，于是中心矛盾，不能有坚确的信仰。主张唯爱者，或被视为迂阔，而不能见谅于人；主张武力者，亦不过以武力为不得已过渡办法。此种矛盾，吾人能否处之泰然，而不谋解决之方。基督之道，基于现实而超过现实。其所以垂示爱的方法，为冒险的与创造的。战争的悲惨，使吾人确信武力的方法，决非文明人类所能许可；基督的教训，又使我人发现前途一线的光明，则吾人在这冷酷的现实世界中，以冒险与创造的精神，使爱的方法得以实现，又为刻不容缓的需要，此其五。

三、因上海事件吾人应加紧努力的事工

第一，时局紧张，人心愤激，经常工作，易于松弛，而尤以血气方刚的青年为尤甚。但救国之道，在于各尽职守，各专其事。吾人于此，更应视求学为神圣的职责，不以颓丧的叹息，无聊的动作，虚度光阴，荒疏所业。除战地的同学有实际的困难外，其他不受战事直接影响者均宜以此互勉。抑有进者，团契生活，为课外最有益的活动，若问题的研究，生活的锻炼，德行的切磋，均应以团体的方式行之，庶几收效更宏。沈阳事变以后，青年所受的刺激最大，而其需要团契生活之协助者亦最多。此为青年自身应有的工作。

第二，上海租界避难人民达五六万，收容所40余处，沪上基督徒学生组织国难急救会，服务于收容所者数十人。其他各地如北平、天津，为东北失学同学、失业人民萃集之所。又如武汉、芜湖等地，救济水灾难民工作，因战事而紧缩、而停顿，均为同学服务的绝好机会，不能错过。

第三，忠勇的将士，以武力抗日，我辈不能直接参加战

争的同学，亦应有相当的方法抗日。不合作运动，实为吾人抗日最有效的利器。或有以此为消极、为不急之务，为效力微薄的办法者，而不知暴日经济恐慌，已达极点，吾人尚能厉行经济绝交，及其他不合作办法，日本国内，不久必发生极大问题。此不合作运动，不但应推行于学生的自身，且应在重要的城市联络工商各界，作一致的行动。“九·一八”以后的两阅月间，学生爱国运动，殆有如火如荼之盛，而其目标则集中于宣战。学生运动的潜势力尚在，则曷不充分利用之于更有效力的不合作运动！

第四，我国民众，因教育不普及，素鲜国家观念，此次事变，举世注目，而我国都市以外的大多数人民，犹度其闭户自守，不问国家事的生活。吾人欲作宣传工作，则此为最好的田地。至于宣传方式，或用演讲，或用读物；宣传时间，或在假期，或在常日，均可酌核情形，自行决定。

第五，暴日侵我，无非少数军阀政客的意见，国内未尝无觉悟分子，今以少数人的武力政策，使大多数无辜的民众，受其祸害，宁非可悲之事。此次中日纷争，吾人宜认清此点，勿以仇恨态度，加诸日本全国人民，且当更进一步，联络两国有志的基督徒青年，打倒政阀财阀，及两国间其他引起纷争的恶势力。兹事虽大，而责任所在，勿庸推卸；苟能日积有功，则艰巨之业，终能完成。推而广之，以至于社会制度的改变，国际合作的促成，均为吾人日日祈祷中、思想中、讨论中、研究中、计划中所当有的事；盖吾人目标愈远，则方向愈正，而下手之处，亦更知所适从。十架在望，奋勇前驱，荆棘满途，牺牲勿惜，此固基督徒应有的精神，不容吾人迟疑瞻顾者。

同人等草此文时，暴日已再度向我军政当局下哀的美敦

书，要求华兵撤退。此种无理要求，已遭我军拒绝。以后数星期中，行见血肉横飞、天昏地暗。和平之望既绝，正义之道莫彰，吾人此时，亦惟有精诚祈祷，恳切吁天，冀劫运终得挽回，光明重复照耀而已。

二、我们的意见

此次北平美军强奸沈崇女士事件，发生后极引起各地学生愤慨激昂，罢课游行，遍及全国。基督徒学生一向对事情的态度是不盲目的附从，也不惧怕的避讳，以下为上海一部分的基督徒学生在讨论会上对此次事件所发表的意见。编者特录本刊。

× × × ×

我认为站在一个基督徒的立场来说，不但强奸这行为是违背我们的教义，其更甚者，就是我们绝不能容忍那种以强暴的手段为求达一己的欲望，漠视他人的人格与道德的尊严。在战争时，基督徒紧守岗位与联帮并肩作战，未稍懈怠，无非是因为反抗德日以强暴施行其侵略的霸欲，虽事有大小之别，但道理却是同一，是以基督徒必须主张根绝这种罪恶。

× × × ×

老实说，我们和美国一向有着很好的友谊，他们的传教士、教育家、医生并许多同道们对我国过去一世纪的贡献，实算不少，尤其是在战争时我们的合作与亲善更臻顶点。对于此次所发生的不幸，未免使我们感觉极大的遗憾，这也是许多美国人民所有的同感。虽然，我们愿意声明我们所反对的并非素与我们友善而爱好和平的美国人，正如我们不愿意咒骂那无辜的德国、日本大众一样，而是反对那些尚持騃武

观念、为营私利而障碍世界和平前途的美国一部分的当权者，并其对华的不聪明的政策。

× × × ×

我们不但不反对美国爱好和平的人民和他们的基督徒，而是应该和他们联合在一起，共同为争取世界和平而奋斗，这点我觉得可能办到的，因为我亲耳听见许多美国人说，他们对于这件事，甚至还比我们更加愤慨。

× × × ×

中国是礼义之邦，一向看重礼节义理，对于曾在抗战援助我国的美国联邦，更常以宾主之谊相待，从未忘掉患难中的这份友情，战争胜利后，至今已一年多，美军并无充分理由，继续在华驻兵，更值国内局面纷乱、内战四起，对驻华美军时有猜忌，啧有烦言，在所难免，然始终未敢轻举妄动，无奈美军当局漠视我国人民的舆论，不作退军之策，致使这些离乡背井、久沦中国的士兵，精神不宁，竟不爱惜中美这份友谊，屡次殴打我国黄包车夫，更做出丧心病狂的事来，中国人难道还能容忍缄默么？

× × × ×

许多人说美军这种行为遍及全球，在他们足迹所至之地，几乎无远不及，是以一般人认为是司空见惯，不足为奇，也无从计较。然而，我感觉荣幸的，就是此次中国人竟能大胆地站起来，公然揭发指责美军这种行为的丑恶，这不但为在中国被侮辱的女子争气，也是为全世界各个角落被美军欺侮的女人伸冤，并且我认为这种责任也唯有中国人有资格负起，因为中国人民对于这种蛮行是比世界上任何一国更来得厌恨和不能忍受的。

× × × ×

我认为此次同学之所以如此愤慨激昂，其主要原因实为反对美军的驻华，中国经过八年血泪的抗战，人民涂炭，无刻能得安宁，战争刚告结束，复员未了，内战又起，华北一带烽火遍野，闾阎为墟，加上美军械不断运华，美军迟迟不退，使得战争更加炽烈，人民水火的生活无尽期的拖延，是以积愠在胸，一触即发，此次各地学生大举游行，咆哮吼叫，有如怒涛逞汹。正可清楚地看出中国人民呼吁和平的迫切，我认为这次的游行最少有两个作用，一是请美军快点退出，不要干涉中国内政，因为他们的干涉不但无益，反增加中国人民的痛苦，另一方面当然是对那些手持枪弹，打得正酣的自家兄弟。迫切疾呼请他们看看千万人民的面，听听千万人民的哀声，放下枪杆来。以上两点要求，的确是光明正大的，是合道理的，难道我们基督徒学生，还有避讳不拥护之理么？

× × × ×

一般说来，学生对于一件事情的反应常是最敏感的，尤其是在中国教育水平低落的今天，唯一能够代表人民喉舌的就是学生，唯一能够制造舆论，唯一懂得呼喊民主的，也就是学生，是以今日中国的学生，必不可畏避这种责任的。

× × × ×

我认为我们做基督徒的学生，要永远站在最公正的立场上，例如我们反对这种强奸的行为，无论做这事的是士兵或学者，是官府或是平民，我们都一样的反对。我们反对外国驻兵中国，助长中国内战，无论是美国或苏联，无论是公开的或暗地里帮忙。我们反对内战，无论那一党那一派，我们反对阻挠民主的路，置人民的呼声于不理的一切贪官污吏，我们同样也反对那手执干戈谈条件的军阀。我们应毫无偏袒

地对恶势力加以抗拒，对好的力量加以培植，我们的态度应以是非为定，我们的道路应以公义为准绳，我们基督教学生运动的基石才能站立得稳。

× × × ×

有许多人说这种事情根本是个别的事，何必大张声色的扩展到全国呢？可是我认为世界已非原始时代的世界了，中国人也不可以再象古代诗人遁居深山，与世隔绝了，基督徒也已不可能再过着中世纪修道院式的生活，取独善其身的处世态度，现在世界的任何事物，都是休戚相关的，任何事物的发生，都有其交互的因素在，对于我们所看见的错误，若不加根究与制裁其对整个世界以及时代的影响，将更不堪设想了。

× × × ×

学生是知识阶级的堡垒，是学术的追求者，文化的继承者，对于国家社会负有建设的责任，今士兵竟敢如此轻蔑侮辱学生，持着武器的居然强迫手无寸铁者，正象征着今日的世界，武力仍然占居着优势，破坏的力量仍然四面潜伏，世界的和平仍然受到莫大的威吓。虽然，看此次举国学生情绪的高涨，在他们统一意志里所发生的喊叫，足视文化的力量，正义的堡垒，还有它不可动摇的防线，世界的和平，尚留着无限的希望，当然这仍要看我们学生努力的程度如何！

× × × ×

基督徒所以与世不同者，因其有明锐的眼光，能辨析是非真伪，有勇敢刚毅的精神，愿以全力维护正义与真理，不辞艰辛底向恶势力挑战。中国基督徒学生，不是要追随时代，而是要站在时代的前锋，不断地为正义呼吁，站在超乎党派界限的立场上，卫护真理，做时代的先知先觉。

× × × ×

站在中国基督教学生运动并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的立场来说，我们应站在自己的岗位加紧的联系在同一直线上，反对我们周围所潜伏着的阻挠和平的势力，我们要做光做盐，以我们合而为一的力量，促成世界朝向和谐合作的路，使上帝的光普照人间，天国早日临格。

三、防止帝国主义利用教会危害中国人民

中国基督教界发表宣言

第一批签名者已达一千五百余人
正继续征求全国基督教教徒签名

【新华社22日讯】中国基督教人士为防止帝国主义利用教会进行危害中国人民利益的活动，曾于7月底，向各地教徒发出题为“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的宣言，并征求全国同意这一宣言的基督教徒在上面签名。截至8月底止，第一批签名者已达一千五百二十七人。签名者中包括各地基督教负责人和教徒；现征求签名的工作仍在继续中。该宣言的发起人为：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出版组主任吴耀宗、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全国协会总干事邓裕志、北京燕京大学教授宗教学学院院长赵紫宸、中华基督教青年会

全国协会事工组主任刘良模、上海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总干事涂羽卿、上海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总干事崔宪详、上海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干事缪秋笙、南京中华基督教会总干事邵镜三、上海基督教公谊会主席黎照寰、上海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副总干事江文汉、前上海中华基督教协进会医事委员会总干事王吉民、北京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华北基督教联合会总干事王梓仲，基督教卫理公会会督江长川、北京基督教女青年会总干事陈文润，北京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赵復三以及丁先诚、王世静、方叔轩、艾年三、汪彼得、吴高梓、林永侯、招观海、胡翼云、韦卓民、高凤山、孙王国秀、凌俞秀霭、戚庆才、陈芝美，陈崇桂、杨肖彭、熊夏沛、刘维诚、郑建业、鲍哲庆、檀仁梅、庞之焜、萧国贵等四十人。

宣言全文如下：

基督教传到中国，已经有140年的历史，在这一百多年当中，它对中国的社会，曾经有过相当的贡献。但是，不幸得很，基督教传到中国不久以后，帝国主义便在中国开始活动，又因为把基督教传到中国来的人们，主要地都是从这些帝国主义国家来的，基督教同帝国主义便在有意无意、有形无形之中发生了关系。现在中国的革命胜利了。帝国主义对中国历史这一空前的事实，是不会甘心的。它们一定要用尽千方百计，企图破坏这个既成的事实；它们也会利用基督教，去进行它们挑拨离间，企图在中国制造反动力量的阴谋。为要提高我们对帝国主义的警惕，为要表示基督教在新中国中鲜明的政治立场，为要促成一个为中国人自己所主持的中国教会，为要指出全国的基督徒对新中国建设所应当负起的责任，我们发表了下面这个文件。我们愿意号召全国的

基督徒，为实现这个文件所提供的原则而努力。

总的任务

中国基督教会及团体彻底拥护共同纲领，在政府的领导下，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官僚资本主义，为建设一个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

基本方针

(一) 中国基督教会及团体应以最大的努力，及有效的方法，使教会群众清楚地认识帝国主义在中国所造成的罪恶，认识过去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的事实，肃清基督教内部的帝国主义影响，警惕帝国主义、尤其是美帝国主义利用宗教以培养反动力量的阴谋，同时号召他们参加反对战争、拥护和平的运动，并教育他们彻底了解及拥护政府的土地改革政策。。

(二) 中国基督教教会及团体应用有效的办法，培养一般信徒爱国民主的精神，和自尊自信的心理。中国基督教过去所倡导的自治、自养、自传的运动，已有相当成就，今后应在最短期内，完成此项任务；同时提倡自我批评，在各种工作上，实行检讨整理，精简节约，以达到基督教革新的目标。

具体办法

(一) 中国基督教会及团体，凡仍仰赖外国人才与经济之协助者，应拟定具体计划，在最短期内，实现自力更生的目标。

(二) 今后基督教会及团体，在宗教工作方面，应注重

基督本质的深刻认识，宗派间的团结、领导人才的培养和教会制度的改进；在一般工作方面，应注重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教育，及劳动生产、认识时代、文娱活动，识字教育、医药卫生、儿童保育等为人民服务的工作。

四、人民日报1950年9月23日讯

【本报讯】中国基督教人士发表的题为“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的宣言第一批签名的共1527人。其中有：政协宗教民主人士代表4人，基督教全国性的组织22人，基督教区域性的组织66人，教会380人（包括：卫理公会30人，圣公会27人，信义会32人，基督会8人，中华基督教会79人，浸会17人，公理会12人，循理会3人，循道公会17人，内地会16人，宣圣会3人，自立会7人，灵工团10人，长老会6人，宗派不详者113人），耶稣家庭381人，基督教青年会109人，基督教女青年会197人，大学43人，神学25人，中学66人，儿童教育工作者20人，医院工作者123人，书刊编辑22人，其他团体及个人69人。

签名者按地区统计：上海190人，江苏107人，浙江76人，安徽51人，福建19人，广东148人，广西4人，江西38人，平原14人，山东407人，北京51人，河北51人，河南40人，湖北43人，湖南74人，四川114人，陕西34人，山西22人，甘肃1人，东北20人，云南2人，贵州1人，地区不详者20人。

现在第三批签名者正陆续寄到，俟完全结束后再行发表。兹将第一批签名公布如下：（略）

注：题系作者另加

五、基督教人士的爱国运动

中国基督教人士第一批一千五百多人联合发表的以“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为题的宣言，号召全国基督教徒割断与帝国主义国家的关系，实行自治、自养、自传，以达到革新中国基督教的目标。由中国基督教许多著名人士签名发表的这篇宣言，申明了基督教徒在新中国所应有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对战争拥护和平的政治立场，并指出了中国宗教界的正确的努力方向。诚如征求签名的信上所说：“这篇宣言是中国基督教一个有历史意义的文件。”我们相信全国人民与全国绝大多数爱国的基督徒一样，对这篇宣言表示热忱的欢迎。

基督教和天主教在中国的活动都包含两个方面。在一方面，这个宗教在中国有很多善良的教徒，他们是教徒，同时又是爱国的公民，他们希望国家独立富强和自由民主，因而拥护人民政府所进行的政治改革和社会改革。在另一方面，这个宗教又由于历史的原因，与外国帝国主义发生了种种不同的联系。大家知道，这二个宗教都是在一百多年前才大规模地从外国传入中国的。当时外国教士之不远万里而来，用第一个来到中国的美国基督教教士裨治文牧师的话来说，“与其说是由于宗教的原因，毋宁说是由于政治的原因。”他们中间的很多人是由本国政府跟鸦片贩子和炮舰一起派到中国来做情报人员和侵略先锋的。他们依靠一次连接一次的帝国主义侵略战争和不平等条约不断扩大其势力。有许多传教士与中国的封建地主、官僚、买办相结托，巧取豪夺，欺压善良，以至在中国人民中引起了许多次严重的反抗，在我们

的历史上留下了血泪斑斑的事迹。教会人员与美蒋勾结进行反共反人民活动的事例，稍远如抗日战争期间，法国天主教系统的雷鸣远（比籍）和美国系统曾任天主教新乡教区主教的米甘（美籍）在陕北、晋南和豫西北一带的情报活动，最近如解放战争中连续被破获的邢台、齐齐哈尔、献县和沈阳的间谍案。正由于有这种种情形，才引起了宗教界有识之士的痛心疾首，才引起了目前的蓬蓬勃勃的改革运动。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政府的宗教政策是一贯的和明确的。人民政协共同纲领第五条规定人民有宗教信仰自由，即有信仰宗教之自由，也有拒绝信仰宗教之自由，这二方面的自由同受法律的保护。宗教信仰应当绝对与外国侵略活动以及反革命活动相分离，而不应当把它们混淆起来；那些危害活动是要被人民政府所取缔的。人民政府既不因为取缔那些危害活动而干涉宗教信仰自由，也不因为保护宗教信仰自由而容忍那些危害活动。

有人问：共产党人既然是彻底的无神论者，那么，为什么又主张允许宗教信仰自由呢？这是因为，宗教是产生和存在于人类面对着他们认为不可抗衡的自然法则和社会法则而求助于神秘现象的时候，因此，只有在人类有足够力量支配自然，并彻底消灭了阶级压迫制度及其遗迹以后，宗教才会走向消灭。在此以前，当一部分人类由于技术落后而对自然力量继续存在着依赖的时候，当一部分人类还没有能够摆脱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奴役的时候，宗教的现象是不可能从人类社会中普遍消失的。因此，对于纯粹宗教信仰问题，任何采取强制行动的意见都是无益而有害的。因此，我们主张保护宗教信仰的自由，如同保护拒绝宗教信仰的自由一样。但是，教会如果被利用来作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和反革命分子

反对人民政府的工具，那就违反了人民国家的利益，也违反了一切诚实的宗教信仰者原来的意志。那些利用宗教掩护进行破坏活动和间谍活动的特务分子（不是没有犯罪的普通教徒），不论他们标榜那一种宗教，也不论他们是外国人或中国人，就都应当按照共同纲领第七条的规定，受到应有的惩处。

正是从这种立场出发，我们欢迎基督教人士所发起的自治、自养、自传运动。这是基督教人士应有的使中国基督教脱离帝国主义影响而走上宗教正轨的爱国运动。他们号召割断与帝国主义的关系，实行自力更生，使教会从外国人的机关改变为中国人的机关，从而使教会所举办的事业不再是服务于帝国主义利益的事业。这个运动的成功，将使中国的基督教获得新的生命，改变中国人民对于基督教的观感，因为他们使自己的宗教活动和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活动划清了界线，而不互相混淆。因此，我们相信一千五百多位基督徒人士的宣言，不但将为爱国的基督徒所拥护，而且也将为爱国的天主教徒所响应。一切宗教的信徒们都可以由此得到一个正确的方向，只有朝这个方向走，宗教界才可能建立自己的正常的宗教事业。

（人民日报1950年9月23日社论）

六 图表目录

1. “基督教学生运动与男女青年会之关系”
2. “基督教男女青年会会徽”
3. “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之组织及系统”
4. 平民教育工作系统表

5. 上海女青年会办女工夜校历年学生数统计表
6. 学校青年会历年比较表
7. 1920年学校青年会总数统计
8. 中国少年事业——1920年报告
9. 基督教会中学从1915年到1932年发展情况统计表
10. 1920年至1934年城市青年会会员人数之比较
11. 1920年至1934年市会学生人数之比较
12. 军人内衣征集结果统计
13. 经济征集成绩及支出款项表
14. 征求工作学生调查表
15. 征求学生工作调查表
16. 赞助青年会战区服务工作认捐单
17. 1940年下半年到1943年军人服务工作统计表
18. 军人服务部服务处所统计表

七 主要参考资料

1. 顾长声的《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
2. 中国基督教青年会编《青年会50周年纪念册》民国24年1935年出版
3. 共青团中央研究室编《中国青年工作年鉴》（1986年）
4. 《中国基督教学生运动史》
5. 上海中华女青年会编《上海中华女青年会40周年纪念特刊》民国37年1948年10月出版
6. 司徒德编《中华归主》1922年出版
7. 杨雅彬著《中国社会学史》山东人民出版社

8. 全国妇联妇运史研究室编《中国妇女运动史》(试用教材)
9. 雷振阎《宗教概论》河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8月出版
10. 共青团中央青运史研究室编《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1——10册
11. 共青团中央青运史研究室著《中国青年运动史》中国青年出版社
12. 中国政协文史资料室编《文史资料选辑》第19期
13. 上海市宗教学会编《宗教研究通讯》增刊
14. 刊物《消息》数期
15. 刊物《同工》数期
16. 刊物《青年进步》数期
17. 刊物《女青年报》数期
18. 各省市的《文史资料选辑》
19. 各地的《统战工作史料》
20. 《中国教会大学史》(美)杰西·格卢茨著、曾钜生译

